

目录 Contents

学会风采

- 03 弘扬荆楚货币文化 助推湖北经济发展
湖北省钱币学会

钱币学研究

- 05 湖北罗田县“福隆字号”木刻版钱票
——湖北最早的清代纸币
张或定 张峭峰 张劲峰
- 11 《中国古钱移范币概论》付梓前的思考
陈焕龙
- 15 清末民初湖北光化县老河口镇典型民间钱票
张或定 张峭峰 张劲峰
- 19 湖北“京山县京皂京东路购买汽车临时借券”
——罕见京山县政府与商会纸币
夏红艳 张或定
- 23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湖北省银行伍角辅币券
吕怀平
- 25 日照县田赋流通券考辨
李银 李天聪

根据地货币

- 29 东固革命根据地红色金融的作用及其传承
刘小兰
- 32 东古平民银行的创建及其历史贡献
梁洁

丝绸之路

- 37 西南丝绸之路门户与宋代钱币关系探论
郭立格 郭晶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湖北省优秀期刊

武汉金融
W U H A N F I N A N C E

主 编 赵以邗
副 主 编 邓亚平
执行副主编 李 征
主 任 吴 莹
值 班 主 任 熊 敏
广告部主任 吴俊伟
法 律 顾 问 瞿森垓
技 术 编 辑 邓雅娜 胡松林 蒿倩文

本刊声明

- 本刊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征集稿件,刊发文章不收取任何费用。
- 本刊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数据等网站有合作,作者投稿一经本刊采用,如无特别声明,均视为同意接受以上网站的数字传播与发行。
- 本刊版权属《武汉金融》杂志社所有,其他媒体转载本刊文章,须注明“摘自《武汉金融》”字样,否则即侵权。
- 本刊谢绝一稿多投;文责自负。

本期封面图片:

湖北罗田县骡走河“福隆字号”木刻版钱票正面、背面(上图)

湖北“京山县京皂京东路购买汽车临时借券”正面、背面(下图)

总第16期

湖北钱币专刊

主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主办单位：中国金融学会

《武汉金融》杂志社

本刊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顾问 徐 忠

主任 王玉玲

编委

卜永祥 卜东升 马天禄 王 斌
王芝斌 王恭敬 王季明 文行赤
龙志林 孙国峰 刘志高 刘元瑞
朱渝杭 邬君宇 李 民 李秉恒
李中文 李亚华 李 鹏 宋清华
吴少新 汪 博 陈金焱 陈传龙
陈任武 陈新民 陈盛银 张智富
张劲辉 张小春 林顺辉 周全锋
段银弟 胡世财 贺杰锋 徐长生
徐晓华 徐小建 高新华 袁 敢
陶建全 黄 宪 黄旭东 梁庆凯
葛春尧 曾晓阳 赖秀福 潘明忠

出版单位：《武汉金融》杂志社

发行单位：武汉长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9-3540

国内统一刊号：CN42-1593/F

封面题字：中国书法家协会钟鸣天理事

印刷单位：武汉鑫佳捷印务有限公司

广告许可证号：4201004001161

增刊备案号：421593201801

每册定价：18.00 元

编辑部电话：(027)87327462

发行部电话：(027)87327465

广告部电话：(027)87327290

本刊地址：武汉市武昌中南路69号

邮 编：430071

投稿平台：<http://yhqy.cbpt.cnki.net>

38 五铢钱开辟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

叶真铭

42 草原丝绸之路贸易与货币

苏利德

48 探讨“景德镇总商会临时流通券”的水印纸与“丝绸之路”

周海平

货币史研究

52 我国古钱币文化的特征及其历史作用

傅先义 丁安国

55 “光绪通宝”机制币

李邦经

泉海杂谈

58 论稀见顺治出谱钱

黄定学

63 压胜钱与民俗

郭浩悦

65 钞票上的银元图案

朱清华

70 漫话铝合金分币

李邦经

红色文化

72 传承红色精神 感受党性教育

——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有感

李群华

72 遵义行

刘双庆

弘扬荆楚货币文化 助推湖北经济发展

■ 湖北省钱币学会

湖北省钱币学会成立于1987年,是由全省钱币学、货币史研究单位及研究者、钱币工作者、钱币收藏者和爱好者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学术团体。该学会接受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的领导和民政厅的监督管理,相关业务接受湖北省社科联、文化厅文物部门的指导。学会秘书处设在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湖北钱币博物馆。会长由分管行领导担任,钱币博物馆馆长担任秘书长,负责学会日常工作,钱币学会及钱币博物馆党支部在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机关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多年来,湖北省钱币学会以普及钱币知识,弘扬货币文化,推进钱币学和货币史的研究,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己任,团结拼搏,开拓创新,砥砺前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是我省第一批拥有“AAAA”级荣誉称号的社团组织。

一、服务湖北经济社会,投入战略支点建设

湖北省钱币学会成立以来,始终以研究湖北地方货币为己任,把研究和宣传湖北地方货币文化与服务湖北经济社会紧密结合并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在不断实践中显现了学会生命力和发展后劲。

2015年6至8月湖北省钱币学会在北京中国钱币博物馆举办了“湖北近代钱币展”,这次展览就是配合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提出的努力把湖北建设成为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争取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走在全国前列的新定位新要求而举办的。展览以清末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创建湖北银元局并在武昌铸造银元为起点,通过丰富详实的历史资料和钱币实物,再现了湖北近代货币在中国钱币发展史上的辉煌,再现了汉口开埠后,武汉对外贸易与上海并驾齐驱,成为“驾平津门,直追沪上”

的全国第二大城市盛景。展览以地域钱币发展的视角,审视湖北金融经济发展历史,从历史与现实交互作用中,揭示出湖北成为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历史必然。该展览在北京展出后,吸引了国内众多钱币界、经济界、社会学界的专业人士和海外学者,很多人通过观看展览开始重新认识湖北仰慕湖北。

积极参与筹办中国武汉金融博览会暨中国中部(湖北)创业投资大会(以下简称:武汉金博会)是湖北钱币学会响应湖北省委省政府号召,普及金融知识,传播金融文化,展示金融成就,改善金融发展环境的又一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举措。武汉金博会是提高湖北金融软实力,提升武汉区域金融中心影响的重要载体。为此,湖北省钱币学会自2008年以来,每届都参与策划,精心筹办,并做到了每届参展都有新主题、新风格。由于展示的钱币实物十分精美,且不乏国家一级文物,加上厚重文史资料,使每次展览都成为展会的一个亮点,让参观者驻足。

开展人民币知识和防伪反假人民币宣传活动,是湖北省钱币学会联合省内各商业银行进行的一项常规性工作。2000年以来,每逢3月15日这天,湖北省钱币学会秘书处同志,都会根据事先安排,分兵多路,和志愿者一起走向街头,搭台设点,现场讲解人民币知识,演示鉴别方法,解答群众疑难问题,宣传政策法规。每次宣传活动,都会发放近万份宣传资料。这项活动在社会公众中反映良好,也受到地方政府和人民银行肯定。除此,湖北省钱币学会在开展人民币宣传和反假活动中,还坚持开展多种多样宣传活动,如:省内巡展,进社区、进校园,在媒体辟专栏,请专家上讲堂等,使湖北省钱币学会的活动,与社会经济活动联得更紧,更具生命力。

利用自身的特点和独特优势,湖北省钱币学会

还配合宣传灵秀湖北,推广湖北旅游景点活动,与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联合开发了“黄鹤楼金银纪念章”、“三峡风光纪念银章”、“神农祭纪念银章”、“武当山纪念银章”和“中山舰打捞成功纪念银章”等,由于铸造发行的权威性和工艺的精美性,每次发行都在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轰动,既宣传了湖北秀美山川,又为收藏爱好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二、深耕湖北地方货币,聚焦特色钱币研究

以湖北地方货币为研究重点,并抓住其中重要研究课题,一步一个脚印地深入下去,不断扩大研究成果,并服务于社会,是学会工作的方向。

中国古代范铸法铸钱工艺模拟试验研究,就是湖北省钱币学会在中国钱币学会的领导下,与湖北鄂州博物馆联手进行的长达10年的特色研究项目,这是一项涉及钱币学、金属材料学、考古学等跨学科专业人员参与的大型综合科学、试验活动,是对传统钱币研究方法的革命,更是确立中国钱币学在学界地位的扛鼎之作。从1996年开始,经过钱币界、银行界、文博界的大专院校专家学者的6年不弃不馁的奋战,历经失败——总结——再失败——再总结,如此无数次的反复循环,终于于2002年夏获得成功。2002年11月,中国钱币学会、中国科技史学会和湖北省钱币学会联合在鄂州市主持召开了“全国金属史和钱币史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金属史、钱币学会和考古学领域的八十多位专家学者参会,审议了中国古代货币铸造工艺研究的试验报告,认为铸钱是中国古代持续时间最长实践量最大的铸造活动,其中蕴含了许多重大的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铸钱工艺的发展,代表了秦汉之后二千多年中国传统铸造技术的发展,因此是中国钱币学科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一次飞跃,具有里程碑意义。2004年12月28日,“中国古代范铸法铸钱工艺模拟试验”,在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科技成果评定会上,被评为全国银行科技发展二等奖。

在进行古代范铸法铸钱工艺模拟试验后期,为推动湖北地方货币的研究,湖北钱币学会在中国钱币学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始对楚国蚁鼻钱铸造工艺进行模拟试验,经过三年多的试验,于2006年初完成试验报告,并于2006年12月在宜昌全国银行科技成果审定会上顺利通过。随后,获全国银行科技发展二等奖。

为了将这项研究成果运用到文化教育领域里,湖北省钱币学会配合中国钱币博物馆,经过8个多

月的努力,于2006年3月,在京城中国钱币博物馆隆重推出“中国古代铸钱工艺展”,展览体现了古代铸钱工艺过程蕴涵于时空的特性;还原了中国古代铸钱风貌的“场景化”,观众参与的互动化;实现了实物展品,模拟实验展品,辅助展品以及互动用品的有机结合。参观者走进展馆,如同穿越时空,仿佛回到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代。独特的展示风格一时轰动京城,使参观需预约成为展览常态。

在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创建六十周年之际,中国钱币学会革命根据地货币委员会决定编写《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丛书,并于1992年召开专题会议,向曾建立过革命根据地的有关省钱币学会下达了这项任务。湖北省钱币学会负责主持和参与编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史》、《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三本书。接受这项重任后,湖北省钱币学会联合湖南省钱币学会和江西省钱币学会,迅速制订调查大纲和编写大纲,组织湖北、湖南、江西相关专业人员,分为三个调查组,进行了长达半年抢救性的文物征集和实物资料及口碑资料的搜集工作,尔后对数以万计的资料进行了分析和取舍,经过分阶段开研讨会,分地点集中编写,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形式,反复征求意见,几易其稿,终于通过总会三审,于1993年10月《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出版、1995年9月《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出版、1998年12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出版,三本书均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并分别荣获中国钱币最高奖“金泉奖”殊荣。

在湖北地方货币研究方面,湖北省钱币学会坚持“楚币”和“革命根据地货币”为重点,研究深度和广度在全国同业内都影响很大。

三、弘扬湖北历史文化,构筑多样宣传平台

加强钱币知识和钱币文化的宣传,是湖北省钱币学会长期以来的工作重点,也是数十年形成的工作特点。

为了直观展示历代钱币实物,有效地宣传湖北地方货币,在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的支持下,湖北省钱币学会利用其20余年的收藏积累,经过一年集中筹建,于2003年10月,在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创建了湖北钱币博物馆,这是湖北省内第一家最具权威的公办钱币专业博物馆,在全国省级学会中也属佼佼者。开馆时,全国80余名钱币专家应邀参加,并给予极高评价,认为这是开了省级学会办博物馆的先

湖北罗田县“福隆字号” 木刻版钱票

——湖北最早的清代纸币

■ 张或定 张峭峰 张劲峰

(湖北省钱币学会)

清代和民国时期,国内各省民间钱票中,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在品种上,湖北均属于较少的省份之一,其中以湖北清代钱票,尤其是清代木刻版钱票,更为罕见,它已成为当前湖北民间钱票爱好者,颇为青睐的品种。

2006年12月,武汉旅游胜地黄鹤楼南边不远处的武昌区札珠前街14号,因旧房改造拆墙,民工在其旧房二楼西室西边木板墙内,发现了一批清代同治和光绪年间武昌府“裕盛钱号”发行的木刻版钱票,有七个年号,这是湖北首次发现的本地清代木刻版钱票,曾引起轰动和关注。

笔者曾写文章,对该票加以介绍,文章特别指出,其同治七年(1868年)发行的“裕盛钱号”木刻版钱票,是湖北发行时间最早的清代民间钱票^{[1][2]}。

时间过去了六年多,这一情况突然发生改变,又发现了一种发行时间更早的湖北木刻版钱票,因此,不得不对上述结论再次加以斟酌与修改。

2013年6月初,笔者集得数张面额不同的同治五年(1866年)湖北罗田县骡走河“福隆字号”木刻板钱票,其面额有壹串和贰串二种。

据商家称,此前不久,罗田县一旧书商,在其收购的一批当地线装家谱中,偶然发现了这种木刻版

河。湖北钱币博物馆从设计风格到展品布局都是有浓郁的楚文化神韵,展示的钱币实物从先秦至今时间跨越2000多年,展品近万件。丰富的展品吸引了省内外众多钱币研究者和爱好者,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接待参观者近万人。特别是中小學生参观尤为多,省内相关文化部门也将其指定为宣传教育窗口,使之成为湖北省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化教育基地。

继承我党优良传统,弘扬先辈创建红色金融的辉煌业绩,是湖北省钱币学会另一工作特色。为了进一步唱响时代的主旋律,2015年4月湖北省钱币学会在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红色金融专委会,中国钱币博物馆,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的大力支持下,在湖北省博物馆成功举办了“红色金融历史展”,展览以“传承优良传统、弘扬红色金融文化”为出发点,分为六个部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创业足迹,展览通过大量珍贵文物史料、场景、录像、声光,生动再现了红色金融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开展第一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郭庆平、湖北省委常委宣传

部长尹汉宁、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斌、湖北省副省长曹广晶等领导莅临观展;金融时报,湖北卫视等十几家主流媒体纷纷进行了详细报道。展览期间共接待观众逾10万人次,在湖北境内反映强烈,许多单位都将这次参观作为一次党员教育活动,省内七个地方党政部门组团赴汉参观。为了满足省内更多人的要求,展览期结束后,湖北省钱币学会本着一次投入,多次使用,提高效率的原则,又不辞劳苦,开始陆续在辖内开展巡展工作,对省内2个地市6个县市进行巡展。

以钱币文化为媒介,组织多种形式的学习交流,是湖北省钱币学会保持旺盛活力的原因之一。学会成立以来,与全国18个省市钱币学会有过学术交流,与省内3个大专院校保持长期银校合作关系,与省内十余家博物馆有专业交流约定,除此,每年定期组织学会会员外出参观、学习和培训,既有专业交流,也包括政治文化教育。丰富多样的学会交流活动,使得湖北省钱币学会凝聚力增强,社会知名度逐步提高。■

钱票。笔者得知信息后,立即购得此票。

研究表明,同治五年(1866年)湖北罗田县骡走河“福隆字号”木刻板钱票,是湖北清代早期木刻板钱票。该票在湖北民间钱票中以及在湖北清代纸币中,具有何种地位和意义,以及该票特有的形制特征,均值得探讨与分析。

一、发行地——罗田县“骡走河”的确认

罗田县,位于湖北省东部,东接英山,南临浠水,西与团风、麻城相邻,北与安徽金寨接壤。罗田县,历史悠久,始建于公元523年,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今县城为凤山镇。

纸币发行地,“骡走河”,在今《湖北省罗田县地名志》中,已无从查找,显然,“骡走河”是一个古代地名,其位置应当查找与确认。

不过,在明嘉靖《罗田县志》卷一地理志中,查到了“骡走河”地名,其载:

“骡走河:县北五十里。”^[1]

新编《罗田县志》中的一张光绪二年(1876年)罗田县行政区划图中,有骡走河地名,并标明,骡走河属平湖乡。在平湖乡中,有骡走河、簪形地、余家坳、松子关等(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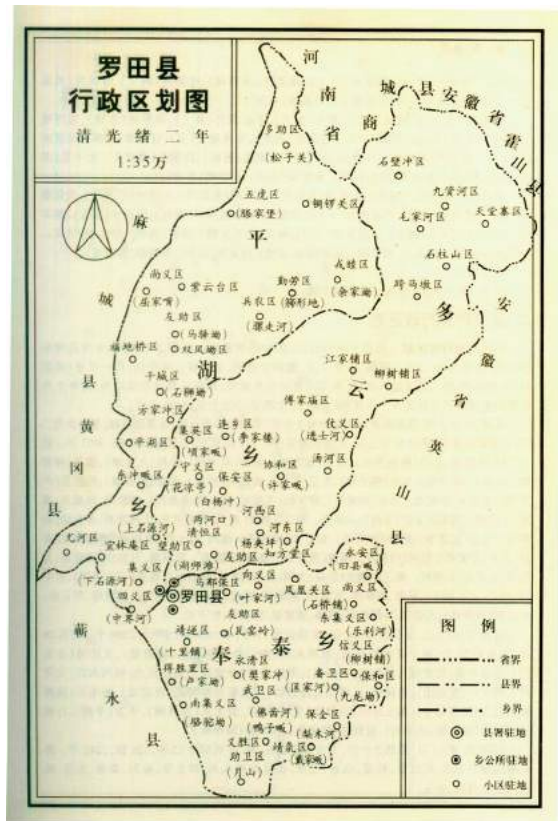


图1 光绪二年湖北罗田县行政区划图

其中,平湖乡在罗田县的西北部,骡走河在县城的北方,与簪形地相邻,在簪形地西南方不远处。

民国以后,“骡走河”这一地名,逐渐消失。

现今,“骡走河”叫何名称,在罗田县地方志中,已无法查出,只好另辟蹊径。

据查,在当地新编《湖北罗田朱氏》族谱中,曾提到过“骡走河”地名:

“根据罗田朱氏家谱记载,我们大别山朱氏族姓里,大都出自南宋理学宗师朱熹嫡长子熟公之房支下:第一支为朱熹祖的第六代孙朱盛公支下。盛公在元季至正年间,携康氏夫人即三子:仁卿、显卿、和卿一家人从原籍江西乐平县黄泥塘,渡鄱阳来到湖北黄冈境内,见大别山山川秀丽,物产丰饶,就落户在此,长子仁卿卜居罗田骡走河(今河铺镇簪形地);次子显卿卜居今浠水县华桂乡尤河;三子和卿随康老夫人定居黄冈上巴河标云岗,侍奉母亲,盛公后仍返故里,卒于原籍。”

文中有,“长子仁卿卜居罗田骡走河(今河铺镇簪形地)”之句,其括号内的注释,颇为重要。

也就是说,昔日罗田县骡走河,即今日罗田县河铺镇簪形地。

河铺镇,在罗田县西北部,距县城凤山镇37公里,位于大别山南麓新昌河畔,与薄刀峰风景区接壤。

河铺境内,物产丰富,盛产板栗、甜柿、楠竹、蚕茧、茶叶、药材等,是远近闻名的板栗之乡、桑蚕之乡、甜柿之乡、楠竹之乡,农特资源种类繁多,品质优异。“龙王露”精制茶叶曾获湖北省第二届“陆羽杯”金奖,名贵中药材苍术、杜仲、桔梗、百合、槐米走俏全国,唐家山的甜柿、林家咀的萝卜远近闻名。

簪形地村,位于县城凤山镇西北31公里,新昌河东南岸,小河入口处。因春夏水涨,地处河边,形似竹簪,故名。

清代和民国时期,簪形地的山货物产,极为丰富,品种繁多,加之,水路交通便利,早已成为罗田县中部山区农副产品的交易集散地。因而,商业繁荣,经济发达,金融活跃。

因此,湖北清代早期的“福隆字号”民间木刻板钱票出现于此地,显然,不无原因。

但是,从前述光绪二年(1876年)的地图中得知,骡走河的位置,相当于在现今的“长林岗”附近位置。由于,解放后簪形地曾是区辖“簪形地镇”,原骡走河地区归其管辖,也许,这才有骡走河即“今日河铺镇簪形地”之说。

因此,骡走河今日之确切地名,还有待于进一步

确认。但是,无论如何,骡走河地址,就在罗田县簪形地附近,这是确定无疑的。

二、“福隆字号”木刻板钱票

“福隆字号”壹串文木刻板钱票,为竖式,宣纸印刷,已变黄,具有鲜明的历史沧桑感,宽110毫米,高244毫米(图2)。



(正面)

(背面)

图2 湖北罗田县骡走河“福隆字号”木刻板钱票

该票正面边框和文字,为蓝色。边框为一幅典型的抹角长六角形牌式框格图案,单层,框格内绘制的是“八仙图”,左右各三位,上下各一位神仙,其形象简略而朴拙。这是我国早期木刻板钱票中的常用图案。

所谓八仙,通常指,铁拐李(李玄/李洪水)、汉钟离(钟离权)、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何晓云)、吕洞宾(吕岩)、韩湘子、曹国舅(曹景休)等八人。

框格中部的空间,分为上、下两格:

上格,通常称作“天格”,印有篆书“源远”二字,似有“源远流长”之意。此处通常为书写发行商号名称的位置,“源远”二字并非发行商号名称,颇为特殊。

其上盖一枚红色长方形文字防伪章,其中文字,据说是唐太宗的《养生百字铭》,现今仍有参考价值,值得一读:

“欲寡精神爽,思多血气衰,少杯不乱性,忍气免伤财,贵自勤中得,富从俭里来,温柔终有益,强暴必

招灾,正直真君子,刁唆是祸胎,养身须修德,欺心枉吃斋。衙门休出入,乡党要和谐。暗中休使箭,朋友莫拆台,安分身无辱,防非口莫开,世人依此语,灾退福星来。”

下格,通常称作“地格”,其内文字分为左右两行:

右行,文字为面额:“憑票发九十钱壹串正,据”。文字其上端,“憑票”二字处,盖有一枚抬头章:“福隆”花瓶图案章;

“钱”的左半边金字旁,为印刷,右半边,为手写。说明此商号有可能还发行一种银两票。

“九十”,为旧时商用数字写法,系兑付率,即一千文兑付九百文之意。其上盖有一枚方形押数章:“福隆钱票”章,有篆、楷两种文字;

面额“壹串”二字之上,也盖有一枚同前方形“福隆钱票”押款章(图3)。

左行,自上而下,分别是:

编号:“第三0十九号”;

发行时间:“丙寅”冬月二十六(日);“丙寅”,对应于同治五年(1866年)和民国十五年(1926年)。鉴于该票具有明显的清代形制特征,笔者认为,是同治五年(1866年)。(见后述)冬月,即农历十一月。“丙寅”二字,为一枚“丙寅年号章”所盖。

发行年月之下方,盖有一枚长方形落地章:“骡走河福隆字号”(图4),说明该票由地处“骡走河”的“福隆字号”商家所发行。

“字号”,即商店、商号或商行。不过,通常称作“字号”者,其规模应稍大,或其历史较久远。

在钱票左侧上端,还盖有一枚“福隆钱票”骑缝章。

钱票背面,为空白,无图案。

大家知道,图案、文字、印章和纸张等,是我国早期民间钱票上所采取的主要防伪措施,这里,印章颇具特点,且十分齐全,按其作用分,有骑缝章、抬头章、押数章、押款章、年号章、落地章及文字防伪章等



图3 “福隆钱票”印章



图4 “骡走河福隆字号”落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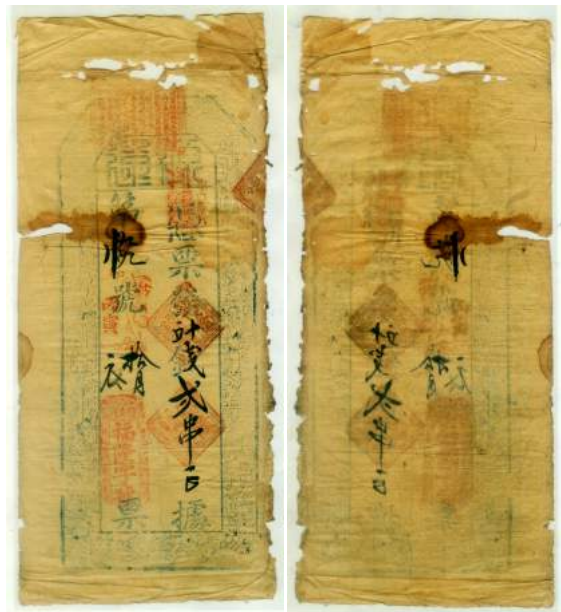
七种。

需要指出的是,一枚方形“福隆钱票”章值得关注。

这是因为,该章不仅一章多用,如在此票上,可同时作为骑缝章、押数章和押款章之用;而且,该章的出现,还可以证明,清代同治时期湖北地区民间商号发行的纸币,其正式名称,被叫做“钱票”。

这样的证明资料,十分重要,又极其难找。

此外,这次集得的“福隆字号”木刻板钱票中,还有一张面额为贰串文的(图5)。该票宽110毫米,高245毫米。其编号为第二0九九号;发行时间为“丙寅年拾月底”,即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底。比前一张早约一个月,是其中发行时间最早的一张。



(正面)

(背面)

图5 湖北罗田县走河“福隆字号”木刻板钱票

加盖印章的数目和品种完全一样,只是骑缝章和文字防伪章的加盖位置有所变化而已,不必细说。

三、发行时间分析

如前所述,“福隆字号”木刻板钱票,发行于丙寅年。丙寅年,对应于清代同治五年(1866年)和民国十五年(1926年)。

该票发行于哪个年代,应当进行分析。

笔者认为,应当是清代同治五年(1866年),其理由如下:

(一)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以后,湖北清代民间钱票中,几乎都是石印纸币

清代,湖北尤其是汉口地区,是引进近代石印技

术最早的地区,且十分发达。光绪中后期,就有本地商人开办的石印厂家,开始印刷石印纸币,成为国内较早印刷石印纸币的印刷厂家。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以后,汉口石印技术已十分成熟,并具有一定规模,已成为南方地区印刷石印纸币高度发达的地区,并为湖北、湖南、江西等诸多商家印刷钱票。尤其是湖北和湖南省,其光绪时期的民间石印纸币,绝大部分都是由汉口印刷厂家印刷的。

对湖北地区而言,从钱票实物分析,目前所见,其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以后发行的清代民间钱票几乎全是石印纸币,而湖北木刻板(牛角版)民间钱票实物最晚的发行时间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

也就是说,目前没有见到过光绪十六年(1890年)以后的湖北清代木刻板民间钱票。

(二)民国十五年(1926年)时,湖北民间木刻板钱票早已绝迹

由于湖北地区印刷业高度发达,因此,民国十五年(1926年)时的湖北民间钱票,已普遍采用石印或铜刻板印刷,钱票实物亦是如此,而木刻板钱票,已几乎绝迹多年。

显然,“福隆字号”木刻板钱票,不可能此时在湖北发行。也就说,基本上排除了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发行的可能性。

这一情况,与北方如山西、陕西、河南、河北诸省,明显不同。这些地区,由于印刷业不够发达,印刷技术落后,民国时期,仍有不少商家仍在使用的木刻板钱票。

(三)具有湖北早期清代民间钱票的形制特征

“福隆字号”木刻板钱票,具有湖北早期清代民间钱票的形制特征,这种特征,在光绪以后的湖北清代民间钱票中,极少看到(见后述)。

基于以上理由,可以认为,“福隆字号”木刻板钱票发行于同治五年(1866年),从而排除了发行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的可能性。

四、重要价值与意义

同治五年(1866年)“福隆字号”木刻板钱票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湖北最早的清代民间钱票

如前所述,此前笔者曾发表文章认为,发行于同治七年(1868年)的武昌府“裕盛钱号”壹串文木刻板钱票(图6)是此前所见发行时间最早的湖北地区民间钱票实物,同时也是湖北地区发行最早的木刻板民间钱票以及湖北地区钱庄业发行最早的钱庄票。



(正面)

(背面)

图6 同治七年日湖北武昌“裕盛钱号”木刻板钱票

从目前所见的“福隆字号”木刻板钱票实物来看,该票发行时间为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到十二月底,比同治七年(1868年)的武昌府“裕盛钱号”壹串文木刻板钱票,早一年多,因此,该票就成为目前所见发行时间最早的湖北民间钱票,同时也是湖北地区发行最早的木刻板民间钱票。

(二)湖北最早的清代纸币

清代,湖北地区不仅民间商号发行纸币,地方政府即所谓官方,亦发行纸币。

史料记载,清代湖北官办金融机构发行钱票的时间,最早开始于同治末年。

据民国时期《湖北省金融》载,

“咸、同时代,发生内乱,频年用兵,度支浩繁,令各省招商设立官银钱号,发行银票、钱票。提当杂各商生息帑银及库存之卯钱,拨交官银钱号,充票本。是时,湖北设立公济益官银钱号于武昌;设立协成、有成两官银号于汉口,发行银票、钱票。而私人营业之钱店,群起仿效,发行银票、钱票,政府不加干涉,为湖北发行纸币之滥觞。”^[4]

又载:

“迨同治末年,湖北承洪杨兵燹之后,金融苦竭,商民交困,乃招商设立官银钱号,拨给库存银两;充官银钱号基金,准发行银票、钱票,流行市面,活动金融,而私人营业之钱店,群起仿效,发行钱票。”^[5]

由此可知,同治末年,湖北省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及活跃地方金融,拨给库存银两作为基金,在武昌设立“公济益官银钱号”一所,在汉口设立“协成官银号”和“有成官银号”两处,其职能是:发行银票、钱票;兼营银炉业,铸造银锭^[6]。

这里的所说银票,通常有银两票和银元票两种;钱票指制钱票。遗憾的是,至今还未发现湖北这些官银钱号或官银号发行的银票或制钱票实物。

目前所见,湖北官办金融机构发行最早的钱票实物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湖北官钱局壹千文制钱票(图7)。



(正面)

(背面)

图7 光绪二十二年湖北官钱局壹千文制钱票

此时发行纸币的情况,在《张之洞全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初四日“行用银元钞票示”公文中,有所记载:

“现飭司局於省垣设立官钱局,……并刊发银元官票,加盖本省藩司印信,与善后局所发加盖司印,每张一千之钱票,相辅而行,以期转轮不竭。”^[7]

也就是说,湖北官办金融机构“公济益官银钱号”的设立时间和湖北官钱局制钱票的最早发行时间,均晚于“福隆字号”木刻板钱票的发行时间同治五年(1866年)。

不言而喻,“福隆字号”木刻板钱票,就成为包括地方官方纸币和民间纸币在内的湖北地区发行时间最早的清代纸币。

因此,“福隆字号”木刻板钱票,在湖北纸币发行史上和湖北纸币印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

义和价值。

(三)湖北早期清代民间钱票的特殊形制

同治五年(1866年)“福隆字号”木刻板钱票,与同治七年(1868年)武昌府“裕盛钱号”木刻板钱票比较,尽管其发行时间仅相差一年多,但是,两者在形制上却有较大的差别,而“福隆字号”木刻板钱票具有更早期的诸多木刻板钱票特征:

其一,边框的形制更加原始。

尽管两者的边框形状,都是抹角长六角形牌式图案形状,但是,“福隆字号”票的边框为单层,其内图案更显粗狂古朴;而“裕盛钱号”票边框为双层,外层绘制图案,内层书写的是古代文章诗篇等,而这种双层框格结构,到光绪时期,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和发展。因此,“福隆字号”票显得更加原始。

其二,天格文字,性质不同。

就框格内部的空间部分而言,尽管两者都有天格和地格之分,但是,天格和地格内书写文字的性质或分布特征,两者却有所不同。

就天格而言,通常,天格内的文字,为发行钱票的商号名称。

“福隆字号”票却不同,天格内文字却是“源远”二字,显然“源远”不是发行钱票的“福隆字号”商家名称。

在北方,早期民间钱票中,“天格”中往往填写“执照”、“兑票”、“支票”等文字。不过,在南方,却有所不同。这种现象,多有出现,尤其在光绪早期或更早的年代。例如,福建早期钱票中,常有这种情况。湖北早期民间钱票中,这是首见。

“裕盛钱号”票天格内书写的文字,为“裕盛号”三字,与发行钱票商家的名称一致。

其三,地格文字分布特征,亦明显不同。

前述两种钱票,其地格文字的分布特征截然不同。

“福隆字号”票地格文字分布,为左、右两列分布,如下图:

源 远	憑票發九十錢壹串正,据 第三百十九号,丙寅冬月二十六,“骡走河福隆字号”,票 (落地章)
--------	--

右列为面额文字位置,左列为编号(无冠字)、发行时间和落地张位置。这种地格文字两列分补特征多出现于清代早期民间钱票中,如山西及沿海福建等地。

“裕盛钱号”票地格文字分布,为左、中、右三列

分布,如下图:

裕 盛 号	基字壹千九百卅六号(编号) 憑票發錢壹串文 同治戊辰年正月十五日,“裕盛钱号”(落地章)票
-------------	---

右列为编号(有冠字),中列为面额文字位置,左列为发行时间和落地张位置。这种地格文字三列分布特征多出现于清代晚期民间钱票中,如光绪和宣统时期。

对湖北而言,地格文字三列分布特征的钱票,自同治七年(1868年)“裕盛钱号”木刻板钱票开始,直到光绪和宣统时期的清代石印钱票,几乎都采用这种三列分布特征。

也就是说,对湖北来说,“福隆字号”票这种地格文字二列分布特征,出现的时间更早,属湖北早期清代民间钱票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将“福隆字号”票判断为同治五年(1866年),符合湖北民间钱票的历史发展实际。

因此,以上这些特征的存在,使得“福隆字号”票已成为湖北早期清代民间钱票的典型代表。

(四)数量极少

这次发现的“福隆字号”木刻板钱票,系首次发现,极其稀少,加上,该票又是湖北最早的一批清代纸币,因而就显得更加珍贵和重要。

综上所述可知,同治五年(1866年)“福隆字号”木刻板钱票,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史料价值、收藏价值和鉴赏价值;该票的发现,具有颇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 [1] 张或定,夏红艳,张劲峰.武汉发现大批清代钱庄票的调查与考证[J].中国钱币,2008,(4).
- [2] 张或定,夏红艳,张劲峰.湖北最早的清代钱庄票[J].中国收藏·钱币,总第6期.
- [3] 罗田县志·卷一地理志[M].明嘉靖二十一年.
- [4][5] 湖北省银行编.湖北省金融[M].第2节,纸币;第4节,钱庄;民国25年.
- [6] 张或定,张哨峰,张劲峰.清代湖北官局、官银钱号及官银号设立情况考[J].武汉金融,2009,(12).
- [7] 张之洞.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初四日“行用银元钞票示”[A].张之洞全集[M].第六册,第83卷,公牍83:4889-4890.

《中国古钱移范币概论》 付梓前的思考

■ 陈焕龙

我国先秦货币的铸造,使用较为原始的泥范、石范或者陶范工艺,这种铸造工艺,称之为平版铸造工艺法。此法生产效率极低,费时、费工、费力。每铸钱品一、二枚,钱文多是就范而刻,所成铸品千面各样,但却鲜见钱品移范现象(也许存在其它主、客观因素)!我国先秦及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钱文设置大多对仗工整,生动华美。且这种钱文格式一直影响至我国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多朝的“对钱”(公元一一七四年)。秦“半两”、汉“五铢”是我国货币流通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尤其是“五铢”,从汉代(西汉武帝元狩五年)的公元前一一八年,至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六二一年)。近八百年历史的“五铢”钱,版式极其复杂,泥范、砂范等具体钱品铸造工艺很多都存在议论至今。唐“开元通宝”始,去其古称“半两、五铢”的重量铭文,改为以“宝”之名,铸其钱币。从唐“开元”起,就有各式古钱移范品,尤其是晚唐的“会昌开元”(公元八四五年)。此时起,古钱的附加文化内容也逐渐地多了起来。如:钱面、背的“星、月”记符,另有多达二十三种的各郡州地名的背记文字。其钱质、钱形均不及前朝,也出现了许多古钱移范现象。关于中国古钱的背“记年”,则始于我国宋代的“淳化元宝”(公元九九〇年)。古钱背文,同时铸有记年、记域的,则流行于南宋多朝,包括铁钱的诸多品种。我国宋代,近三百多年,历经五十六朝。钱式复杂,铸量巨大!尤其是宋神宗、哲宗时期。两帝共出五品流通古钱(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元符),统治江山三十二年,年铸古钱达数百万贯!虽时有增减,但仍居两宋之首。

今天我们探讨古钱移范现象,着实绕不开我国古时铸钱的范模演变历程。古时铸币,从先秦至清末,有三法。谓,平版铸造法、叠铸法、母样钱砂铸法。

中国古时没有出现铜范前(公元前二二一年),采用的是平版铸造法。即:泥——泥范,泥——石范等。由于泥质范模极易损坏,后改进为泥范入窑烘烤,从而提高了范模的硬度,形成了质地较硬的陶范。经过漫长岁月的探索,人们即用泥陶范翻制成铜范,用铜——陶、铜——铜范,来铸造钱币,解决了平版铸造工艺量产不足和范模极易受损的问题。从而逐渐形成相对先进的模铸工艺流程,创立了新的叠铸工艺法。但叠铸法有些根本缺陷,如:单铸数量虽提高很多,但此法的前期准备时间长,工序繁杂。所以,与平版铸造相比,数量、质量等并不占优。从相对多的唐、宋古钱移范币实物来看,叠铸法易造成所铸产品质量不保的先天不足。直至新莽前,叠铸法几经弃用。惟汉莽期,大举重用!以上两法,最晚止于隋唐。因为现存世的古钱范,不论是泥、石、陶、铜等实物来看,鲜见隋唐及后朝的铸钱范模实物,想必我国铸币的第三法,即:母样钱翻砂法,已经形成。从本人收藏的古钱移范币实物来说,上自先秦、春秋战国,下至清末民初。古钱移范币的存在,同样伴随着我国各朝行用钱,传承上千年!对于古钱移范现象,更须探求古时的政经更迭、范模演变、钱监制度、工匠失误、铸造工艺、铜合金比等等。尽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

厘清古钱移范的历史原因,不是为了拔高移范币的虚有价值,也无须赋予它多么深刻的特殊含义!古之有,补其遗,古之无,探为先!修古学,添其新。这应该是我们当下古钱研藏人的目标与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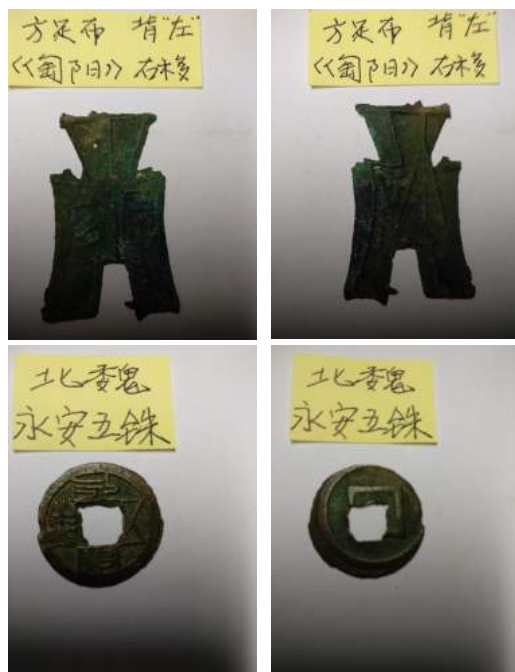
鉴于我国唐、宋时期的古钱移范现象,大大的多于其他皇朝,加之从我国先秦至清末,各类古钱移范币的实物链接,感性认知告诉我,再也不能对它们不屑一顾了!

为此,对古钱移范币现象的思考——

- 1.古钱移范,破坏了人们的视觉审美。
- 2.移范的古钱附加文化符号,如:背记年、记域、记值,极大地扭曲了设置初衷。
- 3.移范的背、面“星、月、祥云”等古钱,颠覆了中国皇、民及宗教文化对敬畏宇宙,崇拜天体的神圣朝拜。
- 4.有些古钱移范品种,凸显了古时铸造钱币材质的合金比例变化信息。
- 5.古时多种钱范的演变及进化,对移范的影响探究。
- 6.古时冶炼、范模工艺的得失,对古钱移范的客观影响,及人为失误的探想。
- 7.古时政、经更迭,制度缺失,对古钱移范的具体证例。
- 8.定位古钱附加文化移范品,为“错品”的诸多理由和依据。
- 9.尝试给各类古钱移范币定级的基础条件及依据。
- 10.给各类古钱移范币归类的三种表现形式:①形体移范;②变体移范;③错体移范。

综上所述,试图从古钱的多误成“错”(移范)的角度,多维度的讨论古钱移范现象,以及泉界长期以来,对古钱移范现象的多种说法及思考,拙著《浅论》,均有记录。

形体移范图例,变体移范,错体移范简图如下:







所以,中国古钱移范现象,异常复杂。不是一个“趣品”、“废品”所能概之。广义的形体移范与古钱附加文化错置的移范,两者间有根本的区别。为此,须有理性的认知及复加甄别。一为添加人们对古钱集藏有新的乐趣。二来为古钱移范的成因,价值取向,激起更清醒、认真、深入的思考。诚然,仅凭一士之识,难成修为。想必只因有敢先、创新、解惑、补遗的研藏理念在心,以无愧于对中国古钱之爱好。愿与泉界同好,为中国古钱文化的传承、探研及发展,共同添砖加瓦,为中国古泉园地的繁荣、播香撒雨,作些有益的探索及园丁般耕耘足矣! ■

清末民初湖北光化县老河口镇 典型民间钱票

■ 张或定 张峭峰 张劲峰

(湖北省钱币学会)

清代、民国时期,老河口镇一直是光化县的县治所在地,该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光化县,位于湖北西北部,居汉水中游东岸,今称老河口市。

光化县,历史悠久。宋熙宁五年(1072年),改乾德县为光化县,为光化定名之始。1979年11月,划老河口镇及近郊置县级老河口市。1983年撤销光化县,并入老河口市。现由襄阳市代管。老河口市,因老河口镇而得名。

老河口镇,地处汉水中游东岸,扼川陕咽喉,控鄂西北及川、陕、豫水陆交通接壤地区之要道,历为“四省物资集散地”,商业繁盛,素有“小汉口”之称。

作为晚清至民国时期汉水流域的老河口商埠,一向有“天下十八口,数了汉口数河口”之说。说的是,老河口和汉口之间1400多里的汉水地段,共有十八个带口的地名的水路商贸码头,显然,老河口镇是这十八口中仅次于汉口镇的水路商贸码头。这“十八口”分别是:老河口、南河口(谷城)、清河口(襄阳)、哑口(宜城)、燕口(宜城)、涘河口(钟祥)、中山口(钟祥)、池河口(钟祥)、狮子口(钟祥)、旧口(钟祥)、泽口(潜江)、西阳口(潜江)、岳口(天门)、蚌湖口(汉川)、羊子口(汉川)、马口(汉川)、鸽子口(汉阳)和汉口。

老河口镇的形成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水便利的运输条件。当时,汉水上游陕西安康以下一千多里的山区土特产,莫不沿汉水航运至老河口集散,而下游汉口等地的工业产品亦靠水运至此成交,老河口因此成为上下游货物的中转枢纽,使得此地的市场日趋繁盛。随着岁月的流逝,老河口逐渐成为汉水上一个重要的节点。清末民初,老河口已成为手工业发达、商业繁盛的鄂西北重要商埠。

经济的发达、商业的繁荣,民间金融必然活跃,显然货币交换也十分繁忙。因此,民间商号发行的钱票,也参与市场的货币交换流通。

清末民初,老河口镇诸多商号,也不例外,曾发行过各类钱票。

据《老河口市金融志》记载:

“1928年官票失效后,老河口商会为了解决市场交易现金短缺的困难,先后4次共发行了80万串文铜元票在市场上流通,面额有壹百文、贰百文、伍百文、壹串文、贰串文、伍串文(可惜,至今未见实物——笔者注)。1933年湖北省政府对市票加以取缔,老河口商会进收回焚毁507187串文。至1935年法币在老河口流通时,市票始绝迹。”^[1]

随着历史沧桑变化,老河口镇民间钱票,已并不多见。目前所知,现存的民间钱票,仅有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数种。不过,这些钱票,既有湖北早期的清代石印钱票,又有地方金融机构钱庄和当铺发行的钱票,而且,这些钱票在湖北地方民间钱票中,颇有代表性,为此,特选择几种典型老河口民间票,加以介绍和分析。

一、老河口镇名称的历史演变

历史上,老河口镇的名称,随着城镇发展有不同叫法。

早在明末时,老河口镇为汉水之滨一沙洲码头,位于光化县城城西,名叫“新集”。当时,仅有民船停泊。清乾隆年间,汉水涨大水,新集冲没逾半。后来,又在县城西南八里处另建新集镇。至雍正三年(1725年),时任光化知县孟琅以新集“人烟稠密,五方杂处,百货交集,商贾辐辏,烟火万家的富庶之区”改名“新集”为“新镇”。

后来,因新镇濒临汉水的河口,民间习惯上称新镇为河口镇。随着城镇的发展与新街道的形成,原河口镇的街道,逐渐变成了一条老街,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扩大规模河口镇,又被叫做“老河口镇”,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地方政府正式更名新镇为老河口镇,显然因地处汉水故道之口而得名。

二、光邑河口镇谭家街“允昌祥”商号钱票

2011年上海泓盛秋拍中,有一张光邑河口镇谭家街“允昌祥”商号钱票(图1),竖式,红黑双色石印,高约265毫米,宽约105毫米,它是湖北光化县清代民间钱票中最早的一种石印纸币,也是湖北较早的清代民间石印纸币。



(正面)

(背面)

图1 光化县河口镇谭家街允昌祥壹串文, 光緒丁酉23年,(1897年)汉镇汪日升印书局

钱票正面图案,分上下两部分。

上部为一幅帆船图,其下端,有“光邑”二字,“光邑”,即地名,湖北光化县。从文字特征分析,“光邑”二字,系由铅字印刷。石印与铅印结合,是我国早期民间石印钱票的一个重要特征。

正面图案下部,为一幅长方形多层框格图。框格中均书写有文字。

外边框上端,书写的是清朱柏庐的文章《治家格言》,该文是以家庭道德为主的启蒙教材: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文字末尾,注明印刷厂家:汉镇汪日升印书局。

湖北汉口镇汪日升印书局,地址在汉口洪益巷(今民生路磨子桥洪益巷),是汉口地区最早设立的

一批石印厂家,曾为湖北及外省诸多商家印刷过钱票,也是一家清代较为知名的印刷企业。

外边框四周,书写的是几乎家喻户晓的《千字文》:

“天地玄(元)黄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张 寒来暑往 秋收冬藏 闰馀成岁 律吕调阳 云腾致雨 露结为霜 金生丽水 玉出昆冈 ……”

此边框上端,有“河口”和“谭家街”诸字,即商号地址,河口镇谭家街。

河口镇确实有一条谭家街,然而如今已不在。抗日战争时期,经日本和美国飞机两个月的轮番轰炸,已荡然无存。

不过,当年的谭家街,位于现在的胜利码头国税大楼至老河口饭店这一段(今胜利路西段),因清朝咸丰年间,这里有家谭姓大户,深宅大院,并配有山石庭园的谭家花园,故命名为谭家街。

谭家街街面宽敞,青石板铺路,店铺林立,商业繁荣。清末民初时,是谭家街的鼎盛时期。据说,谭家街还是一条旧时的“文化街”,当年的书铺、石印馆、笔墨庄都设在这一带。民国初年,陕西南部(汉中、南康)诸多市县民间商号发行的钱票,有不少都为老河口镇谭家街上的石印厂家印刷。

谭家街上,不但有显赫的大商号,而且一些叱咤风云的头面人物曾住过此地。例如民国初期美孚洋行和英美烟公司驻鄂北的大办谷海峰以及稍后的商会会长黄杰山,国民党第五战区财务处长、少将张伯海,当过县长、本地著名书法家历东园等。

内边框中,书写的是南宋名臣文天祥的《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框格图内部的长方形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部,通常称作“天格”,内有商号名称“允昌祥”三字。

下部,通常称作“地格”,其右侧,为编号位置,有“处字第叁百貳七号”诸字,数字处该有一枚圆形押数章(一半),兼做骑缝章用。其下方印有说明文字:“笔迹图章,验看真伪”。

“笔迹图章,验看真伪”诸字,十分重要,它说明,“文字、图案及印章”是该票的重要防伪手段,这是印刷技术还不太先进时期我国早期民间钱票中的常用防伪措施。

中间部分,为面额位置,印有“憑票发九八钱壹串文整”。“壹串文”处盖有一枚菱形押款章:“允昌祥

记”。“壹串文”画了圈,说明此票已兑付。

“九八”数字,为旧时商用数字写法。“九八”为兑付率,即壹千文兑付九百八十文之意。

左侧,为发行时间位置,印有“光绪丁酉年吉月吉日、丁酉年”,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票”字上方,加盖一枚落地章:“老河口:允昌祥记”。说明此票为老河口镇允昌祥商号发行。其发行时间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落地章中的“老河口”与前面“河口,谭家街”相对应。再次证明,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新镇正式改名老河口镇之前五年,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时,民间已将光化县新镇,叫做河口镇或老河口镇了。

此外,钱票之上,还有多处流通时留下的文字或印章。

钱票的背面图案和文字,为绿色,也分上、下两部分:

上部,为一幅“四轮马车图”,具有西洋风格。

下部,为一幅长方形图案。边框,由许多相同的小型几何图案排列组合而成。

其上部,为一幅“亭阁风景图”,具有西洋风格。

其下部,为一幅“大厅图”,富丽堂皇,具有西洋风格。

这一部分的文字和图案,似利用西方铅版印刷技术印刷的。显然,这是我国早期引进西方近代印刷技术(尤其是铅印和石印技术)时期的一个典型特征。

由此可知,该票与我国传统的木刻版印刷纸币,明显不同,是我国采用西方近代印刷技术后最早出现的一种典型石印纸币。

三、老河口开泰街“乾丰”钱庄壹百文票

德国钱币专家白尔文(Erwin Beyer)先生,藏有一张湖北光化县老河口开泰街“乾丰”商号壹百文钱票。2016年7月,白尔文先生将其正面图案介绍到我国纸币网站,为了便于研究以及了解该票的整体面貌,在笔者的建议下,白尔文先生随后又将背面图案晒出,这才看到其庐山真面目。

“乾丰”商号壹百文钱票,系竖式石印票,单色印刷(正面蓝色,背面红色)(图2)。

钱票正面图案和文字,均为蓝色。其图案由上、下两部分组成:

上部,印有一排“光化县老河口”六个大字。

下部,为一幅长方形多层框格图。

其外框格内,绘制的是“人物图”:上端为一幅



(正面)

(背面)

图2 光化县老河口开泰街“乾丰”商号壹百文票

“合和二仙图”,其下有“开泰街”三字,即发行钱票商号的所在地。

今日开泰街,已无此名称。不过,据说老城区正兴街往北,经过机关幼儿园和滨江社区,这一段路大约两百来步,原来叫做“开泰街”。现在每天早上是一个自由形成的菜市场。

“合和二仙图”下方及左、右、下端框格内,绘制的是“十八罗汉图”。

此种“合和二仙图”和“十八罗汉图”的布局、形象及景物等特征,与民初上海书画家谈梅庆绘制的有关图案,极为相似(图3)。

在内框格中,书写的是南宋大文学家苏轼的《凌虚台记》: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

其末端文字是“汉口鲍家巷口河街万玉



图3 山东临沂“瑞丰永”商号票

(钰)美石印”,即印刷厂家。

多层框格中部,由天格和地格组成。

天格内,有“乾丰”二字,即商号名称。

地格右侧,为编号位置,有“为字第九百六九号”及说明文字“只作市用,不兑铜元”诸字,冠字和编号为人为后填。

地格中部,为面额位置,印有面额“憑票作市用钱壹佰文整”。“壹佰”盖了一枚篆书押款章:“乾丰钱号”,说明“乾丰”商号是一家钱庄,显然,此票应为一张钱庄票。

地格左侧,为发行时间位置,有“民国元年梅月吉日”。梅月,指农历四月。在“票”字上方。盖有一枚落地地章:“乾丰”。“元年梅月吉日”中,毛笔字为人为后填。

“乾丰”钱庄和“乾丰”壹佰文钱票的发行时间,在老河口地方志中有明确记载。据《老河口金融志》载:

“1921年,政府财政枯竭,银根奇缺,老河口商会发行纸币,‘乾丰’、‘四顺’两钱庄发行壹佰文和伍佰文的钞票投放市场流通,致使金融极为混乱,物价一日书涨。”^[2]

由此得知,“乾丰”壹佰文钱票发行于民国十年(1921年)。并由此证明,毛笔书写的冠字、编号和年月日期等,均为人为后填。

钱票背面,为一幅由边框、几何图案和风景图组成的长方形图案。其间有地址“老河口开泰街”和面额“壹佰文”诸字。

边框图下方,印有一排印刷厂家文字:“汉口河街鲍家巷口万钰美印”。

万钰美石印局,地址在汉口河街鲍家巷口,设立于民国初年,是一家小有名气的印刷企业,曾为湖北及湖南、江西、河南等诸多商号印刷过钱票。

目前所知,此票为仅见的一种光化县钱庄发行的纸币。

四、老河口“协济便民质兑换券”大洋贰角票

2014年7月,“赵涌在钱”拍卖的一张光化县老河口镇协济质当发行的“协济便民质兑换券”大洋贰角票。这是目前仅见的一张民国时期光化县当铺发行的纸币。在湖北民间钱票中,当铺钱票极为少见。

老河口镇“协济便民质兑换券大洋贰角票”,是一张横式石印票(图4)。

正面图案,由边框和中心图案组成。边框中心图案以及文字,均为蓝色,底纹为黄色。

中心图案是一幅面额文字“兑换大洋贰角”图



(正面)



(背面)

图4 光化县老河口镇协济质“协济便民质兑换券”大洋贰角票

案,其左右两边两幅椭圆形风景图,据说是湖南长沙的天心阁(右)和衡山南岳庙(左)。这是清末至民国时期湖南省地方银行及民间钱票的常用图案。

中心图案上方,印有“协济便民质兑换券”几个大字,其中左右印有行色英文:“HOO KOW”和“SIA KEE”。

中心图案下方,印有“出入兑换,均听市价”。

边框左右内测,印有“字、第号”及“本年本月即日”等字,编号未填,说明此票系未发行票。

边框四角,分别有“大洋”和“贰角”诸字。

边框下方,印刷厂家“汉口大郭家巷采新祥代印”,汉口大郭家巷采新祥石印局,也是一家小有名气的石印局,曾为湖北、湖南江西及山西等诸多商号印刷过钱票。

钱票背面图案,由红色长方形边框及几何图案组成,边框内部几何图案中,有露白“协济便民质兑换券”几个行书打字。其上印有黑色说明文字:

“启者,本镇银洋缺乏,当赎出入,计算账目,殊感困难,本质为求双方便利起见,兹仿照他镇先例,特制此兑换券,一边零星当赎,既省手续,而利流通,

湖北“京山县京皂京东路 购买汽车临时借券”

——罕见京山县政府与商会纸币

■ 夏红艳 张或定

清末民初,湖北诸多城镇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商家或个人,曾发行过大量钱票,后经历代战争及政权更迭等历史沧桑,加之,地方政府多次收缴、销毁,至今能留存下来者,已十分稀少。与邻省湖南、江西和河南等省民间地方纸币相比,湖北属数量较少的省份,其中,由市县地方政府机构和市县商会发行的纸币,尤为稀少,已成为民间地方纸币爱好者十分青睐的热门品种之一。

2014年10月,笔者集得二张民国二十年(1931年)“京山县京皂京东路购买汽车临时借券”壹圆券,该券十分罕见,系首次发现的新品种,数量极少。前不久,此券发现于湖北京山县农村,当得到消息购买时,借券却辗转到湖南省,又几经转手,这才购得。

研究表明,“京山县京皂京东路购买汽车临时借券”名义上是京山县地方行政机构“京山县京皂京东汽车公路处”发行,实际上,它也是地方政府与京山县商会为了发展本县运输业而共同筹款发行的,该

券具有湖北地方政府机关纸币和湖北县市商会纸币双重性质,其历史内涵,颇为丰富,值得研究与分析。

一、京山县京皂公路与京东公路

京山县位于湖北省中部,素有“鄂中绿宝石”之美誉,地处大洪山南麓,江汉平原北端。东临安陆、应城,西接钟祥,南连天门、沙洋,北倚随州。今日已成为大洪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之一。

京山,处于鄂中丘陵至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以低山、丘陵、岗地为主,因而,旧时公路交通不便,也极不发达。

史料记载,民国十五年(1926年)年以前,京山在交通方面只有县河一条水路,东经天门皂市,通往汉口。这条河的特点是:转弯多、滩多、石头多,水浅。从京山县城(今新市镇)到天门县皂市,全程一百二十华里。从京山到皂市为下水,船只需要三天,上水拉纤,却要六天,沿途还要筑坝蓄水才斡通行,

此券票面无论整洋零洋,与现洋价值一律通用,按照本镇钱业公会每日市价,随时向本质兑换所兑换,绝不迟误,此致。老河口协济质仅启。”

协济质当铺,在地方志中,有所介绍。据《老河口市金融志》载:

“清光绪年间,老河口有鸿昌、顺和、聚兴三家当铺,时称三典,清末至1933年,农民借贷所、协济便民质(合营)、协昌(合营)等10多家当铺相继在老河口开业。按其资本额的大小,可分为典、当、质、押四种。”^[1]

由此可知,“协济质”是老河口镇一家资本不大

的当铺。

尽管协济便民质兑换券的发行时间,未见记载,但从老河口市当地民间钱票的发行历史情况分析,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湖北省政府开始对民间发行的钱票严加取缔,老河口商会也开始执行,并烧毁各种民间钱票50余万张。由此判断,协济便民质兑换券的发行时间,大约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之前几年。■

[参考文献]

[1][2][3] 湖北省老河口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老河口市金融志[M].老河口市第一印刷厂,1993:15+22+21.

所以天(门)汉(口)一带的船户,有两句谚语:“要得船底穿,上一次京山”。

京山的陆路,也只有一条通往皂市的古驿道。驴驮人挑,运输十分困难。

民国时期,京山县的公路建设,十分简陋和薄弱,路程很少,起步很晚,直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才开始修建本县公路,三年后,民国十五年(1926年)修成。仅有的公路,也多为军用,且屡遭战争毁坏,运输萧条。

“京山县京皂京东路购买汽车临时借券”上所说的京皂路,即京皂公路,指京山县城到东边邻县天门县皂市镇公路;京东路,即京东公路,指京山县城到西边邻县钟祥县东桥镇公路。

实际上,京皂公路,就是历史上京山县修建的第一条公路。也就是说,京山县的公路建设,起始于京皂公路的修建。

(一)京皂公路

作为京山县第一条公路的京皂公路,并非由京山县政府修建,而是由京山县商会会长张昆生集资修建的,这一情况,十分罕见。

实际上,京皂公路是在县政府拒绝修建这种无奈情况下,由于得到工商业者大力支持,商会会长张昆生决心“造福桑梓”,自筹资金修建,

《京山县文史资料》中,有文章专门介绍: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川汉铁路的路基(即汉宜公路)逐渐延伸到皂市,汉口到皂市之间的汽车运输也日益频繁,而皂市又是京山、天门、应城三县接壤之地,水陆交通十分方便,如果从京山修一条公路连接皂市,京山的交通就会完全改观,无论是土特产的推销,还是商品购进都不会发愁了。然而,京山到皂市的交通现状虽只六十里之隔,却如万里之遥。当时县政府的官老爷,只顾自己贪图享受,对此熟视无睹,京山商民看到交通问题,不仅是国计民生的大事,而且关系到工商业者的切身利益,于是,积极要求商会出面倡导,修通京(山)皂(市)公路,当时商会会长张昆生也颇有一点‘造福桑梓’的抱负,他以繁荣市场必须货畅其流为理由,用商会名义写出报告,并且亲自上县衙议商修路事宜,请求‘官办商助’,未曾想到的是县府下达的批复是:‘修京皂公路本府表示赞许,惟政府只能在行政上征派民工,予以支持,所有修路之经费,均有你会自筹。’于是,‘官办商助’变成了‘商办农助’。修路这付重担因而落到商会双肩上了,真叫人哭笑不得。”^[1]

修建京皂公路的资金,主要以京山商会会长张昆生家产作抵押,依靠发行汽车股票的办法,由商民

购股捐助筹得。汽车股票,分红、绿两种,红色为五百文,绿色为一百文。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还未发现有关汽车股票传世。

又据《京山县志》记载:

“(京皂公路)全长62公里。民国12年,京山商会会长张昆生家产作抵押发行股票没筹建京山至皂市的公路。次年,集资就绪,从汉口请一工程师勘测定线,由沿线各乡摊派施工。民国15年竣工。原计划路线自县城向东南经曲家场、永兴镇、九里岗、邓李家场,至皂市。邓李家场以公路经过会破坏风水为由,阻挠施工,只得绕道经曹家场、汤池、折至皂市。由于财力不足,线路多是因陋就简、随弯就弯。沿途桥梁均用松木架成。通车后,无人看管,路、桥损坏严重。民国20年,县政府又与商会共同筹资补修。”^[2]

由此可知,京皂公路完全由京山县商会会长张昆生,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筹资,民国十三年(1924年)开始修建,民国十五年(1926年)建成通车。民国二十年(1931年)时,因路况极差,通行困难,才由京山县政府和京山县商会共同筹资维修。

民国二十年(1931年),正好是“京山县京皂京东路购买汽车临时借券”的发行时期。

(二)京东公路

据《京山县志》记载:

“民国23年,京皂路向西延伸至钟祥县东桥,当年通车。接着,由延伸到钟祥县城。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民为抵御日军进犯,多次将路段毁坏。抗战胜利后,经维修,勉强通车。”^[3]

从民国二十年(1931年)发行“京山县京皂京东路购买汽车临时借券”的情况分析,此时京东公路,也已经修成。因此,《京山县志》中,有关民国二十三年京东公路修建通车之事的记载,时间上晚了三年,显然有误。

也就是说,实际上,京东公路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或之前就已建成。

再从京东公路作为京皂公路向西延伸之路以及“京山县京皂京东路购买汽车临时借券”的发行是“以京皂公路和京东公路为担保”(见后借券“附注”)分析,京东公路,也是由京山县商会会长独家集资修建,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维修公路时,京山县县政府才参与,与京山县商会共同集资维修修建公路。

因此,京山县商会是京皂公路和京东公路的实际建造者。

二、京山县京皂京东路购买汽车临时借券

“京山县京皂京东路购买汽车临时借券”,为红

蓝双色石印,长193毫米,宽90毫米(图1、图2)。



(正面)



(背面)

图1 湖北“京山县京皂京东路购买汽车临时借券”

临时借券正面图案,由边框、中心图案、底纹及文字组成。

中心图案,为一幅“孙中山头像”,印制十分规范逼真。在湖北,印有“孙中山头像”的民间地方钱票,极为少见。中心图案上方,印有借券的名称:“京山县京皂京东路购买汽车临时借券”。中心图案下方,印有发行者:“京山县京皂京东汽车公路处发行”。中心图案左右两侧,分别有面额“壹”和“圆”二个大字。

边框右边内侧,有编号,分别是“车字第陆壹壹号”和“车字第陆柒捌号”。

边框左边内侧,有发行时间:“中华民国二十年、月、日”诸字,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文字下方盖有方形红色一枚落地章:“京山县京皂京东汽车公路处印”。再次证明该券由“京山县京皂京东汽车公路处”发行。

边框四角,分别有面额“壹、壹、圆、圆”诸字。

边框内部空白处,印有红色底纹。

借券右边骑缝处,书写有冠字和编号,并盖有一枚菱形红色骑缝章:“京山县汽车公路处之章”,均为一半。

临时借券背面的长方形边框和文字,均为草绿色。边框中文字为临时借券的发行章程:

“附注:

(一)本借券定额为六千元;

(二)本借券专供京皂、京东路购买汽车之用向旧一、二、七等区募集;

(三)本借券月息一分,自开车之日起,按月计算,以每年六月底、十二月底为付息期,其资金以经过三年以抽签法分三期偿还;

(四)本借券不准流通市面及完纳官税;

(五)本借券定为一元、五元、十元三种;

(六)本借券以京皂、京东路为担保。”

由此得知,“京山县京皂京东路购买汽车临时借券”的发行总额为六千元,用来购买用于京皂公路和京东公路运输(客运和货运)的汽车。月息一分,三年还清。面额有一元、五元和十元三种,可惜,目前仅见一元一种。

总的来看,该借券品相完整,编号、印章齐全,印刷规范,属流通行用票。

需要一提的是,借券上并未注明该券的印刷厂家,从而留下一些遗憾。不过,通常这类纸币大都是汉口印刷。因本券图案别具一格,独树一帜,目前还未找到与其对应图案的其他纸币,因而,暂时还没法确定其印刷厂家。

三、发行背景

民国二十年(1931年)“京山县京皂京东路购买汽车临时借券”的发行者,名义上是“京山县京皂京东汽车公路处”,实际上是地方政府与京山县商会为开拓京山公路运输事业共同集资购买汽车筹建京皂、京东公路的运输服务业。

如前所述,京山县商会是两条京山公路的建造者,显然,此公路的运输(客运和货运)经营权,也属京山县商会。

据《京山县志》载:

“(京山县)货运:民国15年(1926), (京山)县商会购买一辆破旧汽车,从事货运。”^[4]

然而,后来县政府见公路和汽车有利可图,从而利用手中的权力,无偿将其收回。这一情况《京山县文史资料》中有记载:

“‘有路无车等于零,驴驮人挑照样行’。商会为了买车,又不得不债台高筑,一九二六年夏,才从汉口买了一辆‘二水货’汽车,沿街大小商家,无不喜形于色,纷纷鸣鞭庆贺,当作‘活宝贝’迎接,不久,汽车开始营业,尽管路面‘晴通雨阻’,倒也客货两忙,颇

有一些发荣景象,更可喜的是,商家再也不受皂市长期“过载”之苦,汽车的收益,与日俱增,发行的股票,也之日可还。谁知好景不长,不到半年,县衙觉得有利可图,便利用权力将车路实行“官管”无偿地接收了公路,这样一来,股票就成了废纸,商会所借的债务,也落到张昆生的头上,他的个人资财也蒙受了损失。”^[5]

县政府接管公路和汽车后,因经营不善,最后落得个“车废路损”的结果。这一情况,也有文献介绍:

“汽车接管后,继续营业,人们满以为从此可以减轻驮人挑之苦了,哪知道,这辆‘二水货’的汽车,因无人专管,只用不修,已经是祸在眉头!同年年底,这辆车因机件失灵,不幸坠毁于皂市近郊,长期丢在路旁,任人拆拿,变成一堆废铁。……从此以后,车、路无人过问,路基日益毁坏,杂草丛生,牛踏马践,泥泞不堪,连人走也困难了,这就是京山最早一条公路的命运。”^[6]

鉴于以上情况,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补修公路时,京山县政府汲取教训,只好决定与京山县商会共同集资,共同管理,即“官商共管”。

此时,除维修公路本身之外,也要增强和恢复公路的运输设备,购买汽车发展运输业,也就成为当务之急。因为这一项目,是地方政府与商会共同集资筹办的,因此,临时借券以购买汽车就以政府下属机构“京山县京皂京东汽车公路处”名义发行,以增强发行的信誉和权威性。购买的汽车,用于公路运输,而公路的具体经营显然由商会承担,这样“京山县京皂京东路购买汽车临时借券”,就成为地方政府与京山县商会用于集资购买汽车而发行的一种纸币。

四、京山县商会

如前所述,京山县商会是京皂公路和京东公路的建造者和经营者,由此,也可以看出,京山县商会在民国时期京山县公路建设和公路运输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和具所有的重要地位。

京山县商会,设立于民国元年(1911年)四月,地址在县城,晚于成立于宣统三年(1910年)五月的本县宋河镇商会。据说,民国初年,京山县商会会长叫何延泽。民国八年(1919年)时,会长为查大藻,当时有董事24人,会员近300人。

民国十二年(1924年)时,修建京山公路的张昆生为会长,因工作成显著,深受商民爱戴和喜爱,一直任职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军侵入京山。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京山县商会恢复筹建时,又推选张昆生担任筹备会长,一直

任职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

据《京山县志》记载,

“(京山县)商会设会长、俗务、主牒、杂役各一人。主要办理工商登记、筹议工商业发展、管理市场、评议物价、协助政府完成税收、处理商户纠纷等”。^[7]

由此得知,京山县商会既有负责工商业登记和市场管理职能,又有协助京山县政府完成税收和筹议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政府职能,凸显其重要性。

京山县商会处理事务,复杂众多,但仅有四人,可见其人员之精明能干。

如前所述的“修建京皂公路和京东公路”以及“发展京山县运输事业”此类重大事项,显然已列入该商会的“筹议工商业发展”等业务职能范围之内。

五、重要价值

“京山县京皂京东路购买汽车临时借券”的发现,具有重要价值:

1.特殊题材纸币。利用发行纸币来筹资购买汽车这类题材的纸币,在湖北民间地方纸币中,十分罕见。

2.罕见孙中山像纸币。在湖北民间地方纸币中,印有孙中山像者,极其稀少。而该券正面图案以孙中山像为中心图案,其两侧为面额图案的布局,也极少看到。

3.新发现品种,数量极少。

4.具有湖北地方政府机关纸币性质。该借券发行者“京山县京皂京东汽车公路处”,系京山县政府的下属机构,因而,该券属湖北地方政府纸币范畴,在湖北,这类纸币极少。

5.京山县商会筹款纸币。该借券的实际发行者是京山县商会,而购买的汽车,也是归京山县商会运输企业所有,借款的偿还,也是由京山县商会负责。因此,实际上,该借券具有商会纸币性质。在湖北,商会纸币也极其少见。

综上所述可知,“京山县京皂京东路购买汽车临时借券”,具有湖北地方政府纸币和商会纸币双重性质,图案独特新颖,又属极少的新发现品种,显然是湖北民间纸币爱好者青睐的热门品种,值得收藏与鉴赏。■

【参考文献】

[1][5][6] 曾达三.京山县第一条公路[J].京山县文史资料,第2辑,1984.

[2][3][4][7] 京山县志[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257+257+263+457.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湖北省银行伍角辅币券

■ 吕怀平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印制的湖北省银行伍角辅币券。据相关资料记载: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一月,实行法币政策,统一发行。鄂省内地小额筹码缺乏,市面急需辅币券。为缓和市面流通,该行(湖北省银行)复于二十五年(1936年)八月,呈奉财政部核准,委托中央信托局代向上海大业印刷公司订印壹角,伍角辅币券五百万元。由于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日本侵略军袭沪,上海大业公司仅印伍角券七十五万就被迫停工,另外四百二十五万元,由大业公司于民国二十七年秋移至香港后才继续印制,民国二十八年底全数印完,民国二十九年五月运抵重庆,加印签字后,至民国三十年上半年陆续运往鄂西北各行处发行。

此伍角辅币券票幅规格68毫米×124毫米。正面由发行单位、发行年份、票券面额、票券编号、建筑图案、单位印章、文字说明及印制单位等图文组成。即: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湖北省银行发行伍角辅币券,编号由字母开头的六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建筑图案:汉阳“古琴台”图。古琴台又名俞伯牙台,始建于北宋,重建于清嘉庆初年(公元1796年)。现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龟山西脚下的月湖之滨,是中国音乐文化古迹、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汉市文物旅游景观之一,与黄鹤楼、晴川阁并称武汉三大名胜,有“天下知音第一台”之称。

单位印章:左有“行长印章”、右是“董事会印章”图。董事会是湖北省银行监理机构。民国十七年十一月至民国二十二年七月监理机构是“监理委员会”,民国二十二年八月至民国二十五年八月改为“理事会”,民国二十五年九月后为“董事会”。

文字说明:“集成拾角向汉口总行兑国币壹元”。汉口总行:民国十七年春(1928年3月),辛亥名人张难先先生就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后,为解决当时湖北金融的恐慌,促进湖北经济的发展,决定要筹建湖

北省银行。民国十七年七月一日,经湖北省政府委员会决议通过,成立湖北省银行筹备委员会。经过四个月的筹备,湖北省银行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一月一日在汉口(江汉路28号)成立(总行)。

印制单位:“中国大业公司”。根据“该行(湖北省银行)复于二十五年八月,呈奉财政部核准,委托中央信托局代向上海大业印刷公司订印一角,伍角辅币券五百万元。”及“上海大业印刷公司由上海沪北工捐局局长李屑清创办,儿李祖永后出任厂长,中央银行也对大业的印刷品感到满意,专请该厂为中央银行印刷钞票。”的说明,“中国大业公司”应该也就是“上海大业印刷公司”。

此辅币券背面由建筑图案、行长和董事长签名、发行年份、票券面额及与正面汉字对应的英文等组成。即:

建筑图案:湖北襄阳“古隆中”牌坊图。古隆中牌坊,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湖北提督程文炳所建。现古隆中是一个以诸葛亮故居为主体的风景名胜,在鄂西北襄阳市与南漳、谷城交界处。1994年列为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1996年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行长签名:背左是行长“南夔”签名。南夔(1897-1946),浠水胡河人,1917年日本东京庆应大学习金融专业,1923年毕业归国,先后任教于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7年后历任湖北省农工厅科长、中央银行经理、武汉临时财



图1 南夔

政会议武汉分会财政委员科科长、湖北省银行总经理、张楚中学校长等职。1949年12月因煤气中毒逝世。在湖北省银行工作期间,民国十八年六月至二十一年四月为第二任行长、民国二十二年九月至三十年十二月再次出第五任行长。

董事长签名:背右分别有贾士毅、杨绵仲、赵志垚签名三种(图2-图4)。



图2 南夔、贾士毅签名(正、背面)



图3 南夔、杨绵仲签名(正、背面)



图4 南夔、赵志垚签名(正、背面)

贾士毅:江苏宜兴人(1887-1965),民国时期教授、会计学家、财政学家、国民政府财政部常务次长,江苏省国民政府代理主席。1949年移居台湾,继续效力于金融事务。1965年7月9日,于台北市逝世。民国二十五年九月至二十七年六月,贾士毅为湖北省银行董事会第一届董事长。



图5 贾士毅

杨绵仲:湖南省湘潭县人,国立北京大学毕业,1928年11月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1929年9月至1931年6月任江西省政府秘书长。1930年10月至1931年12月任江西省政府委员。1931年12月至1934年12月任浙江省政府委员。1935



图6 杨绵仲

年1月至1938年3月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民国二十七年七月至二十八年三月为湖北省银

日照县田赋流通券考辨

■ 李银¹ 李天聪²

(1.山东交通技师学院; 2.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连云港市分行)

目前面世的日照县田赋流通券似乎有四种版别,分别是伍角券、壹元带冠字券、壹元无冠字券和壹元无冠字加盖“二支队”券。

伍角券(图1),票幅107×65mm。正面蓝色,方框四角各印“伍角”字样,方框内花纹图中间竖印面额“伍角”,花纹图上面是券名,花纹图两边分别竖印“完

粮纳税”、“一律通用”,面额下方是流水编码,流水编码两边各有一方框,方框内分别加盖“县长之章”、“主任之章”印鉴。背面绿色,方框四角各印一“5”字,主图是山景院落,主图位置加盖“日照县地方财政监察委员会”印鉴,主图下边是年号“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印”,年号下方印“此券两张兑换国币壹元整”。



图1 伍角券(正、背面)

行董事会第二届董事长。



图7 赵志焄

赵志焄:原名为赵淳如,生于1895年,原居住地在青田县高湖镇东山村。1928年4月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中校会计科长,1929年8月任武汉十一师军需处长,民国二十八年三月至三十一年三月为湖北省银行董事会第三届董事长,1948年任国防部预算局局长,1962年3月去

世。

由以上可知,湖北省银行民国二十五年版伍角辅币券的三种加“签名”版发行于三个不同时期,即:

南夔、贾士毅签名发行于民国二十五年九月至二十七年六月,在上海印制;

南夔、杨绵仲签名发行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至二十八年三月,在香港印制;

南夔、赵志焄签名发行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至三十一年三月,在香港印制。■

[参考文献]

- [1] 湖北金融研究.1983:21.
- [2] 湖北省银行二十周年纪念特刊.第二节组织.
- [3] 湖北省金融志[M].上卷:72.
- [4] 李宜华.李祖永和大业印刷公司及永华影业公司.
- [5] 湖北省财政月刊[J].1卷5期:2.

壹元冠字券(图2),票幅125×76mm,图幅113×63mm。正面蓝色,方框四角各印一“壹”字,方框内左半部分图景主要由花纹图围绕着的城门(似正阳门)及年号构成,右半部份中心是花纹图和面额,其上方是券名,右边印“完粮纳税”,左边印“一律通用”,下方是“县长之章”、“主任之章”两颗印鉴。背面绿色,方框四角各印一“1”字,主图同上,主图位置亦加盖“日照县地方财政监察委员会”印鉴,其右边加盖了相同印文的骑缝章,主图下边是带冠字“赋”的流水编码。依照当时冠字的编排习惯,这组冠字至少有“田”字,甚或有“日”、“照”、“县”、“田”、“赋”、“流”、“通”、“券”八个字。



图2 壹元冠字券(正、背面)

壹元无冠字券(图3),票幅129×78mm,图幅116×64mm。正面蓝色,图案大体同上。背面绿色,图案亦大体同上,唯流水编码前无冠字。

壹元无冠字加盖“二支队”券(图4),除了背面右下边加盖“二支队”字样外,其余均同上。

据《日照市志》载,地方上发行的纸币有日照县政府发行的“日照县田赋流通券”壹圆和伍圆券。这里的“伍圆”当是“伍角”的笔误。因为目前发现了五角券而未发现五元券,另据1939年3月召开的国民政府第二次全国金融会议决议,省银行或地方银行

可按规定领用一元券及辅币券,自发者不得增发,以及国民政府行政院孔祥熙院长“准许战区地方金融机关酌量发行一元币及辅币,以节制法币,防止敌人



图3 壹元无冠字券(正、背面)



图4 壹元无冠字加盖“二支队”券(正、背面)

夺取”的启示^[1],日照县政府自然不能发行一元以上的纸币。再者,其周边如赣榆、临沂、莒县等地,同期也都只发现一元及以下的辅币券。

《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录有1944年11月3日《大众日报》刊登的《山东省行政委员辛葭舟批驳国民党提出的取消民主地区发行之货币问题》^[2]一文,文中说“许树声(国民党莒县县长)、尹昇五(国民党日照县长)、董玉佩(国民党赣榆县长)均出过田赋流通券。”尹昇五当是尹鼎武的笔误。据此可以认定伍角及壹元带冠字券系日照县长尹鼎武发行。

壹元无冠字券的纸质、印刷工艺和壹元无冠字加盖“二支队”券相同,且二者流水编码一致,可以认为两者是同时期印制的。壹元无冠字券与壹元冠字券的差别就不仅仅在冠字上了,纸质、图幅及图案细微处均有差别,两者显然不是同时期印制。笔者见到的壹元无冠字券均无流通痕迹,经咨询莒县钱币收藏大家陈长峰先生,他也未见流过通过的壹元无冠字券。而壹元冠字券则恰恰相反,笔者见到的均有很明显的流通痕迹,从未见过未曾流通的壹元冠字券。此现象一则说明壹元冠字券流通了较长时间,二则说明壹元无冠字券是壹元冠字券的再版。

有学者认为,壹元券面上的“二支队”券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孙继先部)。笔者不敢苟同。理由有三:第一时间上不支持。该二支队组建于1939年3月,主要活动于临(沂)费(县)边区,5月调往新泰东南一带,6至7月反“扫荡”期间返回费县,1940年3月,在沂南孙祖、铜井一带抗击日伪军,9月上旬进入滨海区^[3],当月中旬改编为山东纵队第二旅。尹鼎武1940年7月始任日照县长,即便上任后立即着手印发流通券事宜,从票面设计、制版、印刷、发行到再版,二个月的时间当勉为其难。第二加盖形式不支持。如果加盖是为了昭示该券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发行或核准使用的,则“二支队”条形戳应加盖在正面显眼的地方,以区别其它日照县田赋流通券。如果该批券系二支队在战斗中缴获,打算用出去后又不回收,而将财政负担转嫁给国民党日照县政府,则不会加盖“二支队”字样。从形式上看,这种在不显眼位置上的加盖,主要是为了内部识别。第三货币政策不允许。根据地的货币政策是禁止土杂钞流通。当你禁止民众使用土杂钞的时候,自己却在使用,甚至是发行,这种行为极其恶劣。八路军怎么可能为了眼前的些小利益而败坏自己的声誉。

笔者以为,如果壹元无冠字加盖“二支队”券不是后人伪盖,则其必为鲁苏战区第一纵队(张里元

部)第二支队加盖。这是因为当年日照驻军中,日伪军无“二支队”作战单位,前面已经排除了系八路军二支队加盖的可能,而国民党的日照驻军中唯有张里元部有“二支队”作战单位。

《临沂市军事志》等史料载,“张里元随第一支队驻日照、莒县,第二支队驻沂水、费县一带山区”^[4]。笔者不同意此说。理由如下:据《费县志》载,1938年春天,张里元率4500余人进驻费县城及上冶、薛庄、诸满一带^[5]。据《临沂历史大观》载,“临沂城失陷(1938年4月)以后,张里元率部撤于费县、沂水一带山区。”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入鲁后,张里元部被编为鲁苏战区游击第一纵队。第一纵队下辖二个支队:第一支队驻防日照,支队长卢连章;张及第二支队(支队长郝芸溪)仍在沂(水)费(县)山区沙汀峪一带。1940年春,张里元奉命率部东迁莒(县)日(照)边境,驻扎于西起莒县桑园,东至黄海之滨长达百余里的山区。原驻日照的第一支队,也因日军的进攻而移驻日照北山区汤家沟一带^[6]。1943年3月,张部奉命西移。从当时的环境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先是驻鲁中沂水东里店,后移驻鲁中蒙阴的鲁村,鲁苏战区总司令部亦驻沂水一带。张里元任临沂县长前,曾任沂水县长,颇有政绩,受民拥戴,其随二支队活动于有民心、地形熟且靠近省政府及鲁苏战区总司令部的费县、沂水一带是合情合理的事。从张里元的作战部队分布看,1939年,张部共有9个步兵旅和1个特务团,旅的兵力在1000至1200人之间,特务团1000人。特务团和第一、第二旅是其骨干。第一旅驻日照,第二旅驻沂水,第三至第七旅布防于临沂西南、郯城、峄县、滕(县)东、费(县)西一带,第八旅驻防青驼寺(原属沂水,今属沂南)至淄博边境,第九旅驻临沂境内,特务团随司令部活动。也就是说,张里元的部队主要分布在鲁南至鲁中一带。1939年6月1日至7月14日,日军以两万兵力发动了“扫荡”沂蒙山区的所谓“鲁南作战”,张部第一旅未遭敌围,而特务团受敌创,说明司令部当时在沂蒙山区。之后,张里元将“扫荡”中遭受重创的第五、六、七、八、九旅合编为补充支队,约一千五、六百人,第二、三、四旅合编为二支队,约二千八百人,第一旅为一支队。卢连章离开第一支队后,补充支队编入第一支队,何志斌任支队长,驻防日照。以此看,特务团仍随二支队活动在沂水、费县一带,且二支队是主力部队,张里元理当随二支队活动。从编纂史料的单位看,依据笔者的体会,当地政协编纂的史料往往更全面、更真实可靠。

由于壹元无冠字加盖“二支队”券中“二支队”的

墨色有别于印鉴及流水编码墨色,笔者对此加盖持怀疑态度,故向陈长峰先生索取了数枚加盖和未加盖的壹元无冠字券图片连同本人藏品的图片进行对比分析。笔者将这些图片按纸币流水编码由小及大的顺序排列(见图5-图9)。纸币的流水编码始于001250,止于001283,在跨度三十四个编码的号段中,三枚(001251、001260、001270)加盖了“二支队”,二枚(001250、001283)未加盖,说明当时不是连续加盖的。加盖“二支队”的三枚纸币均无流通痕迹,说明当时是在新票上加盖的。在新票的某一号段内,非连续式加盖某一标识很不正常。这进一步加深了笔者对该加盖的怀疑。



图5



图6



图7



图8



图9

壹元无冠字券有没有可能系张里元部发行?目前尚未发现有流通痕迹的壹元无冠字券,这就意味着当年这版流通券有可能印了未发行,或是发行了不久即停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抗战全面爆发前,张里元任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临沂县长。第三行政区辖临沂、郯城、日照、沂水、莒县、蒙阴、费县、峄县等8个县。抗战全面爆发后,虽然由于时局巨变专员政令难以下行,以张里元的职权,其部队要发行日照县田赋流通券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由于张里元部被改编为鲁苏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后,正式接受来自阜阳国民政府的补充,东迁日照后,即派人开放海口王家滩,使之成为食盐、火柴等民众急需的日用杂品转运地。该海口税收额颇大,收入可观^[7]。张里元部应该没有发行纸币的冲动。个人以为壹元无冠字券仍系日照县长尹鼎武发行。该券可能印发于1943年三四月间。当时山东抗日形势极为严峻,张里元部西移后,国民党日照县政府失去了靠山,税源大幅度减少,财政日子很不好过,为了维持机构运转,县长尹鼎武有可能被迫再次发行日照县田赋流通券。由于政府处于游击状态,加之日伪及我根据地都禁止土杂钞流通,以及这类纸币发行后大都不回收,民众对这种纸币缺乏信任感,发行不畅是情理中的事。1943年5月,新县长上任,流通券之事就不了了之了。

1939年,日照县政府机构设置如下:秘书室、民政科、财政科、建设科、教育科、粮政科、钱粮征收处、金库、司法处、警务处和保安大队等。■

[参考文献]

- [1] 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省档案馆.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下册)[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703.
- [2]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一册)[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188.
- [3] 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沂蒙革命纪念馆.中共沂蒙根据地党史大事记[M].济南出版社,2016:140.
- [4] 临沂市军事志编纂委员会.临沂市军事志[Z].内部资料,2010:361.
- [5] 山东省费县志编纂委员会.费县志[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12.
- [6][7] 临沂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临沂历史大观(第六卷)[M].黄河出版社,2009:453-454.

东固革命根据地 红色金融的作用及其传承

■ 刘小兰^{1,2}

(1.中国人民银行吉安市中心支行; 2.吉安市钱币学会)

东固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最早、时间最长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之一。“李文林式”根据地、“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是毛泽东、陈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东固革命根据地的评价。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地方武装不断扩大,听党指挥,为我党我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丰富了毛泽东“党指挥枪”、“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思想,成为当时最具特色的革命根据地。东固革命根据地红色金融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固革命根据地不同时期领导创建的金融活动,是苏区金融三奇葩之一。在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大喜日子里,在纪念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的日子里,研究东固革命根据地红色金融的历史地位作用,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红色金融资源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值得我们思考。

一、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红色金融及其作用

土地革命时期,江西吉安市青原区东固畬族乡是全国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中心之一,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创建了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等红色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政权,在东固建立了贫民(平民)借贷所、合作社、东古平民银行、东古银行、东固印刷所等红色金融机构,成为革命根据地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固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金融工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面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红色金融机构

1.东固贫民(平民)借贷所。1928年10月,中共东固区委和东固地区农民协会发动群众集资办起了贫民(平民)借贷所,帮助贫苦群众解决生活中一时借钱的问题,以抵制高利贷,克服农民生产生活中借贷的困难。东固贫民(平民)借贷所的融资活动,开启了东固革命根据地金融活动。

2.东固合作社。1928年12月,东固地区农民协

会为了发展根据地的经济,集资开办了消费合作社。“1929年秋,东固区苏维埃政府拨款6千余元,将消费合作社发展为东固消费合作总社。”^[1]1930年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领导工农群众开展分田、废债斗争,创办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2]。为了交易中的便利,东固消费合作社自行印发了铜元票在交易中使用。1930年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领导工农群众开展分田、废债斗争,创办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大力发展根据地经济。合作社的兴办,对于稳定物价,保障民众的生活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既帮助群众解决了生活困难,又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3.东古平民银行。为联合各阶层的经济力量,取得多方援助,扩大革命政权的影响,中共东固区委、东固区革命委员会决定设立平民银行。在贫民(平民)借贷所的基础上,1929年8月,平民银行委员会自筹资金三千元,“由红军二、四两团捐助基金四千元开设平民银行”^[3]。东古平民银行设在东固街上的一个店铺里,左边是东固区消费合作社,右边是东古平民银行。当时消费合作社的经理是欧阳坚泉,工作人员五六人,副经理是黄启绶,同时兼任平民银行行长。消费合作社和平民银行的工作人员互相协作办理业务。东古平民银行坚守信用,随到随兑,兑进兑出一个样,其纸币可兑换银洋,这一规定为银行建立了信用,取得了群众的信任。

东古平民银行旧址位于江西吉安青原区东固畬族乡圩镇,坐东南朝西北,占地189.51平方米。



东古平民银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在江西创办最早的银行,也是革命根据地以及中央苏

区建立的早期的银行之一,其发行的铜元票是现存最早的中央苏区纸币,面额有拾枚、贰拾枚、伍拾枚、壹佰枚4种。印制发行的江西苏区第一枚红色纸币东古平民银行铜元票拾枚,是现存最早的中央苏区纸币(当年东古平民银行油印“东古平民银行10枚”纸币已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它是我党财政金融早期负责人、在中央苏区从事财政金融工作的林伯渠同志的遗物),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红色金融历史遗存和文物史料。

4.东古银行。1929年10月,东固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赣西革命根据地已经由东固、延福等小块根据地发展到吉安、万安、宁冈等10多个县区,成立了赣西革命委员会。同年11月,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决定以东古平民银行为基础,扩大为东古银行。1930年7月,“赣西南政府已把东古银行扩充为西南政府的银行,在兴国县城、永新县城设立分行,银行在群众中信仰很深厚,”^[4]业务“收归(赣)西南政府财政部管理”^[5],营业范围有所扩大,其铜元票在赣西南地区广为流通,发行数量增加至近20万元。面值有10枚、20枚、50枚、100枚4种。由于东古银行发行的货币有充分的物质和资金保证,可以随时兑现,广大工农群众对党和苏区政府的充分信任和拥戴,货币发行取得很大成功,为促进赣西南苏区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5.江西工农银行及其印刷所。1930年11月,在战火硝烟中成立于富田,机构设在吉安友庆巷。江西工农银行及其印刷所,冒着硝烟弥漫的战火,跟随红军转移。开始由吉安撤到东固,而后由东固迁到永丰的龙冈,最后迁到瑞金、宁都。江西工农银行及其印刷所在东固营业,从未停歇过印刷纸币,为组织货币流通、活跃苏区经济、支援革命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6.东固山瑶下印刷所。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拨了2台石印机,配了一些石印工人,建了东固印刷所。该所专门负责印刷东古银行铜元票,保证了东古银行发行纸币的需要。1930年11月,为应付战时急需,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决定采取一项临时措施,将缴获的吉安临时辅助纸币壹角,由江西工农银行印刷所在东固山瑶下设立印刷场所完成,加盖印制“江西工家银行暂借发行券”和代表革命政权的图印,投放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流通。

7.东固山坑列宁书报社。1931年初,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将印刷江西工农银行铜元票的任务交给了东固山坑列宁书报社。满足了根据地经济发展和货币流通的需要。4月,江西工农银行印刷所与东固山坑列宁书报社并为江西省印刷厂,继续承担印刷

江西工农银行铜元票的任务。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成立并开始营业,江西印刷厂并入新成立的中央印刷厂和中央造币厂^[6]。

(二)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红色金融地位与作用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东固根据地处于国民党政权包围之中,敌人的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给根据地经济、红军给养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困难。红色政权建立为创建红色金融组织提供了根本保证,创建红色金融为开展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东固红色金融的创建与发展,始终与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建立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提供了有益借鉴,为革命根据地发展经济、支援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苏维埃国家银行、以及后来国家银行体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革命和金融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在政治方面:东固的红色金融是在东固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后创设的,东固红色金融的创办和发展,使红色政权有了必需的经济基础,东固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不断发展壮大,赣西南与闽西根据地逐渐连成一片,促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东固红色金融在货币发行上大多印有革命口号,是很好的宣传革命的工具。东固红色金融的先贤们,坚持信仰,坚守信用,勇于担当,执着奉献,通过其金融业务活动,为中国红色政权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2.在军事方面:东固的红色金融支援革命战争,保证了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的需要,使得苏区的革命战争有了必要的经济实力。东固革命根据地是反“围剿”的主战场,为了支援革命战争,东固的红色金融机构在战火硝烟中,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筹措战争经费,保证革命战争费用之需,使东固革命根据地取得一次又一次革命战争的胜利。

3.在经济方面:东固革命根据地红色金融的建立和发展,极大地支持了苏区的生产发展和经济建设,促进了商品贸易发展,调动了群众生产活动的积极性,不仅保证了红军建设需要,也较好地满足了苏区军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在红色金融业务建立发展经济过程中,创造了如低利借贷、调剂市场现金、促进合作社事业发展等,这些做法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是走在各苏区前列的。东固苏区发展经济的经验,在赣西南苏区普遍推广,对中央苏区的经济

工作起到了先行示范作用,开启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之先河。

4.在金融方面:东固红色金融建立和发展,为江西工农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红色金融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地建立并发展起来。贫民借贷所的建立,为群众开办低利借贷,扶持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促进地方贸易流通,便利群众生产生活;东古平民银行的创建,随后扩大成为东古银行,并下设分行,同时建立印刷厂,印刷发行货币;货币发行始终有着相当数量的基金做保障,币值稳定。东固红色金融活动的有益尝试,为江西工农银行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对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建立较完备的货币制度产生重要影响,为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统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金融组织,江西工农银行与闽西工农银行合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为中国革命金融事业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二、东固革命根据地红色金融基因的传承

东固红色金融先贤的勇往无前的牺牲精神、无坚不摧的革命斗志、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升华为红色金融的精神内涵。东固革命根据地红色金融资源丰富,目前发现的东固革命根据地银行、印刷(钞)厂等红色金融旧(遗)址有多处。东古平民银行旧址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目前东古平民银行旧址被青原区政府列入青原区畬族民俗特色旅游线路,红色金融资源已经成为红色旅游的重要内容,实现辖内红色旅游和绿色旅游的比翼双飞,成为当前红色旅游的一大亮点,以红色金融旅游为媒带动商业、餐饮、娱乐等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吉安市金融系统开展红色金融主题实践活动取得成效。如人民银行吉安市中支组织干部职工参观东固红色金融旧址,走访老红军、红色金融先贤后代及收藏爱好者,追寻苏区红色金融记忆;推出“我为红色金融添活力”系列活动,组织金融系统青年志愿者60多人,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活动,为畬族百姓送去致富理财知识;组织党员干部开展“忆峥嵘岁月,展央行辉煌”主题教育活动,组织110名行员到东固农贸市场开展金融知识现场宣传,为当地老百姓兑换残损人民币,解答金融知识咨询;为东固民族小学师生们开展反假货币知识培训,赠送“爱心书籍”300余册;为东固红色金融旧址的

保护筹措专项资金等。但是,红色基因传承任重道远,红色金融工作仍有待加强。

(一)加强基地管理,打造红色金融教育品牌

加快建立红色金融教育基地管理制度,加强教育基地设施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等工作,建立红色金融教育基地沟通协调机制,保证红色金融基地管理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可将以东固为中心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红色金融旧址、史料、货币发行实物、图片等纳入东古平民银行旧址展览,力争在东古平民银行旧址上挂省级、国家“红色金融传统教育基地”牌。通过开办红色金融专栏、举办专题讲座、建立微信平台和建立志愿者队伍等,使红色金融基地成为传播红色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平台和品牌。

(二)开发旅游产品,大力发展红色金融旅游

抓住东固的“红”和“绿”两大财富资源,把红色金融体验和绿色生态旅游结合起来,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策应吉安市委市政府号召,规划红色金融旅游专线,设计红色金融旅游商标,生产红色金融旅游商品,培养红色金融兼职导游,并抓好红色金融文艺创作,形成独具特色的东固红色金融旅游品牌,并使之成为吉安市,乃至全省、全国民众日常旅游休闲的好去处。

(三)加大资金投入,加快红色金融保护利用

筹措红色金融旧(遗)址挖掘保护专项资金,充分发挥相关部门在文物修复保护方面的专业优势和技术优势,推动辖内红色金融旧(遗)址的修缮保护利用工作。有关部门的财务预算编制中安排一定比例的专项资金,用于东固红色金融旧址保护、展览,让红色金融资源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 [1] 陈立明,邵天柱,罗惠兰.中国苏区辞典[M].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135.
- [2] 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1930年7月22日)[A].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M].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246.
- [3] 克珍.赣西苏维埃区域的现状(1930年2月19日)[A].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二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78.
- [4] 中共赣西南特委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7月22日)[A].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二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515.
- [5] 士奇,昌谐,天干.赣西南苏维埃区域的经济状况及经济政策(1930年10月12日)[A].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二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596-597.
- [6]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A].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金融事业[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20-57.

东古平民银行的创建及其历史贡献

■ 梁洁^{1,2}

(1.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2.江西省钱币学会)

东固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最早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全盛时期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人。提到东固革命根据地,很多人对此比较陌生,原因在于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东固革命根据地”这一正式说法。实际上,“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这个民间说法在革命老区江西广为流传;“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李文林式”根据地、“东井冈”的称谓,是毛泽东、陈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东固革命根据地的评价,也是学术界对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定位。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江西苏维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重要贡献。

可是,东固革命根据地长期以来淹没于中国革命历史的史海之中,尘封于历史档案的陈库底,一直鲜为人知,少人问津。国家博物馆藏品中的“东古银行”纸币曾经长期被标记为“东方银行发行的拾枚纸币”,直到本世纪初工作人员在清理馆藏藏品的工作中因不明“东方银行”属地,经与江西省钱币学会联系并到东固实地调研后,才发现原标记为“东方银行”的纸币实际上是珍贵罕见的“东古银行”纸币。

本文拟在对史料梳理、解读的基础上,阐述东古平民银行的创建及其历史作用。

1927年中共中央的“八七”会议召开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实现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

按照“八七”会议精神,中共江西省委结合大革命失败后江西的革命形势,制定了《中共江西省委秋收暴动计划》。经过中共江西省委一系列组织准备和思想发动工作,“从1927年秋至1928年初夏,江西各地暴发了20多次成规模的武装起义,是当时全国革命暴动最多的区域。”^[1]在中共组织领导下,位于“赣西的万安、泰和、永丰、吉安、安福、莲花等县,先

后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农民武装暴动,其中由共产党人赖经邦、曾炳春等领导举行的吉安县东固暴动获得成功。”^[2]

一、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东固位于江西吉安市青原区(原吉安县)东南部,地处吉安市青原区、吉水县、永丰县、泰和县和赣州市兴国县5县(区)交界处,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醇厚,利于屯兵设伏,开展武装割据。

(一)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开创

早在大革命时期,东固有一批青年学生在吉安读书,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成为吉安革命斗争的火种。大革命失败后,曾在吉安县教育局任巡学员的共产党员赖经邦、县总工会秘书长曾炳春、县农民协会常务委员高克念、汪安国等先后潜回家乡东固,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9月下旬,赖经邦秘密召集曾炳春、高克念、刘经化、段蔚林、汪安国等12名共产党员在东固敖上村开会,成立了中共东龙(东固和南龙)支部,选举赖经邦任党支部书记。同时决定重建东固农民协会,建立东龙游击队,以赖经邦为队长,会议决定组织武装暴动。会后,赖经邦通过亲戚关系,争取到了永丰县芹菜坑“三点会”绿林武装力量的支持,该武装首领段月泉率部下30余人、14支枪加入了东龙游击队,段月泉任游击队副队长。敖上会议为东固暴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准备和部署,是创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起点。

(二)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1927年11月12日,赖经邦、段月泉等人领导东龙游击队和农协骨干100多人,举行了东固暴动,出击邻近的吉安县富田区,捉拿当地大土豪,缴获枪支弹药,没收土豪家产,粮食衣物就地分给贫苦群众。

“11月13日,游击队和暴动队员又开赴与吉安城仅一河之隔的永和圩打土豪,筹得现款上万银元。”^[3]

东固暴动胜利后,附近的几支绿林武装纷纷前来投奔。1928年2月,中共赣西特委决定将东龙游击队和永吉游击队合编,组建成立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使东固的红色割据斗争有了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在这期间,共产党员李锦云、郭承禄、李育青等在吉安北部的延福地区也组建了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九纵队,开展武装斗争,取得了延福暴动的胜利,成为赣西南革命武装割据斗争的又一支重要力量。两支武装力量以东固为中心,南北呼应,互相配合,打击反动力量,不断壮大红色武装力量,扩大红色区域。1928年3、4月间,中共江西省委向中央报告:“永丰、兴国、于都三县交界处已形成割据”^[4],这标志着东固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并逐渐成为赣西南革命斗争的中心。

随着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东固的党政组织也逐步建立起来。1928年2月,在东龙党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东龙区委,同年10月,改为中共东固区委。东固农民协会改为东龙区农民协会,管理农村行政事务。

(三)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1928年9月下旬,为适应武装斗争需要,便于统一指挥,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奉命主持将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七、九两纵队合编,成立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李文林任团长兼党委书记,段月泉任副团长,曾炳春任团政治部主任。红二团的成立,使赣西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以东固为中心的红色区域割据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28年2月中旬始,在赣南也先后爆发了多处的农民武装暴动,建立起了红十五、十六纵队及一些小规模游击队,开辟了(于都)桥头革命根据地。1929年2月15日,按照赣西、赣南特委指示,将红十五、十六纵队及当地武装力量合并成立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

红二团与红四团密切配合、联手战斗,成为赣西南武装斗争的主力军,推动革命形势不断发展,根据地范围日渐扩大。于都桥头根据地与吉安东固根据地连成一片,“从桥头到东固约200里左右尽系赤色区域”,东固革命根据地得以扩大并巩固,“成为赣西南群众斗争最红的地方”^[5],是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四)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1929年7月,东固革命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东固革命政权的正式建立,并由秘密走向公开。在东固

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了东固的土地分配,土地革命推进了东固红色政权的建设。10月,在东固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东固区苏维埃政府成立。11月,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统一领导东固、延福及赣西各区工作。1930年2月,陂头“二七会议”后,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东固根据地并入赣西南苏区,成为赣西南苏维埃区域的组成部分,后被划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29年2月下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到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师,作短暂休整后,确定开辟赣南、闽西红色割据区域的方针,揭开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序幕。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统一的领导机关。1931年9月,在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军事“围剿”之后,赣西南与闽西根据地逐渐连成一片,形成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

二、东古平民银行的创建及发展

东固的红色政权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在巩固革命政权的同时,大力开展金融活动,开办银行,发行货币,掌握所辖地区的经济命脉,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

(一)东固革命根据地初期的金融活动

土地革命之前,东固绝大部分的田地和山林都被地主豪绅霸占,穷苦农民受尽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盘剥。1928年10月,中共东固区委和东固地区农民协会发动群众集资办起了贫民(平民)借贷所,帮助贫苦群众解决生活中一时借钱的问题,以抵制高利贷,克服农民生产生活中借贷的困难。东固贫民(平民)借贷所的融资活动,是东固革命根据地开展金融活动的起步。

1928年12月,东固地区农民协会为了发展根据地的经济,集资开办了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经营布匹、油、食盐、食糖、烟、火柴、鞋、斗笠等南北杂货,还经营生产资料、生产工具、收购山货,秘密采购白区商品,促进赤白区的贸易。“1929年秋,东固区苏维埃政府拨款6千余元,将消费合作社发展为东固消费合作总社。”^[6]“东固一个总社,东固的周围数十里都有分社,合作社是平民日常需要品,如布匹、盐、火柴、洋货等物,价值比其商店便宜一些,生意还好。”^[7]为了交易中的便利,东固消费合作社还自行印发了一种铜元票,在交易中使用。消费合作社的兴办,对于稳定物价,保障民众的生活需要,发挥了

重要作用,既帮助群众解决了生活困难,又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二)创办东古平民银行

1929年7月,东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为联合各阶层的经济力量,取得多方援助,扩大革命政权的影响,中共东固区委、东固区革命委员会决定设立平民银行,组成由刘经化、黄启绶、王全享、邱有文、李文莲等7人参加的平民银行委员会,筹建平民银行。由于有贫民(平民)借贷所的基础,平民银行的筹备工作比较顺利。1929年8月,平民银行委员会自筹资金3000元,“由红军二四两团捐助基金四千元开设平民银行”^[8]。

东古平民银行设在东固街上的一个店铺里,左边是东固区消费合作社,右边是东古平民银行。当时消费合作社的经理是欧阳坚泉,工作人员五六人,副经理是黄启绶,同时兼任平民银行行长。消费合作社和平民银行的工作人员互相协作,办理业务。

东古平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铜元票,面额有拾枚、贰拾枚、伍拾枚、壹佰枚4种,可随时兑换铜元。目前发现的纸币实物仅见有拾枚券。该铜元票横12.8厘米、纵6.3厘米。正面图案、文字均为蓝色,其上端自右至左横书“东古平民银行”行名,中间图案为椭圆形内旭日冉冉升起,图案上盖有方形红色“东古平民银行之图章”印章,该章为3行竖读,主景左右两侧花形框内书面值“拾枚”字样,券面下方自右至左分5行竖印“凭票即付当拾铜元拾枚”10个字,券面四角花瓣内斜书“拾”字,票右侧有竖读“行字第 号”字样,其间数字为红色手书;背面图案、文字均为红色,中间花形框内对称印有“共同生产 共同消费”字样,左右上方各有蓝色“东”字,下方右有“东古平民”、左有“银行之章”2枚蓝色方形印章,券背四角圆圈内斜书数字“10”。整个票面设计风格拙朴,制作简单。

(三)扩大为东古银行

1929年10月,东固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赣西革命根据地已经由东固、延福等小块根据地发展到吉安、万安、宁冈等10多个县区,成立了赣西革命委员会。同年11月,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决定以东古平民银行为基础,扩大为东古银行。

东古银行改组后,行长仍为黄启绶,行址不变,发行的纸币仍为铜元票,面额为拾枚、贰拾枚、伍拾枚、壹佰枚4种,流通范围日渐扩大。目前发现的纸币实物也仅见拾枚券。该铜元票横12.1厘米、纵7.6厘米。正面上端自右至左横书“东古银行”行名,其下方弧形内书“苏维埃政府”字样,中间为亭殿及树

木组成的风景图案,图案两侧分别竖印面值“拾枚”,右侧印有“赤色区域”、左侧印有“一律通用”字样,券面下方中间自右至左横排竖书“凭票即付当拾铜元拾枚”10个字,该文字两侧各有一方形小印章,右侧为“东古银行”、左侧为“银行之章”,最下端为“公历一九三〇年印”,券四角圆圈内对称印有数字“10”。券背面正中为古塔、树木、房屋等组成的风景图案,券四角圆圈内对称印有数字“10”,框外右侧竖印“字第 号”其间数字为红色手书。

1930年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领导工农群众开展分田、废债斗争,创办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大力发展根据地经济。同年7月,“赣西南政府已把东固银行扩充为西南政府的银行,在兴国县城、永新县城设立分行,银行在群众中信仰很深厚,”^[9]业务“收归(赣)西南政府财政部管理”^[10],营业范围有所扩大,其铜元票在赣西南地区广为流通,发行数量增加至近20万元。

(四)统一于江西工农银行

1930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随即撤销,东古银行的使命也随之结束。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决定创办根据地内统一的金融组织。1930年11月2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通令:“本政府财政部以一百万现金创设大规模的江西工农银行”,并组织江西工农银行印刷所,“而工农银行的票子因材料缺乏尚未印好,因此将吉安临时辅助货币一角价值的加盖‘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方印以昭信用,藉防假冒。”^[11]

江西工农银行自1931年初始发行铜元票拾枚券2种、伍佰文券1种、壹仟文券1种。各券种铜元票的图案设计基本相同,正面上端自右至左横印“江西工农银行”6字,中间为风景图案,左右两侧分别竖印“赤色区域”、“一律通用”字样,依券别不同票面上印有“拾枚”、“伍佰文”、“壹仟文”不同字样,风景图案下端分别有“工农银行”、“银行之章”方形印章;背面为风景图案,图案右侧竖印“字第 号”。江西工农银行票面设计整体风格与东古银行铜元票一脉相承,不同之处,是在券面上先后加盖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印”、“江西工农银行”红色方形图章。铜元票发行的同时,将之前的东古银行纸币和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陆续收回,从而逐渐统一了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货币。

此后的一段时期,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一直是反“围剿”战争的主战场,在战火硝烟中成立起来的江西工农银行也随军营业。江西工农银行印刷所与东固山坑列宁书报社合并为江西印刷厂。1932年2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成立并开始营业,江西工农银行的工作即告结束,其附属机构江西印刷所并入新成立的中央印刷厂和中央造币厂。

三、东古平民银行的重要作用

东古平民银行是在东固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后创设的,创办不久即扩大为东古银行;之后,随着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统一于江西工农银行,成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统一的金融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江西工农银行与闽西工农银行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作为苏区早期的银行,东古平民银行为中国革命金融事业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金融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一)东固地区早期的金融活动,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以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提供了有力支持

东固党组织领导组织的暴动规模虽小,却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建立起革命武装力量,开展了土地革命,秘密经营起以东固为中心的小块武装割据。既有灵活的游击战术与坚实的政权形态相适应,又有积极的经济文化建设支撑根据地的蓬勃发展,极富地方特色。

东固革命根据地建设初期,就开展了独创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在政策上采取适合的保护政策,避免对本地经济的破坏,重视开发自然资源,利用当地的资源办起一些小型工矿,以其产品解决军需民用。在商业金融方面,开办贫民借贷所、消费合作社,促进商品贸易发展,支持生产发展,经济建设成绩卓然。其金融活动充分调动了群众生产活动的积极性,不仅保证了红军建设和武装斗争的需要,也较好地满足了苏区军民生产生活的需求,使红色政权有了必需的经济基础和支持革命战争必要的经济力量。

经济问题直接影响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方向和进程,红军的战略转移,和经济资源的充足与否一直有着密切关系。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循粤边南雄入赣南”,“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跟其后,反动民团助张声威,是为我军最困难的时候。”2月下旬到达东固,“在东固休息一星期,与江西红军二四两团会合,并与江西赣南特委接上了头,安置了伤兵。”^[12]红二、四团向红四军赠送了大量银元和弹药,当地百姓送饭送菜,安置伤员,使危难之中的红四军取得了补给,缓解了疲劳,充实了装配,得以休养生息。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及时策应,为红四军进

一步转战赣南闽西创造了良好条件,并揭开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序幕。毛泽东对东固会师曾作出高度评价:“如果当年没有东固的一个星期休整,红四军将被拖垮,更不可能开创赣南革命根据地。”^[13]

(二)东古平民银行的创办,与赣西南、中央革命根据地金融组织的建设紧密相联

东固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迅速创办了东古平民银行,同年底即扩大为东古银行,不久又合并于江西工农银行,虽然建立时间不长,但在业务开办、发展经济等方面,创造了许多独特的作法,如低利借贷、调剂市场金融、促进合作社事业发展等,这些做法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是走在各苏区前列的。东固苏区发展经济的经验,在赣西南苏区普遍推广,也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工作起到了先导作用,开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之先河。至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建立;1933年春,中央苏区各区、乡普遍建立起消费合作社。

东古平民银行开办之初,所发行的货币仅限于部分苏维埃政府辖区内流通,但其货币发行和流通的成功尝试,为江西工农银行货币的发行创造了必要条件,如江西工农银行纸币与东古银行纸币票面的图案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设计风格一脉相承。东古平民银行所开展的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金融业务活动,而成为服务于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工作,为赣西南及中央革命根据地金融组织的创建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三)东古平民银行的货币制度,对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

作为苏维埃政府的金融机构,东古平民银行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了铜元本位的货币制度,规定其所发行的纸币为可兑现的信用货币,即其铜元票可十足兑换铜元,并与铜元并行等值流通。因其货币发行始终有着相当数量的基金做保障,币值稳定,“到处的群众都很信仰,争用此纸币,常有人拿很多现银出来到银行兑纸币,于是陆陆续续的发行三万之谱。”“在东固附近及富田一带,只用东固票,不用吉安票,东固票很硬,在群众中有信仰,”“原来这些纸票不是空发出去吸收金钱的,他是由人民拿银元出来兑出去的,即一张有一张的现洋入银行,这些钱,大部份是保存起好,这个纸票的性质,不过是一个流通罢了。既不是无底金的乱发,又得群众信仰,”^[14]很快地占领了根据地市场。

随后建立的江西工农银行同样保证了纸币的充分兑换,1930年11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行江西

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时,曾发布通令:“该钞票并可随时持到本政府财政部兑换现洋。”^[15]

东古平民银行的货币流通时间并不长,流通区域也有限,但始终坚持以币值稳定为货币政策目标,保持纸币发行数量与货币发行基金相当,为促进根据地生产发展、商品流通和维护工农群众经济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对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建立较完备的货币制度产生重要影响,为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四)东古平民银行的发展,为江西工农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

东固根据地的金融组织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渐地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最早的金融组织是贫民借贷所,为群众开办低利借贷,扶持工农业生产;后又建起消费合作社,促进地方贸易流通,便利群众生产生活。这些金融活动深受群众欢迎,在建立起坚实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金融活动秩序之上,东固苏维埃政府创办了东古平民银行,随后扩大成为东古银行,并下设分行,同时建立东村造币厂,铸造钱币。东古银行在赣西南开展金融活动的成功尝试,为江西工农银行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

江西工农银行创建后,继续坚持执行正确的纸币发行原则,保证纸币币值稳定,很好地适应了根据地经济发展和货币流通的需要。在当时的江西仍是圩场经济,“每隔几天一次圩,农民拿东西到圩场上来卖,现在因为策略的改变,允许自由贸易,所以商业又渐渐的恢复起来,市场的东西慢慢多了,一般的纸票均不用,只我们江西工农银行的纸票可用,普通是用大洋及铜元,有些地方小洋也用。”^[16]

随着赣西南与闽西根据地的不断发展与扩大,逐渐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决定统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金融组织,取消江西工农银行,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从而开始了建立全国性苏维埃金融机构的伟大尝试。

东古平民银行的创办、江西工农银行的发展,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中国革命根据地金融体系的不断趋于完善创造了良好条件。

结语:东古平民银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在江西创办得最早的银行,也是革命根据地以及中央苏区建立的早期的银行之一,其所发行的铜元票是现存最早的中央苏区纸币。东古平民银行的创建与发展,始终与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的建立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积累了成功经验,提供了有益借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革命金融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 [1]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简编(1921—2003)[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42.
- [2] 舒龙,凌步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史[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17.
- [3] 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6.
- [4] 中共江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目前政治形势与朱毛红军发展情况(1928年4月25日)[A].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二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281.
- [5] 陈毅.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情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A].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一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28.
- [6] 陈立明,邵天柱,罗惠兰.中国苏区辞典[M].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135.
- [7] 刘士奇.赣西南的报告(1930年)[A].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二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675.
- [8] 克珍.赣西苏维埃区域的现状(1930年2月19日)[A].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二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78.
- [9] 中共赣西南特委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7月22日)[A].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二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515.
- [10] 士奇,昌谐,天干.赣西南苏维埃区域的经济状况及经济政策(1930年10月12日)[A].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二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596—597.
- [11]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通令秘字第四号(1930年11月27日)[A].罗华素,廖平之.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234.
- [12] 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A].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二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32—33.
- [13] 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一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8.
- [14] 刘士奇.赣西南的报告(1930年)[A].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二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674.
- [15]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通令秘字第四号(1930年11月27日)[A].罗华素,廖平之.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234.
- [16] 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A].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二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05.

西南丝绸之路门户与宋代钱币关系探论

■ 郭立格 郭晶

(湘西州钱币学会)

在中国古代,水运是主要交通方式。湘西通过沅江、酉水、澧水等与川、黔及中原紧密相连。湘西泸溪浦市,宋朝时设置卢溪郡军事以维护沅水中游的社会安定。当时以运海盐等入湘西在此分销,以及后来的江西瓷器等在此设屯批销,湘西及川黔等地的山货、土产由此通江达海,销往中原及海外。而湘西浦市,就是这条往返西南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连接点。从宋代开始湘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浦市就是湘西地区的一个重要码头,至今还遗存着古码头遗址及通往西南丝绸之路(俗称西南官道)的古驿道。这条丝绸之路以水为主要连接,间以驿道穿插,连接着湘、黔、川至云南的商业贸易路线,成为西南与中原及沿海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一条主要路线,这条丝绸之路上的钱币一直伴随着古丝绸之路的兴衰不离不弃。因为它首先是一条贸易之路,因为沿线各地之间贸易中转对彼此商业贸易差价巨额利益的追逐,才确保了这条贸易之路的贯通和顺畅,并使之能够不断的发展延续下去。而贸易的核心是商品交换,有了商品交换,自然就有钱币流通。所以,在宋代,钱币已经成为了我们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认同的一种流通货币和支付手段。我们湘西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博物馆及州钱币学会收藏有大量的宋代古钱币,就是有力的佐证。这里在先秦是南蛮雀舌包茅不贡之地。所谓南蛮雀舌包茅不贡就是说我们这里交通极不便利,与外界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而到了秦汉时期,特别是宋代,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宋代古钱币呢?这就是通过这条丝绸之路贸易流通的结果,从湘西州所发掘宋代钱币记录看。如:1980年在吉首郊区出土宋代窖藏钱币135公斤;1983年在吉首万溶江金坪村出土宋代窖藏钱币22.6公斤;1984年在泸溪兴隆出土宋代窖藏钱币62.5公斤;1986年在大庸(今张家界)沅坪乡出土宋代窖藏钱币122公斤。笔者1989年9月在泸溪调研发现,在古驿道旁的永兴场出土一宋代钱币窖藏,由于当时已被贩子收购,于是我速报告了州博物馆,该馆后来在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在浦市截获这批钱币。由于部分散失,

仅收缴50余公斤。后经清理发现与过去所发掘的宋代窖藏钱币一样,大都伴有汉、唐、隋、新莽钱币,但以宋钱为主,该窖藏还发现一对宋代的“靖康元宝”,折二铜钱,填补了该馆馆藏钱币该时代的空白。当然这些仅仅是部分有记录的馆藏宋代钱币,还有大量散落在民间的宋代货币并没有纳入馆藏记录。钱币是和商贸有着直接关系的。这说明在宋代湘西州已经有了这条定型的通往西南的丝绸之路即商贸古道。这里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证湘西州商贸古道的存在:依据文献材料,可以查考我们湘西州是西南通道的门户;依据出土文物和现存文物我们可以确认这条古道不仅是官道,而且是一条商贸古道即西南丝绸之路。

一般人们认为西南地区丝绸之路主要是从三峡入长江。其实西南地区入长江的主要水路官道是从我们湘西州浦市下沉陵经沅水进洞庭入长江的。

据文献记载,长江三峡冬夏是不通航的。

《水经注》卷三江水:

(白帝城西)江中有孤石,为涇灏石,冬出水二十余丈,夏则没。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山南东道夔州:

涇灏堆周围二十丈,在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瞿塘峡口。冬水浅,屹然露百余尺,夏水涨没数十丈,其状如马,舟人不敢近。……谚曰:“涇灏大如楼,瞿塘不可触。涇灏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涇灏大如鳖,瞿塘舟行绝。涇灏大如龟,瞿塘不可窥。”

又《水经注》卷三四《江水》: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沂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啾六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江中有孤石,为涇灏石,冬出水二十余丈,夏则没。”“冬水浅,屹然露百余尺,夏水涨没数十丈,其状如马,舟人不敢近。”“至于夏水襄陵,沿沂阻绝,或王

五铢钱开辟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

■ 叶真铭

(中国钱币学会会员,福建省钱币学会理事)

西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张骞应募担任汉朝使者,于建元三年出使西域。张骞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大夏等地,返回途中为匈奴所获。前126年,张骞乘匈奴内乱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前119年,汉王朝为了进一步联络乌孙,断

“匈奴右臂”,并加强与西域各族的友好往来,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张骞带了三百多人,顺利地到达了乌孙。并派副使访问了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家。但由于乌孙内乱,也未能实现结盟的目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然因各种原因都没有完成同大月氏、乌孙等

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这些材料明显证明了三峡冬夏是不通航的。

除了冬夏不通航之外,春水汛时三峡的航行也受到限制。就是在秋天,三峡航行也受到一些限制。

李白乾元元年春被流放。秋八月滞留沔州。其《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并序》云:“乾元岁秋八月,白迁于夜郎,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汉阳宰王公觞于江城之南湖,乐天下之再平也。……”由此可知,乾元元年八月李白还在沔州。

李白乾元元年春被流放,为什么到了秋八月还在汉阳呢?(王琦注:《湖广通志》:郎官湖在汉阳府城内)这里除了序中所言“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之外,还有一条就是等待三峡通航。

《唐六典》卷三“度支郎中员外郎”条:

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其三峡砥柱之类,不拘此限。若遇风水浅不得行者,即于随近官司申牒记,听半功)。

《唐六典》中明确载说了遇上三峡不通航时,可“即于随近官司申牒记”。乾元元年春,李白被流放,至汉阳因三峡不通航滞留,八月,遇故人尚书张谓出使夏口,与之同游郎官湖。但是,秋八月三峡通航,李白才起程前往夜郎。

由于三峡种种不通航的原因,它虽然是从西南经长江入中原的官道,但是并不是长期通道。要算

也只能算是季节性官道。真正长期通行的西南官道应该是我们湘西州的这条道路。

早在秦汉车同轨时期,我们这里就是官道。这一点我们龙山里耶出土的秦简就是有力的证据。里耶秦简大多数是账簿,其中还有最早的九九乘法表及秦半两数枚等。这说明这条西南官道有着商贸的作用。在我们湘西州保靖县(汉千陵镇)还出土有大量的波斯陶瓷。波斯瓷器怎么会千里迢迢到我们这里来呢。如果说是赏赐,那应该只是一两件,从数量上和使用范围来看,这些应该属于民间使用的。这些只能说明秦汉时期这里已经有一条古丝绸之路即西南商贸通道了。

我们湘西州泸溪县浦市镇有一座李家祠堂。祠堂里供奉的是李世民牌位。并题有陇西字样。

《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上·郇王府》:

郇王李维生二子:武陵郡王李伯良,长平肃王李叔良。李叔良生七子:李思慎、李思言、李思泰、李思本、李思庄、夔州司功参军李思正、婺州刺史袭郇国公李思忠。李思正生兰陵丞李令望,李思忠生宣州士曹参军李建成。

在唐代关于皇室宗室的记载中,只有李思正为四川夔州司功参军,我们浦市李家祠堂立有唐皇室牌位,那只能是李思正这一分支。浦市是西南官道进入沅水的重要码头。李思正后人由夔州于浦市经沅水进洞庭入长江,其分支散落浦市,也是可能的。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修建湘川公路入川就是依据这条西南丝绸之路而确立的路线。至今我们湘西州还保留着这条湘川公路的许多路段。■

指导:吕华明教授(吉首大学)

西域各族建立联盟夹击匈奴的任务,但开辟了一条从西汉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进入西域(今新疆),再从西域连接中亚、西亚、南亚,直到北非、地中海各国横贯东西的大通道,这就是后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促进了中原地区与西域各族及中亚各国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交流,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从此“丝绸之路”上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中西方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络绎不绝,而五铢钱为丝路贸易的畅通繁荣发挥了重要的货币媒介作用,在我国货币发展史及中西贸易交流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时期。西汉初期沿用了秦代的货币制度,仍然铸造使用“半两”钱。因患秦钱太重不方便行用,从汉高祖刘邦开始铸造使用减重的半两钱。为增加市场货币流通量,甚至允许民间私人铸钱,导致半两钱越铸越小,越铸越轻,钱币重量从秦半两的枚重十二铢一直减重到枚重不足二铢,造成铸币失控和币制混乱、通货恶性膨胀等严重后果,半两钱濒临崩溃,流通市场一片混乱。为彻底解决货币问题,汉武帝统治期间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公元前118年(元狩五年),汉武帝进行第四次币制改革,废“三铢”钱,改铸“五铢”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起初允许郡国铸五铢钱,称为“郡国五铢”。然郡国五铢书体、纹饰及铸造水平不一,且存在偷工减料等问题,导致钱越铸越轻,越来越粗劣。于是公元前115年(元鼎二年)汉武帝收回了各郡国的铸币权,专令上林三官铸五铢钱,中央政府统一了货币铸造发行权,从而防止了另一次恶币的泛滥。五铢钱钱文为“五铢”,篆书横读,光背,直径26毫米左右,穿径约10毫米,重如其文,重量以3~4克者居多,少数的超过4克(图1)。五铢钱大小轻重适中,形制美观,合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价格水平对货币单位的要求,便于使用,因而在汉武帝以后的西汉、东汉、蜀、魏、晋、南齐、梁、陈、北魏、隋等朝代均有铸造,使用时间长达739年。五铢钱成为我



图1 五铢钱(正、背面)

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铸造流通使用时间最长、最为成功的长寿货币。

汉代以前,西域虽然已有集市交易,但没有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1]。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后,汉朝的五铢钱就逐渐通行用于天山南北以及中亚各国,成为了这条商贸通路上最早的、最主要的流通货币。通过五铢钱这个市场交易媒介,中国精美的手工艺品,特别是丝织品、漆器、瓷器、玉器、铜器等以及冶铁、凿井、造纸等技术相继西传。这条道路从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过甘肃敦煌分为两条路线:一条由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莎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今埃及亚历山大,公元前30年为罗马帝国吞并),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另一条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岭,过大宛,至康居、奄蔡,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各国(图2)。而西域以及中亚各地的许多农产品,如苜蓿、葡萄、胡桃(核桃)、石榴、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胡瓜(黄瓜)、大蒜、胡萝卜、蚕豆等,各种毛织品、毛皮、良马、骆驼、狮子、鸵鸟等物产以及佛教、魔术、音乐、舞蹈、雕塑等也陆续来到中原地区安家落户。五铢钱对中原和西域以及中亚各国古代贸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西汉以后中原与西域以及西方各国交往和交流的历史见证。



图2 古代丝绸之路

因参与丝路贸易,中原王朝在内地铸造的五铢钱随着东来西往的驼队商帮大量流入西域及中亚各国,20世纪以来在我国新疆各地历史文化遗址考古中都出土发现了大量中原地区各个历史时期铸造发行的五铢钱,遍布天山南北。早在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就在和田约特干、尼雅、喀拉墩、阿克苏比尔、丹丹乌里克等地发现了五铢钱,仅在约特干遗址就获得470枚五铢钱。斯坦因还在古楼兰遗址及古道上发现了众多的汉代古钱。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淖尔地区考察时,在孔雀河沿岸方圆不到一里的

地方,就获得600多枚五铢钱。20世纪70年代后期,考古工作者在和田买力克阿瓦提遗址1.2米深处发现一个陶缸,内装大量西汉五铢钱。此外,在庫车的苏巴什和哈拉墩遗址,吐鲁番、奇台、木垒、伊吾等地均有五铢钱出土。1959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巴楚的脱古孜萨来古城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出土了大量的五铢钱。1999年,和田地区墨玉县英雅尔乡一农民在挖灌溉渠时发现一处窖藏钱币,共27斤,其中绝大部分为五铢钱,主要有曹魏五铢、蜀五铢等。此外,吐鲁番地区曾出土北齐时期的常平五铢,库车出土过六朝钱^[2]。古“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如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印度、斯里兰卡、柬埔寨、泰国、越南等国家也发现过中国古代的五铢钱。

五铢钱不仅成为了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流通使用的主要通货,其本身所展示的中原文化艺术,如文字、形制、名称、币材和其背后所隐含的民族文化,很快被西域各族及中亚、南亚各国人民所熟识、欣赏和模仿,自觉、不自觉地被吸收融入他们各自的文化体系,促进了货币文化的多样性。

如一些国家和地区曾经仿铸过五铢钱。西域古龟兹王国(以今新疆库车绿洲为中心),在东汉晚期至隋唐之交(公元3-7世纪之间),采用中原传统的浇铸技术铸造使用圆形方孔的铜钱,一面有“五铢”汉字、一面有龟兹文字,或“五铢”汉字与龟兹文字同铸于一面,“五铢”二字接近东汉五铢,称为“汉龟二体五铢”钱(图3),还有面铸汉字“五朱”或无文无廓小铜钱等品种,流通使用数个世纪。1959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巴楚的脱古孜萨来古城进行考古发掘时,不仅出土了大量的五铢钱,还出土有钱范。钱范为陶制,是迄今为止新疆地区出土的最早的按照“方形圆孔”式样铸造钱币的工具^[3]。公元225年至245年间中南半岛上的古扶南王国(其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曾铸造发行一种扶南银币,币正面图案为婆罗门教崇拜的太阳花纹;背面主题图案为宫殿石门,石门上方各有星、月图案,石门下方左右分列“五金”

或“五五”两个汉字。“五金”应该是“五铢”的意思,类似緌(音延)环五铢钱,将“铢”字省笔写成“金”。中国古代也曾铸行过“五金”钱币。扶南“五金”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模仿中国汉代“五铢”钱文铸造和发行的金属钱币^[4]。

五铢钱以重量“铢”作为货币名称和货币单位。“铢”是中国古代一种重量单位,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为一铢。五铢钱在古丝绸之路沿线的广泛流通使用,其以重量“铢”名钱的做法,也影响了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曾使用五铢钱的“铢”字作为本国铸行货币的名称。

公元1世纪-3世纪,丝绸之路南道的西域古于阗王国(今新疆和田一带)首先仿五铢钱形制,开铸面有汉文“于”字的圆形长穿孔铅质钱(图4),有学者名之曰“于阗王钱”,这是现今所知新疆历史上最早的地方自铸货币^[5]。古印度佉卢文字传入于阗王国后,约在公元2世纪上半叶,于阗王国又打制了一种地方货币,有汉文和佉卢文字的“汉佉二体钱”,即著名的“和田马钱”,因其背面大多打印有一马形图案而得名。此钱圆形无孔,一面中央有形象生动的马形或骆驼图案,四周是一圈佉卢文,多纪当时打制钱币的国王的名字;另一面为汉文篆书文字。有大钱和小钱两种类型,大钱面为汉文“重廿四铢铜钱”(图5),小钱作“六铢钱”(或“六钱铢”)。此钱很有地方特色,它不同于内地铸钱用钱范浇铸,而是采用源自古希腊的打制法;也不同于内地流通币不铸动物图案仅是文字的传统,而打印有马或者骆驼形图案。但是钱币上打印有汉字,并且是以内地传统的重量单位“铢”作为纪值单位。大型和小型



图4 于田王钱



图3 龟兹五铢



图5 和田马钱(正、背面)

的重量是按1:4的比例兑换的,这样不但能和当时中亚地区流通的德拉克马和四德拉克马系统的货币兑换,同时也能很便利地和内地铸造但在和田等地流通使用的五铢钱兑换(五个六铢换六个五铢)。1枚大钱和1枚小钱可以兑换6枚五铢钱,5枚小钱可兑换6枚五铢钱,从一侧面说明了五铢钱是当时于阗王国市场上流通使用的主要货币之一,对于阗王国本地的铸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汉佉二体钱就如同它的名称一样,很典型地具有东西方两大钱币体系交融的特点,是伴随着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原地区和印度地区两种不同系统的钱币文化交流、融合而产生的,反映了和田地区在古代丝绸之路交通中特别是通往印度的交通中所具有的枢纽作用^[6]。

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中部的泰国(古称“暹罗国”),其早期货币——泰铢,不但以“铢”为钱币名称,形状为半椭圆形,而且钱的中间也铸有穿孔^[7]。直到今天,泰国官方货币仍以“铢”作为货币单位。2002年为纪念泰国暹罗银行成立100周年,泰国发行了一张面额为100泰铢的纪念钞,背面为泰国暹罗银行1902年发行的100泰铢纸钞复制品,其上有汉文“暹罗国银壹佰铢”字样(图6)。这些显然都和中国古代五铢钱的影响有关。



图6 泰国100铢钞票

根据考古发现,“丝绸之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

前就已经存在,是中原与西域以及中亚各族人民长期交流交往的结果。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数千年。张骞到达中亚后,发现那里已经大量使用中国的竹制品和纺织品。通往西域、中亚的民间丝绸之路虽早已有之,但张骞是第一个通往西域的官方使者,他两次出使西域,不但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建立了持续的外交关系,而且使得中亚和汉朝的商旅不绝于途,“到西域去”成为了汉朝商人的一个新的经济热点,固化了通往中亚的丝绸之路的各个节点,为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打下了基础。西汉张骞通西域后,东西方之间的丝绸贸易趋于兴盛,丝绸的传播源、传播的目的地、传播的路线都非常清楚,传播的数量也非常大,这些都有史可稽,有据可查,标志着丝绸之路真正形成。从此,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方之间的贸易通道,更如同一条绚丽而坚韧的纽带,把人类最古老的四大文明(黄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连接起来,成为最早的经济交往、技术传递和文化交流的桥梁。张骞不畏艰险、筚路蓝缕,坚韧、勇敢地“凿空”西域(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评价)、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英雄壮举,必将为后人千古传颂。如被奉为“诗圣”的唐代大诗人杜甫留下《秦州杂诗》组诗20首,其中第八首《闻道寻源使》就是赞美歌颂出使西域的张骞:“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一望幽工隔,何时郡国开?东征健儿尽,羌笛暮吹哀。”大诗人借用了民间传说,描述了张骞与他的同伴们出使西域寻找黄河源头并上溯入天的故事,歌颂了张骞出使西域奠定了东西各国之间几百年友好往来基础的伟大功绩。而五铢钱在丝绸之路的通用、流行,为丝路贸易正常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交易媒介手段,不仅促进了东西方贸易的进行,使得商品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增进了中原与西域各族以及中亚、南亚、东南亚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交流,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样应该为后人所铭记。■

[参考文献]

- [1][5] 杜坚毅,杜斗斗.从新疆铸币史看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管理和影响[J].新疆钱币,2010,(4):18+19.
- [2][3] 五铢钱,民族友好的“活化石”[N].新疆都市报,2013-09-09(A08).
- [4] 储建国.中国古籍所载东南亚古国货币考[J].中国钱币,2013,(1):47.
- [6] 王永生.丝绸之路(新疆段)历史货币考察报告[J].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文集,2003.
- [7] 戴志强.中国古钱与东亚、东南亚地区钱币的关系[J].亚洲钱币,1999,(3):12.

草原丝绸之路贸易与货币

■ 苏利德

(内蒙古自治区钱币学会)

一、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延续及其贸易

汉唐时,朝廷通过西域沟通了中国与西域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开拓出一条延续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宋代由于河西走廊先后被辽朝和西夏占据,北宋又开拓出一条海上的“丝绸之路”。继大唐之后,在广袤的北方草原上辽朝又开拓出以上京为中心联络西域以及东方高丽、日本等国的“草原丝绸之路”。一时各国使节与客商通过北方、中原、海上大道,频繁往来与中国,形成了贸易往来的壮观局面。这是继盛唐之后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繁荣时期。由于当时在北方草原丝路上承担运输任务的交通工具是以骆驼和驼车为主,运输的货物主要是绸缎、布匹和茶叶等物,所以,又把北方草原上的这些交通线称之为“丝茶驼路”。

草原丝绸之路是蒙古高原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内蒙古阴山长城沿线,向西北穿越蒙古高原、中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它东段最为重要的起点是现今内蒙古自治区所在地呼和浩特市,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的核心地区,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链接点。当时历朝各代中原都存在对牲畜及畜产品的庞大需求,而北方草原也存在对中原所产丝绸、茶叶、瓷器、铁器等各类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旺盛需求,所以自古以来形成了草原与中原贸易的坚实社会基础。这一阶段虽然战争不断,但是贸易并未禁绝。

北宋时,与辽在边境地区设置榷场互通有无,宋方输出的产品主要是香料、茶、瓷器、漆器、缂布、稻米等,辽方输出的主要是羊、马、骆驼、盐等。在与辽贸易的同时,与西夏的贸易范围、规模也特别广、大,西夏输出的产品主要有马匹、青盐及牛、羊、骆驼、毛皮、甘草等,北宋输出的主要是粮食、茶叶以及铁器、丝绸等。

南宋时,与金的榷场贸易也很繁荣,双方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境设有六个榷场,南宋输出一般以茶叶、棉花等为大宗商品,金输出的主要是北珠、毛皮、北绦、番罗等。此外,民间的黑市贸易规模也很可观,仅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一处,每年私相交易的茶叶即可达数十万斤,牛七、八万头^[1]。

蒙元时期,草原丝路的发展与繁荣达到了顶峰。成吉思汗建立横跨欧亚的蒙古汗国,道路四通八达,并建立驿站制度,元朝建立后,以上都、大都为中心,设置了帖里干、木怜、纳怜三条主要驿路,构筑了连通漠北至西伯利亚、西经中亚达欧洲、东抵东北、南通中原的发达交通网络。元代全国有驿站1519处,有站车4000余辆,这些站车专门运输金、银、宝、货、钞帛、贡品等贵重物资^[2]。当时,阿拉伯、波斯、中亚的商人通过草原丝路往来中国,商队络绎不绝。近几年,在这些草原丝路沿线的城市遗址当中,相继发现了当时商品交换的大量实物。如在呼和浩特市东郊的万部华严经塔发现了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钞票实物“中统元宝交钞”;在额济纳旗黑城古城遗址相继发现“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在内蒙古各地还发现了大量中原辗转交换来的瓷器。在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窑藏瓷器,且汇聚了中原七大名窑的精品,同时还出土四万余枚铜钱,这足以说明当时贸易的兴盛。另外在元上都、德宁路、净州路等地还发现带有古叙利亚文字的景教墓顶石,充分说明了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况。在中国北方大草原上,类似于元上都、集宁路、德宁路、净州路这样的草原商贸城市还有很多,它们成一线分布处于蒙古草原的东部边缘地带,是东西方商贸交易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原向西方输出商品的桥头堡。草原丝路的发达,为开放的元朝带来了高度繁荣,使草原文明在元朝达到了极盛。中国的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播到了欧洲,从而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明朝建立以后,与北元经历了长期战争,蒙古各部之间也战乱不断,道路废弃,贸易停滞。至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明朝与蒙古兀良哈部在辽东互市。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明朝与蒙古在大同开展互市贸易。但受战争影响,时断时续。明中叶,漠南蒙古阿拉坦汗强盛,因蒙民“以茶为命”“不得茶,则困以病”^[1],故通过战争得以与明朝达成协议,开边互市,沿长城各镇东自宣大、西至延宁开放互市场所13处,蒙民以马匹及其他牲畜、皮毛等换取内地粮食、茶叶、布帛、瓷器、农具、铁器等。据统计,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家口、大同、宁夏等地互市销售的梭布从50万匹猛增到100万匹左右^[2]。阿拉坦汗所建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成为商业中心、交通枢纽,其商路南达山西大同、河北宣化,西南达陕西榆林、宁夏银川,北达哈拉和林、克鲁伦河。

清初,在归化城的清军队伍里,出现了专门为清军在外地提供军需服务的随军经商的商人。这些随军商贾除为部队贩运军粮、马匹等军需外,同时还兼做当地的民间生意;他们把从中原地区购买的茶叶、布匹、粮食以及草原牧民所需的生活日用品运往草原,而换回草原牧民的牲畜、皮毛等畜产品之类。人们即把这些随军流动经商的商贾称作“旅蒙商”,当时“旅蒙商”的流动经商活动主要以骆驼为运输工具,一般都是沿历史上的古驿站栈道和明代蒙古腹地盟旗来归化城易货的驼路前进,足迹遍布漠南、漠北、漠西广大草原。

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清政府召集漠北喀尔喀三部和漠南内蒙古四十九旗的王公贵族在多伦诺尔会盟时,蒙古王公一致向康熙帝上书,请求政府派遣更多旅蒙商贾深入蒙古地区进行贸易。康熙帝应允了他们的请求,但考虑到当时北方的威胁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清政府对旅蒙的商人设定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凡是去内外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的商人,必须得到特定衙门的批准,从规定的关口进入到指定的蒙古地区进行贸易,不准前往未经指定的地区经商。当商队出关时,必须在经商许可证上注明商队人数、货物品种、数量以及起程和返程的日期等诸多内容,到达蒙古地区后,也必须要在当地官吏的监督下进行贸易。清政府尽管对旅蒙商人给以种种限制,但毕竟入蒙地经商已成合法化,所以中原商人,特别是山西、直隶等地商人蜂涌而至。于是,内地通过长城沿边道口,循着中原通往蒙古地区的驿道,由近及远,逐渐深入漠北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至更远的唐努乌梁海,以及漠西的古城、迪

化、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的厄鲁特蒙古地区。

乾隆中期以后,清政府对蒙地“封禁”政策和对旅蒙商入蒙地的限制进一步松弛,遂使蒙古地区的商业贸易日趋兴旺,旅蒙商贾在蒙古地区开始设立永久性的商号。特别是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军平定青海、新疆占领伊犁后,旅蒙商人开辟了一条“营路”,于是,归化和内地到土默特以及走外路(库伦)与西路(哈密)做蒙古生意的汉族商人及庄铺买卖字号,都争先恐后到归化城及北部草原地区发展,因而,归化城成了旅蒙商贸易的主要基地,“起初繁荣时期,每年输入70~80万只羊、3万匹马、1万头骆驼和牛;输入五六百万两的皮革、毛绒;而由新疆伊犁一带运来的货物也达到一二百万两。”^[3]这一阶段,由于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经贸活动进入繁荣阶段,站段固定,线路畅通,遂成为我国中原内地与西北蒙地以及中亚、沙俄商贸的最大经济命脉。据《蒙古与蒙古人》一书记载,光绪初年归化城每年的茶叶输出量为10余万箱,主要是砖茶。其中24块一箱者主要供应土默特地区的蒙汉民众,每年销售4万箱;39块一箱者主要运往乌里雅苏台,每年约3万箱;运往古城的主要是72块或110块一箱的砖茶,木墩茶和白毫茶(红、绿茶)主要则销往伊犁和东土耳其斯坦以及俄国的维尔年斯克、塔什干、鄂木斯克、托木斯克等地,每年销量3~3.5万箱^[4]。当时归化城成为贸易经营的重要基地,贯通了中原内地与漠西、漠北草原,以及中俄边境的贸易交流,形成了蒙古地区一个自成体系的庞大商业网。归化城的旅蒙商把从全国各地贩运来的货物,经归化城运往西北边陲及外蒙古各地销售;再把从外蒙古及西北各省贩运回来的牲畜及畜产品,经归化城转售内地。因此,归化城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适于蒙古地区生产、生活需求的商品,为旅蒙商贸易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和商品转运的便利条件,更加密切了内地与西北边远地区的经济联系,充分发挥了商品贸易中转基地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60年代,仅漠北地区定居的旅蒙商号多达五百余家,经商活动的商人多达20余万。他们在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建筑了许多宽敞的店铺、货栈和住宅,形成了蒙汉等族进行贸易交换的“买卖城”。当时产于湖北、安徽、福建的砖茶,产于河南、江西、山东的布匹、生烟、陶器、瓷器,产于河北、山西、陕西的麦粉、金属器皿、供佛用品,产于江浙、两广的绸缎、蔗糖,源源不断集中到张家口、归化城等地,然后再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运往漠南、漠北、漠西地区。在清乾隆至道光年间,仅张家口一地,每年运往漠北的

砖茶即达40万余箱(每箱装27块,每块重1.5公斤),计12600余吨。运往漠北的绸缎、布匹、茶烟糖等生活用品,计银约2083.1万余两;而由漠北蒙古通过张家口转销内地的各种皮毛、药材等,约折银1767.5万余两^[7]。

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他们凭借各种不平等条约攫取了许多商业特权,使奔走于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旅蒙商人在贸易成本上处于劣势地位,民族商贸受到严重冲击。进入20世纪初,随着西伯利亚铁路、中东铁路以及京张铁路、京绥铁路的通车,俄国把对华贸易的中心由蒙古转移到东北,利用其享有的通商特权,直接深入中国内地进行贸易,这种状况使旅蒙商人在对俄贸易中的中介作用丧失殆尽,也导致了归化城、张家口、库伦、恰克图等传统边贸中心日趋没落。辛亥革命后,由于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再加上外蒙古在沙俄支持下宣布独立,没收了旅蒙商的资产,使旅蒙商遭受了重创,遭此变故归绥最大的旅蒙商号大盛魁也于民国18年关闭歇业。1929年以后经常往来于草原丝绸之路,承担与西北贸易的商人是归绥的回族驼户,当时这些驼户有骆驼五千多峰,每年营业额约30万银元^[8]。及至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后,日本侵略者对华实行了强制的经济统制,归绥的日军对驼户的外出经商实行了严苛的限制,还派人跟随驼队监督贸易。加之当时统治新疆的军阀盛世才实行全面封锁政策,出入新疆的贸易皆被封死。从此草原丝绸之路开始衰败。抗战胜利后,通往新疆的驼道又重新开放,归绥和包头的驼商又开辟了新的驼道,继续与西北边陲进行着贸易,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

据有关资料统计,民国19、20、21年(1930~1932年),每年从新疆、甘肃、宁夏、青海运入归绥,然后转运平津内地的皮张达170万张,羊驼绒、毛等达2061万斤,各种药材达422万斤。其中仅新疆运来归绥转运内地的货物每年即达282吨;而由天津运来归绥然后转运西北地区的货物每年达272吨。仅民国21年(1932年),天津运来归绥的计有洋布45715匹、土布87181匹、棉花12814斤、砖茶7735箱、其它类茶叶13485斤,冰糖59076斤、红白糖1320591斤。以上东西流向的货物的总运价约817万元^[9]。

二、草原丝绸之路的作用

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仅密切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而且也沟通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东西方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由于从中亚及西北地区输入了像“汗血马”、“千里驹”以及细毛羊等优良畜种,从而大大地提高了长城内外牲畜的优化繁殖,促进了畜牧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重视及扩大农业生产。受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草原游牧民族也逐渐重视农业。如辽对发展农业生产就非常重视,耶律阿保机做契丹各部首领时,就吸收内地经验,多方罗集汉人,筑城镇,建基地,组织发展农业生产。在他们的重视之下,长城以北辽阔的土地得到了广泛的开发。正如《辽史》所说:“二百余年,城廓相望,田野益辟”^[10]。明朝建立后出于自身统治的考虑,和北元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往来。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通过和平谈判以及武力的方式达成了与明朝通商的目的。通过通商,明朝和蒙古土默特部的经济呈现了向上发展的态势。阿拉坦汗为了发展土默特地区的农业,积极引进农业技术、开垦荒地播种,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使土默川的农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丰富了农作物和技术作物的品种。通过丝路贸易中亚的葡萄、石榴、胡桃、橄榄、胡麻等农作物传入了中国。中国的方竹、桃、杏(印度人称文那果),还有中草药中的黄连、大黄,调味品中的姜、花椒、肉桂等也传入到西域各国。特别是中国的桑树、茶树、漆树及蚕丝技能更是受到西域人的重视和热捧。

提高了生产技术。自汉代以来,中亚一些民族就精于毛纺技术,如:编织毛毯、挂毯、地毯、毛呢绒等。这种技术此时也随着丝路贸易逐渐传入了中国。而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的制造技术也传到了中亚,从而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与西域各国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促进了丝路沿线城镇的兴起和繁荣。草原丝路的开拓促进了丝路沿线互市据点的发展,刺激了草原牧民畜牧业、狩猎业的发展,并且为畜产品提供了广阔稳定的市场,同时也促进了丝路沿线城镇手工业、运输业的发展。特别是靠近中亚、中俄边境的草原城镇,由于内外交通的开放、国内外商人自由贸易往来的不断深入,北疆边境地区的一些交通枢纽和边塞小城,逐渐发展建设成为具有“陆地港口”和“沙漠威尼斯”之称的新兴商埠。

三、草原丝绸之路的贸易货币

自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以来,随着商道的畅通,许多内地、国外的使团、商人纷纷进入北方蒙古草原从事商业活动,及至清朝及民国,各类商铺遍布阴山南北及草原地带。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金融业的

繁荣,货币的需求量和流通量大大增加,呈现出新旧交替、中外混杂的局面。但蒙古地区由于受牧业经济基础、地域环境、交通条件等方面的限制,金属货币往往不能适应商品交易的需要。因此,其商业贸易还主要是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关系,形成了不同阶段、不同朝代贸易草原牧区以土布、砖茶、绵羊等作为交换媒介的特殊货币形式,同时,也间杂着流通有各种货币。

(一)草原丝路沿线商城出土的部分古代外国金银币

1.拜占庭金币,黄金铸造。直径1.4CM,为东罗马皇帝列奥一世(457~474年)时所铸。呼和浩特郊区出土。

2.芝诺金币,直径1.9CM,2012年赤峰征集。

3.卡瓦德一世银币,白银铸造,是萨珊王朝第十九个国王卡瓦德一世(公元488~531年)复位后所铸,直径2.6CM。2012年赤峰征集。

4.库思老一世、二世银币,银币模铸而成,直径均为3CM,呼和浩特市郊区出土。出土地点大部分在“丝绸之路”上或者在它的延长线上草原丝绸之路。

5.霍尔木兹四世银币,直径3CM,2012年赤峰征集。

6.卑路斯银币,直径2.5CM,2012年赤峰征集。

7.嚧哒银币,直径2.6CM,2012年赤峰征集。

8.伊朗狮子银币,直径2.8CM,2012年赤峰征集。

9.陀拔里斯坦银币,直径2.2CM,2012年赤峰征集。

10.萨希银币,直径1.7CM,2012年赤峰征集。

11.花刺子模银币,直径1.9CM,2012年赤峰征集。

12.莫卧尔银币,直径2CM,2012年赤峰征集。

13.伊儿汗金币,直径2.3CM,2012年赤峰征集。

14.察合台金币,直径3CM,2012年赤峰征集。

15.阿拔斯金币,直径1.9CM,2012年赤峰征集。

这些金银币的出土发现反映了当时阿拉伯、波斯、中亚的商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往来中国贸易,络绎不绝。在今内蒙古地区的古代城址中,还发现了许多当时的贸易商品,这些文物和外国金银币的发现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贸易的有力见证,反映出东西方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繁荣与兴盛。但当时贸易主要是以物易物,也有个别外国商人用本国货币兑换成中国钱币再购买中国货物的,因而草原丝路沿线古代城址中出土的外国货币寥寥无几。据成书于1340年由裴哥罗梯撰写的《通商指南》中所载,欧洲商人进入元帝国境内后,须将所带金银兑换为中国通行的纸钞,再用纸钞购买所需物品^[1]。

(二)特殊货币

草原丝绸之路上活动的人类群体主要是以畜牧

业为生的游牧民族,自青铜时代起,先后有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主要民族,这些游牧民族都是以牛、羊、马、驼等牲畜为财产,因而在与中原和西方国家贸易时一般都是采用以货易货的方式,但也有少量的中国和西方国家的金银币、白银、铜币等古钱币流通。

及至明末、清朝和民国时期,草原丝路上流通的货币更是五花八门,有实物货币土布、绵羊和砖茶,还有各种金属货币、纸币、帖子等。

清朝时期旅蒙商人采取南买北卖、北买南卖的形式,即从张家口、天津、北京、上海等地贩上土布、花缎、丝绸、茶叶、瓷器及药品等物,运到西北各省及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恰克图等地销售;再从销售地收上灰鼠、扫雪、旱獭、北极狐、狼、貂等皮张、皮革制品及贵重药材,如鹿茸、贝母、枸杞、麝香等物,运销内地各省。

当时土布是十分重要的交换媒介,旅蒙商人在恰克图的贸易往来都是用土布来作价的。据张诚《鞑靼旅行记》记载,1688年,法国传教士曾如此描绘他们和蒙古人之间的以货易货:“在路上,我们碰见几位喀尔喀鞑靼人。他们携带着骆驼、马匹和羊出售或进行交换。我们用茶叶和烟草与之交易,价格约为十五索尔可换一只羊……用他们的牲畜交换布、烟草及茶叶……他们不愿收钱,而只需布……拒绝收钱,但要布、茶叶、烟草和食盐作补偿”^[2]。

《绥远通志稿》记载,清代归化城在以货易货中,主要用绵羊和砖茶作为交换媒介。砖茶与绵羊的比价是每只绵羊相当于7块三九砖茶(三九砖茶指每箱包装39块,每块约值白银三钱左右)的价值,每只好绵羊可达12块三九砖茶^[3]。《蒙古地志》载恰克图砖茶市情:“凡市场商店购买物件,有以小片砖茶标价者,土人亦喜相接受,如碎切之银两。大抵一头羊换砖茶十二至十五个,骆驼可换百二十个至百五十个。”^[4]砖茶与羊皮的比价是每张绵羊皮约相当于1.4块三九砖茶;与羊肉的比价是每块砖茶相当于3斤绵羊肉;与羊毛的比价是每块三九砖茶相当于2.5斤绵羊毛。砖茶与马的比价是每匹普通马相当于46块三九砖茶,每匹好马可达86块三九砖茶^[5]。归化城的绵羊和砖茶比价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有明显的物价差距。土布、绵羊和砖茶是在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以货易货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三)金属货币及纸钞

草原丝路上活动的游牧民族,虽然在与中原和西方国家贸易时多采用以货易货,但也有少量的中国和西方国家的金银币、白银、铜币等古钱币流通到

丝路沿线。如在草原丝路上可常见到的汉代货币有“半两”、“五铢”、“货泉”、“大泉五十”、“货布”等形制,与这些钱币相匹配的钱范、钱文也曾草原丝路沿线的内蒙古鄂尔多斯霍洛柴登铸钱遗址出土发现。据此可推测,汉代在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中流通的货币,有一部分来源于霍洛柴登铸钱遗址,可以说,霍洛柴登古城铸钱遗址所制造的钱币为当时草原丝绸之路的商品交换及发展提供了货币支撑,对两汉时期内蒙古地区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与延续起到过重要作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草原丝路上流通的货币种类虽有不同,但均对贸易活动的正常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中西方国家货币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草原丝路沿线的西夏在初期的经济贸易中,主要采取物物交换的形式,同时也少量流通使用宋钱。北宋灭亡后,失去经济后盾的西夏只好与金建立友好关系,发展榷场贸易。但金经常以各种借口停闭榷场,或在榷场贸易中贬值使用宋钱,使得西夏不得不自己去大量铸行货币。这已在草原丝路沿线内蒙古临河市、包头市郊沙尔沁阿都来村、鄂尔多斯准格尔旗的西夏古城址出土的窖藏中得以证明。出土的钱币主要是西夏汉文的“天盛元宝”和“乾佑元宝”铁钱,同时还发现铸铁残渣、铸钱泥范残块等。从这些出土物可推断出草原丝路沿线靠近黄河沿岸的榷场经济已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且自铸的铁钱主要用于榷场的边境贸易。北宋时期,草原丝路贸易除了物物交换外,主要使用铜钱和白银,尤其是民间的贸易活动中更是愿意使用白银。由于白银大量在丝路贸易中流通,为北宋白银的货币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自蒙古汗国及元代,由于其在统辖的亚欧大陆广大领域内广设驿站,遂使东西方陆上交通畅通无阻,草原丝路进入了辉煌时期。时元代钞法整治极其完善、严密,禁止金、银和铜钱等传统的金属货币同时流通,因而草原丝路沿线城市遗址出土的钱币主要是元早期的中统钞、晚期的至元钞和至正交钞,还有些元代各朝的铜钱。

由于草原丝绸之路商业日趋兴旺发达,中原商人、西方使团和清朝时期的旅蒙商队纷纷把金银币、白银、银两、纸钞、铜钱、铜元、纸币相继带入丝路,这样就有许多中国古钱币、外国货币流通到丝路上,成为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之上流通货币的一部分。

入清后,草原丝路贸易货币仍流通银两和铜钱,但从清代晚期开始出现了银元、铜元,与银两和铜钱混合流通的局面。

1. 银币

在清代白银和铜钱都可无限制使用,货币本位银、钱平行。交易额大用银,小则用铜钱,归化城及北方草原丝路上用银两多于铜钱。银币分银锭和银元两种,常见有山西省清代和民国初年的大小元宝,如“大同元宝”和“太谷宝”等,也有“归化元宝”。由于各种元宝的重量和质量各不相同,使用非常不便,而全国各地的衡器千差万别、标准不一,故称银时,归化城一般用城钱平,银元1元相当于城钱平的六钱五分四厘七毫二,也有以库平银、湘平银为标准的。1933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推行废两改元,以银元为货币单位,白银才退出流通领域。清光绪年间发行了银元,归化城在光绪末年才始流入,与铜钱的折合率为每800枚铜钱兑银元1元。1914年后,中国银行相继在归绥、包头设立分支机构,大量银元流入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常见有袁大头、孙中山小人头、英国站洋、墨西哥鹰洋、帆船、俄国羌人头等,还有日本、美国贸易银元,但流通量不大。

2. 铜钱

草原丝路上流通的铜钱,以清政府或各省官钱局铸的为多,间杂有前朝铜钱,大小不等,成色不一,品种繁多,非常混乱。品种有制钱、黄钱、白钱、青钱、红钱、普尔钱等。由于钱的比价不断涨落,时有变化,而一些公私铸铜钱出现了减重或劣质品,为此归化城有些钱商在钱市上大搞投机活动,直到1923年政府限制后才停止。清初,归化城是以96文抵100使用,乾隆、光绪时期以86文抵100使用,光绪末年则又降为80抵100,此间各地钱法也有所不同,如毕克齐光绪末年是68文抵100使用。

3. 铜元

铜元为清末铸造,分红铜和黄铜两种。每枚重一钱六分的铜元当制钱10文,与银元比价为100:1;重三钱二分的铜元当制钱20文,多为清政府及各省铸造。清末民国初年流通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铜元,常见有山西铜元局所铸的红铜元,另有“光绪元宝”和“大清铜币”等种类。

4. 纸币

纸币有两种,一种是地方官银号或银行发行的兑换券;一种是商会或商行发行的帖子。归化城及草原丝路上流通的纸币有以下几种。

大清银行纸币:面额为100元、10元、5元、1元四种。

俄国国立银行兑换券(羌帖):面额分500、100、50、25、10、5、3、1留八种,日俄战争后禁止流通。

民国时期还有许多地方票券流通于草原丝绸之路之

路上。

平市票:绥远平市官钱局在1920年发行了5吊、1吊、500文、300文、100文五种制钱票及面额为10元、5元、1元、5角、2角、1角的银元主辅币兑换券和面额为100枚、50枚、30枚、20枚、10枚铜元券;1931年改发新票,旧票折半兑换,1933年又四折兑现。抗战爆发后停止使用,被蒙疆银行票收兑。

晋钞:1919年山西省银行发行,有银元和铜元兑换券两种。由于旅蒙商人中多为山西籍人,故晋钞发行后很快流通到驼道上。1932年改组山西省银行后,以新钞1元兑旧钞20元收回,使旅蒙商人遭受巨大损失。

西北银行票:由冯玉祥创办的西北军随军银行,1925年在归绥和包头设分行,大量发行纸币。初发时还可与中国银行票、交通银行票等价流通,西北军撤退时西北银行撤销,票券停兑成为废纸。

丰业票:丰业银行是归绥市以商股集资开办的商业银行,1920年成立后,发行了以银元为本位币的流通券,初期发行14万元,面额为10元、5元、1元三种。1937年日军侵占归绥后被蒙疆银行票取代。

绥西垦业银号票:于1932年3月由太原绥靖公署在包头市成立。发行银元兑换券100万元,面额有5元、1元、2角、1角四种;铜元20枚、10枚二种。

蒙疆票:日军侵占华北后,于1937年11月23日宣布成立蒙疆银行。1938年3至5月陆续发行了面额为100元(三种)、10元、5元、1元纸币及5角、1角、5分铜质硬币和1分、5厘铜质硬币,1940年又发行了5分、1角、5角纸币,还把日本铸的10钱、1钱铝币投入市场流通。抗日战争结束后,蒙疆票由绥远省银行以法币1元换4角收兑。

中央银行券及法币:中央银行券是1928年11月1日由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1935年规定中国银行、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并负责收兑其他各银行的各种票券。从1942年4月1日起,法币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日本投降后流通于内蒙古西部地区。由于发行量增大,遂于1948年8月停止流通,以金元券1元收兑法币300元。金元券发行不到1个月开始贬值,到1949年6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金元券5亿元兑银元1元,以至城市交易又改用银元和布匹作为媒介。1942年4月,国民党中央银行还发行“关金券”,每元可兑法币20元,日军投降后开始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流通,后被金元券取代。

银元券:1949年6月绥远省银行发行,主币面额1元,辅币有5角、2角、1角、5分,铜质硬币有5分和

1分,1元主币与银元等价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人民币收兑。

帖子:内蒙古西部地区流通于草原丝绸之路的票据,主要是大盛魁票庄印制的,上印有金额、发行商铺名、号码、发行年、月、日,并盖有商务会的印章。这种钱帖有的以清朝制钱为标准,面额大的当35吊文,小的当1吊文;有的以小洋钱为标准,面额大的有当50角,小的当1角。

上述流通的诸多钱币,虽然其制造与发行并非专为草原丝路贸易使用,但确实流通到了内蒙古地区的草原丝绸之路之上,其中不排除部分货币参与或充当了草原丝路之贸易货币。■

[参考文献]

- [1] 潘照东,刘俊宝.草原丝绸之路探析[A].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C].200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7:76.
- [2] 潘照东,刘俊宝.草原丝绸之路探析[A].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C].200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7:77;陈永志.论草原丝绸之路[N].内蒙古日报,2011-07-11.
- [3] 《明史》食货志四<盐法、茶法>[A].中国历代食货志汇编简注(下册)[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215+209.
- [4] 中国公路运输史(第一册)[M].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80.
- [5] 蒙古族通史(修订版)下[M].民族出版社,2001:144.
- [6] 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92-93.
- [7][8][9] 曹梦麟,甄可君.中国的“丝茶驼路”[A].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委员会,《呼和浩特回族史》编辑委员会.呼和浩特回族史料(第二集)[M].1990:64-65,66-67.
- [10] 辽史(第三册)卷四十八<南面京官>[M].中华书局,1974:812.
- [11]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M].中华书局,1977:316.
- [12] (法)热比雍(汉名张诚).张诚日记一鞑靼旅行记[A].(法)白晋.外国人笔下的清宫秘闻:康熙帝传[M].珠海出版社,1996:137、142.
- [13] 绥远通志稿(第三册)[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569-570.
- [14] 日本参谋本部.蒙古地志(日文)综合系列(二)贸易[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翻印,2013:150-165.
- [15] 《旅蒙商大盛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二集[M].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154-155.

探讨“景德镇总商会临时流通券”的水印纸与“丝绸之路”

■ 周海平

(中国人民银行景德镇市中心支行)

“景德镇总商会”(以下简称“商会”)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发行的“江西景德镇总商会临时流通券”(以下简称“流通券”),对当地政治、经济产生过重要作用,在江西近代货币史上也有特殊的地位。记得在80年代初,我在观看景德镇总商会临时流通券时发现其纸张是固定水印纸,并与多名景德镇老年瓷业退休职工交谈此事,都认为此券是由“洋纸”印刷而成,即外国制造的纸张,而这些老人都曾在解放前使用过这种钞票。一晃30多年,现在与景德镇当地钱币界人士交谈此券时,都认为此券是景德镇历史文化遗产在钱币上的反映,作为景德镇人,值得研究与探讨。

一、魅力之城、梦想之城—景德镇

景德镇地处江西省的东北部,西临鄱阳湖,北靠长江,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全境山峦起伏,森林茂盛,河川纵横交错,全市土地面积5270平方公里,山地占2/3以上,总人口170多万,现辖乐平市、浮梁县、珠山区和昌江区,明清时期与广东的佛山、湖北的汉口、河南朱仙镇并称中国四大名镇,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宋朝以来,景德镇以其精美的瓷器闻名于世,一直受到朝廷的重视。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真宗帝遣官制瓷,贡于京师,并以其年号冠名“景德镇”。由于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与直接参与,景德镇遂成为全国制瓷规模最大技艺最高的窑场。景德镇位于江南丘陵地区,四周的崇山峻岭不仅遍布着丰富的制瓷原料和茂盛的烧瓷燃料,还成为了古代抵御战争、安居乐业的天然屏障。因此,饱受战乱之苦的各地工匠源源不断地涌入景德镇。景德镇一直以海纳百川的胸怀,集历代名窑之大成,汇各地技艺之精华,在借鉴中发展,在发展中超越。从古至今,景德镇一直绽放

出无穷魅力,融汇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艺术风格,成为了陶艺创作者的梦想之城。

二、景德镇总商会与景德镇总商会临时流通券的发行原因

1909年由康达、吴简廷、陈庚昌发起组织景德镇总商会,会员50名。总商会的基层组织为三帮的各个行业,名称为“窑”、“社或称会”,共有“三窑九会”。据资料,“景德镇从置镇到解放前一直隶属浮梁县管辖,总商会是在清末宣统年间,由举人康达等人发起,申请清政府批准成立。总商会的权力很大,能掌握全镇经济命脉,县令、县长上任,要到总商会拜客。在军阀统治时期,总商会会长出来,都是坐兰呢大轿,前后护兵四至八人,轿后挂铁丝灯笼二只,上写总商会和会长姓氏。其威风较之县令、县长出巡相差不远”^[1]。清末民初,景德镇商业、陶瓷和陶瓷辅助业繁荣,从业人员计3万余人,业主与雇工、业主之间、业主与外来客商经常发生资金上的困难和生产质量上的问题纠纷,需要有一个具有一定权威的机构来负责排难解纷。同时,清朝及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如麻,加到业主、商界的各种税收需要一个机构来负责摊派,总商会正好扮演了这个角色,其作用不可或缺。

翻阅历史资料:“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在汀泗桥大破吴佩孚军队。同时,另一军阀孙传芳的主力部队被歼,从南昌退入景德镇的溃兵约有10万,分驻在镇区会馆及近郊”^[2]。“北洋军刘宝提部,于1926年农历十月初五日到达景德镇。他们到处抓人当挑夫,当时镇上闭市。各瓷厂、各窑户也都停了工,上街买菜的,都是一些老人。在初七日,北洋军的长官们,将镇里公家的好字画、美术瓷器都拿走了。师长刘宝提还敲了商会竹杠,拿走了

几万元”^[3]。“1926年农历十一月十四日,北伐军贺耀祖师的先头部队——迫击炮团团长彭赞汤率众30余人到达景德镇。不几天,贺耀祖自己率全师队伍来到景德镇,至第二年农历二月开差,据说是去征讨南京的北洋军阀”^[4]。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景德镇由于军队过往频繁,商会开支巨大,业主摊派、税务负担过重,商会本身经费紧缺。景德镇黄金、白银、铜板流失严重,出现通货紧缩。导致景德镇的主要工业,陶瓷生产开工困难,经济出现一片萧条的景象,急需流通货币。景德镇四面环山,属于丘陵地带,交通条件特差,货币流通渠道相对不畅,为“流通券”的发行创造了必要条件。“景德镇总商会”(以下简称“商会”)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发行了5元、3元、1元三个面额的纸币,即“景德镇总商会临时流通券”(以下简称“流通券”),钱币界将其列入军票,在近代纸币中有重大影响。

三、流通券形制与流通券的印刷

壹元流通券正面颜色为深蓝色、背面为黑色,13.1cm x 9.1cm(如图1、图2)。



图1 壹元券正面图



图2 壹元券背面图

叁元流通券正面颜色为咖啡色、背面为黑色,14cm x 9.2cm(如图3、图4)。



图3 叁元券正面图



图4 叁元券背面图

伍元流通券正面颜色为浅黄色、背面为黑色,14.5cm x 9.3cm(如图5、图6)。



图5 伍元券正面图



图6 伍元券背面图

“流通券”分1、3、5元3个券别,券面正、背面版式相同,只存在面额数字、票幅大小差异。“流通券”正面上方印有“江西景德镇总商会”,下面印有“临时流通券”,并盖有红色的长方形发行单位印章,左边编写冠字号码,并加盖有长腰圆形骑缝章。券面中心图案为“瓷器生产作坊和瓷窑”,下面横印英文币值,两边团状花纹中有大写币值字样,上方两角斜文大写币值,下方斜文阿拉伯数字币值,下方正中“当现通用,无折无扣”,再下方划二条线之间有“中华民国十七年印”。“流通券”3个券别背面均为黑色,长方形外框中印隶书文字:“本券系掉换这次军队过境筹垫饷粮办理招待发行用旧之临时流通券以归一律;本券流通市面抵当现金贯卖货物以及汇划兑票一概通用;本券按照迭次议决发行流通券总额印行为分壹元、叁元、伍元三种;本券以本市抽收房捐内百分之十作为担保基金分期收回;本券在本市区域以内行使如有折扣情事一经察觉即请官厅从严处罚。本券无论何人如有伪造查获送官按律治罪”。背面条文中心印有红色篆字长方形商会关防。

通过观察,纸张的组成成份为棉花加5%以下的松树木材,属于“棉纸”类。

四、考证景德镇总商会临时流通券水印纸来源于丝绸之路

我国清朝时期,欧洲部分国家在中国造纸术的基础上,已经从家庭手工作坊进入工业化工厂生产。据记载,13世纪意大利的造纸工匠发明了水印纸,最初仅用水印纸来表示造纸厂的商标。后来,欧洲出现纸币时,水印纸引起造币专家的重视,从此,钞票就使用带有水印的纸张来印刷,防止了仿造钞票、美化了票面。钞票纸增加水印是造纸时采取的一种防伪技术措施,水印纸张的制作说来并不难,只要将正常情况下平坦的压纸浆筒改为刻有需要凸出的图案就行了,凸起之处纸薄些,就成了对光可见的水印。

清朝末年,特别是民国时期通过陶瓷,景德镇总商会与欧美、东南亚诸国有广泛的交流。据资料,景德镇瓷器首获国际金奖:1915年2月,美国政府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通,在美国旧金山市举办“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由江西瓷业公司和景德镇总商会推荐参展的王大凡“富贵寿考”粉彩瓷板画、汪野亭“墨彩山水”瓷板画和“鄱得亿号”乌金釉瓶在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给国人带来莫大的荣耀。通过丝绸之路,景德镇瓷器运往欧洲各国,带回诸多先进科学技术、生产工艺,安徽省歙县某造纸作坊在景德镇

总商会的策划、配合、协助下,制作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固定汉字图案“景德镇总商会”的白水印纸(如图7-图9),对光清晰可见“景德镇总商会”6个汉字白水印,为印刷景德镇临时流通券提供了重要的防伪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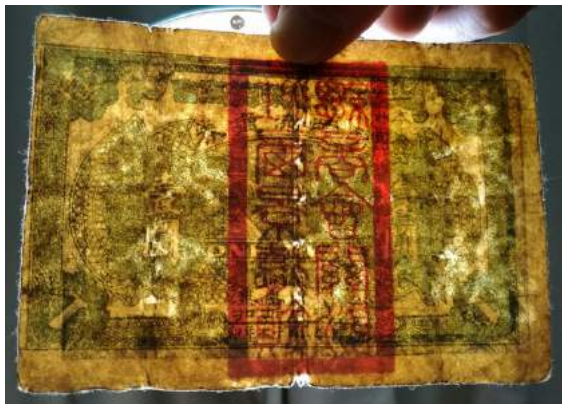


图7 壹元券正面对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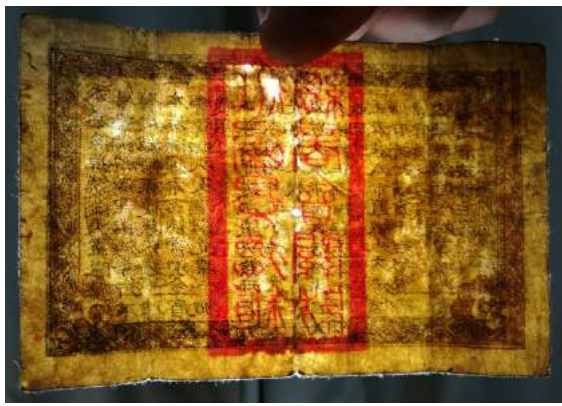


图8 叁元券正面对光图



图9 伍元券正面对光图

景德镇总商会引进西欧水印纸技术,加上我国汉字书法,特别制作了汉字“景德镇总商会”的白水印,对我国白水印纸的研究、生产、制作具有重要意

义,也是本文的核心内容。白水印是当今世界纸币最重要的防伪手段之一,白水印是在造纸过程中使用一种特殊设施和方法抄造出来,具备清晰度高、透光性好、难以复制,以及不借助仪器即可识别等特点,具有极好的大众防伪功能。第五套人民币2005年版100元券、20元券、10元券、5元券,2015年版100元券均采用了数字白水印,借此推测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汉字“和”为白水印的纪念钞。

五、流通券的发行经过

商会根据当时景德镇的实际,经省、县政府批准发行80万元流通券。“商会不是银行,不能发行钞票。但因商会各项负担过重,有时上面派下来的捐税数字庞大,短期不容易筹措,往往造成缓不济急。后经商会委员会决定,呈请当时省、县政府批准,由商会印发地方临时流通券,票面为壹元、贰元、叁元、伍元四种。根据当时需要发行额约80万元,在市面流通,一律作现金使用。流通券的信用担保,是以本镇房捐为抵押的。本镇房捐每年收数颇巨,主要用作教育经费。但捐款是每年分期交纳,超过收款期间是收不到的”^[5]。

流通券石版印刷,是采用德国天然石制成的长方形的各号印石作版标,将所印文字、图画,用专用黑色材料书写、描绘在拖了浆水的纸上。再将纸贴在印石上面,先用水润湿透彻,后用手摇石印机使文字、图表或画面脱落在印石上,待干后洗净,未全脱落而不清晰处,需用专用黑料直接在印石上补描,经过技术处理,成为印版。石印技术性较强,除可印文字、表格外,还便于印多种套色和细腻花纹,颜色鲜艳美观,为木印所不及。石板印刷版本耐用,一个票面只需一次制版。流通券的印刷就是采用石版印刷。

“1928年,徽州人胡武彬在会馆隔壁(上新安巷正街)开店修理钟表,并兼营印刷,牌号为美华利钟表印刷店,有手摇石印机一部、圆盘机二部,雇一至三人。美华利钟表印刷店老板将手摇石印机一部、圆盘机二部搬至麻石弄商会本部,及雇工、青花瓷描图工若人同到商会。当时监印人由景市工商业中的三大帮:都帮(都昌籍的工商业主)、徽帮(安徽徽州府所属六县籍的工商业主)、杂帮(都、徽帮以外在景市的外县外省籍的工商业主),各推有声望,为人正派的头面人物二名监印。都帮监印龚昌寿、冯仲耆;徽帮倪任清、江渭生;杂帮陈春华、彭宛香”^[6]。描图工的主要工作是将未印清楚,黑淡的地方用毛笔添描完整。可以看出,其印刷组织严密,准备充备,进行有序。

六、流通券对当地经济的作用,流通券币值的稳定性

流通券的发行解决了因招待过往军队而留下来的庞大的经费欠款。由于商会有了流通券作为货币借给钱庄转贷给工商业主或直接贷给工商界启动生产,使一些濒于停业的中、小业主得到贷款,使一些由于战争陷于失业的工人又回到工厂。工厂开工,生产启动,外面的陶瓷工人、源料、客商、汇票、金银源源不断地来到景德镇,景德镇经济开始复苏。如果没有流通券,生产无法运转,景德镇经济将继续萧条,战争对景德镇陶瓷生产的破坏会更大。总之,流通券在那个时期刺激了生产,活跃了市场,对当时景德镇经济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流通券虽然是临时流通,但在景德镇长期使用20多年,且币值稳定性好。流通券的币值稳定与商会有直接的关系。流通券的信用担保是以本镇房捐为抵押的,信用担保人是商会委员会。商会发行流通券自身也受益,“发行流通券,对商会受益很大。有些钱庄,可以到商会借款,每月利息一分多点,为九扣左右。这个息金很可观,充作商会开支费用”^[7]。商会通过放贷,有丰厚的收入,增强了商会的经济实力,商会经济实力的增强,反过来也为流通券的稳定流通提供信用担保基础,增强了流通券的稳定性。

“流通券开始在市面流通时,是无折无扣,和旧中央、中国银行钞票一样。但到解放前几年,逐渐出现贴水现象。因保商票在外地使用不得,起初每元贴水二至四分,变动不大;在银根吃紧时,也到过九折,为时不长”^[8]。

可见,流通券到1949年景德镇解放时币值仍很稳定,完全是因为商会起到稳定的作用。商会一直到景德镇解放后仍存在,并改名为景德镇工商联合会即“工商联”至现在。■

[参考文献]

- [1][5][7][8] 景德镇文史资料[M].第一辑:95、99、99、99.
- [2][4] 景德镇市志[M].第4卷:28、26.
- [3] 景德镇文史资料[M].第三辑:24.
- [6] 景德镇文史资料[M].第九辑:81.

我国古钱币文化的特征及其历史作用

■ 傅先义^{1,2} 丁安国^{1,3}

(1.荆州市钱币学会; 2.中国人民银行荆州市中心支行; 3.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分行监察室)

所谓货币文化,在广义上,是指一个社会发展到使用货币所需要的各种先进的条件,包括生产力和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各种典章制度。在狭义上,是指钱币艺术,即钱币本身的形制、制作、文字和图形等,也是钱币学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古钱币,是指历史上用作交换的媒介,退出流通领域的历史货币。货币文化中包含钱币文化,钱币文化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对货币文化的诠释和具体化。不同的钱币文化散发出不同的时代气息,凸显出时代变迁的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古钱币文化则是指人类思想意识形态、精神在钱币上的体现,包括钱币本身的形制、制作、文字书法和图案设计等,是多种文化形态在钱币发展史上的参照,更是历史、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综合反映。古钱币文化的时代性特色与多样性、民族性、继承性、融合性,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很长时间以来,我国就有对古钱币文化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从古钱币的历史发展看,钱币文化的研究还可以更加深入、广泛。为此,笔者在学习前人关于钱币文化的有关理论及论述后,将从古钱币文化的特征等方面进一步挖掘钱币文化的内涵,以帮助钱币爱好者和收藏者更好地认识钱币的历史作用及其收藏意义,从而使我国古钱币文化得以更加广泛地传播和弘扬。

一、我国古钱币文化的主要特征

古钱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和涵盖了历史进程中几乎全部的文化信息,是随着钱币的产生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从古钱币发展的历史轨迹看,古钱币文化主要有以下特点:

1.钱币制造的技术性。中国最早的货币是天然海贝,这从中国文字结构上就可证明。如,凡与价值有关的字,绝大部分从“贝”。分贝成贫,贝少为贱,可见贝很早之前就已经是价值的体现。商周时期,随着社会发展,人类掌握了冶炼技术,便出现了金属贝类货币,如无纹铜贝、仿铜大贝、金贝等,蚁鼻钱为贝币的高级形态,为战国楚、鲁地区的铜铸币。到先

秦,开始使用范铸,早期为泥铸,基本是一钱一范。后来使用陶范、石范和金属范,六朝时期开始采用叠铸技术。唐朝时,开始用翻砂浇铸,较之硬范浇铸和泥范叠铸,体现了工艺的简化和效率的提高,是铸钱技术的又一大进步。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北宋纸币—交子的使用,促进了雕版印刷术的改进和发展。为满足社会流通的需要,钱币制造都是采用了当时的成熟技术或先进技术,其技术含量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的青铜铸造史、造纸史和印刷史。

2.钱币形制的思想性。中国古代哲学有五大流派,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深。“外圆内方”、“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元素。从钱币的形制看,钱币为圆形方孔。一般认为这蕴含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是古代阴阳八卦学说的具体体现。古人在钱币制作中将这些哲学思想通过钱币体现出来,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元素。可见,钱币形制实际上是古代哲学思想的载体,也是我国古代思想智慧的结晶。

3.钱币文字的历史性。钱币上的文字与我国文字的历史分不开,有钱币就有了文字。外国钱币一般用人物或动物为图案,而我国的钱币则多为文字,这也是我国古钱币较为独特的地方。秦以前,钱币的文字为大篆,秦以后的文字为小篆,到六朝以后多用隶楷;唐代开元通宝钱使用的是隶书,到宋代文学艺术空前繁荣,钱文书法更是丰富多彩。在钱币中所用的文字又与我国的书法艺术息息相关,大篆、小篆、隶楷等书体,都是书法艺术在钱币上的具体体现。应该说,古钱币的这个特征与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

4.钱币图饰的民族性。民族性是钱币文化延绵发展的“灵魂”。我国古钱币的图饰与外国的不一样,不用动物或人像,而为文字。布币被视作中国钱币文化的象征。从古代的钱币上图饰来看,最引人注意的是钱文,但并不是说除了钱文就没有其他图饰了,就拿方孔钱来说,钱面特别是钱背上往往也有

图饰或其他纹迹。人们较为熟悉的是开元通宝钱背面的所谓“杨贵妃指甲痕”(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并无史实根据,但月牙形的纹迹却确实是存在于钱上的)。古钱上还有其他的图形或纹迹,较常见的是所谓日、月、星、云、鸟,偶尔还可见到像虎头那样令人不解的图形。这些图饰或纹迹的背后,也有一种文化。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在钱币发展进程中,由于朝代的更换,统治者所处地域不同,钱币的图饰更是丰富多彩,体现了民族特色。“每一种钱币总是在继承原有钱币的基础上而有所发展,既有历史的延续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钱币文化民族性的长期稳定存在,是一个民族钱币文化成熟的标志。

5. 钱币发行的政治性。钱币的流通,一方面是商品交换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标志。翻开历史书页,自秦始皇统一货币以来,历朝历代,钱币在作为物质财富象征的同时,实际上也成为历代帝王维护、巩固统治的一种工具和手段。由此可见,钱币是一种历史的记录和见证。钱币的铸造、印制和发行通常为一种国家行为,因而,形态各异的钱币不仅充当经济运行的媒介和载体,而且记录着政治生活的诸多信息。这在《中国钱币文化》一书中有专章介绍。

6. 钱币流通的地域性。古代钱币除铸造上有地方性外,在流通上也有地方性。这是中国社会封建性的反映。据《中国货币史》提供的资料,古代钱币的铸造,是由各地办理的,如先秦的刀、布,是由各城邑铸造,币面多标有地名。唐会昌年间的开元钱,明朝的大中、洪武等钱,以及整个清朝两百多年的钱币,都是由各州、各省或各分局铸,钱背有州名、省名或局名。在流通上的地方性,春秋、战国时期,三晋用布币,燕、齐用刀币,周、秦用环钱,楚国用蚁鼻钱,割据的局面非常明显。即使在统一政府之下,货币流通的地方性还是严重存在,如宋朝,表面上是统一国家,币制上却是割据局面:京东、京西十三路行使铜钱,成都等四路行使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钱铁钱兼用。后期,纸币的流通使用也存在这种地方性。

7. 钱币观赏的艺术性。钱币不仅作为商品交换媒介具有货币职能,而且具有重要科学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它能全面真实形象地反映文明时代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小小的钱币可以折射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人们了解历史文化的一扇窗口。收藏者之所以热衷于收藏古钱币,除了它自身的价值外还有其是极具观赏性的物品。翻开历代钱币图册,我们既有对历史的追寻,更有对钱币艺术的惊叹,还有对古人智慧的钦佩。中国古钱币的美学特征也在形制、文饰、材质等各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工

匠在铸币的同时注重将精美的艺术形式融入其中,遵循古代铸造工艺上器以载道的思想,具有强烈的视觉与艺术效果,进一步提升了古钱币的审美意蕴并扩展了古钱币的文化内涵。字、形、色、质、声五个层面已逐渐成为中国古钱币美学鉴赏的重要方式。

8. 钱币内容的广泛性。钱币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成为社会多种文化载体的钱币,其历史性、综合性的文化价值,知识性、趣味性的文化内涵,科学性、艺术性的文化精华,描绘出历史社会的文化百景,反映了文化历史的社会百态。我国古钱币除了流通领域中形制各异的可以用来进行货币交换的钱币外,还有专门用于收藏的或具有某种民俗文化意义的钱币,因而钱币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纵观我国古钱币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钱币文化实物,就是一部形象的大百科全书。

从钱币的以上特征可以看出,钱币文化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对钱币文化艺术的发展起着制约和影响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古钱币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底蕴深厚。每个时代的钱币文化对后来的钱币文化,都是一种即定的存在和条件,起着这样那样的影响作用,且有着继承性和融合性特色。但钱币文化艺术的发展,不是对前代钱币文化艺术的相循相因,而是适应时代的变迁、社会的需要而表达新思想、新观念、新情趣、新需求和新格调,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使钱币文化在扬弃、继承与创新中得到了弘扬。同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朝代的钱币文化都有一定张力和吸引力,在发展过程中,既能将自己的精髓、思想加以传播、输出,供外界钱币借鉴和仿效,又能吸取外界钱币的精华,在原有基础上演变、更迭,使之得到完善和丰富。因此,古钱币历来为人们所热衷收藏。收藏和研究古钱币历来是让人们感兴趣的事,钱币收藏是收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也为钱币文化的传承增添了光彩。

二、我国古钱币文化的历史作用及钱币收藏的意义

货币在历史进程中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古钱币作为货币的载体,其历史悠久,种类繁多,丰富多彩,涵盖面广,而古钱币文化的传播,贯穿于中国历史长河,“体现出文化在发展中所具有的连续性、阶段性和继承性,并全方位地承载和涵盖了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文化信息,始终伴随着封建统治阶级治国理政思想的继承和弘扬”。古钱币文化作为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其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古钱币与国家政权稳定关系密切。钱币是一种历史的记录和见证,钱币的铸造、印制与行用,往往秉承在位帝王的意志。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币制后,钱币的名称,常常采用各个历史朝代的国号和帝王的名号、年号,代表了当朝帝王的意志,因而钱币的开铸、行用、停废,与朝代的交替、政权的更迭和社会的治乱密切相关。

其次,古钱币对古代文化的传承功不可没。如前所述,钱币所具有的文化艺术特性,使钱币文化实际上成为一种综合性和边缘性文化,其内容丰富,民族性强,进一步强化了钱币文化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从古钱币的文化特征看,钱币又是古代思想文化的传导者、文字、书法艺术的传播者、我国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者,既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也能激发人们的收藏愿望。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古钱币的收藏对钱币文化的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再次,古钱币是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我国古钱币的历史发展,融合了历史、政治、经济、科技等多个方面。一枚钱币,不仅是货币交换手段,也是铸造(印制)技术的体现、文化艺术的传播媒介、国家政治主权的象征,还是实现我国钱币国际流通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一张奇特名片,提高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神器。据我国钱币史有关资料,中国古代印刷技术,通过元代波斯伊利汗国仿照元钞发行纸币而传入伊朗并向西传入欧洲。邻近我国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和地区,最初都使用中国钱币,而后仿制圆形方孔汉文钱。因此,可以说,一部中国钱币史所呈现的也是中国钱币文化走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侧影,体现了中国钱币的世界性融合。

《古钱币收藏与鉴赏》是一本古钱币收藏专著,对我国古钱币收藏的历史作了如下概述:纵观我国钱币的收藏、研究历史,约略可见三次较大热潮。第一个热潮出现于距今25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康熙、雍正年间曾大兴文字狱,不敢著文评论时事,而在众多文人之中,却兴起了一股“考据”风。古代钱币在宋代被列入金石学范畴后,似乎远离政治,使得人们在考证、研究古钱币的形制、书体、铸行等情况时,几乎从每枚钱币中都可以考据其凝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人们从中感怀历史,借古喻今、借古证今、洞若观火。这样,在官方的提倡下,先后出现了《钱录》、《钦定钱谱》等钱币研究书籍,民间也编写了《古泉丛话》、《泉林小史》等钱币收藏类书籍。可谓钱币研究的“耕耘”阶段;第二个热潮是民国初年,其时,由于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余年的封建皇

朝,改朝换代之际大量文物和古钱币等,从皇家流入民间,那时出现了一大批收藏家。第三个热潮是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推动了经济发展,解除了文化的禁锢,使民族文化和收藏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钱币收藏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对钱币的收藏、研究进入新的阶段。随着钱币收藏队伍的扩大,人们对钱币的认知水平得到了提高,特别是在我国国力不断增强的前提下,钱币收藏持续发热,对社会的稳定、科技的进步、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归纳起来,笔者认为,钱币文化通过收藏而得以传播,钱币收藏对钱币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1.弘扬钱币文化,可以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上,习近平对文化自信特别加以阐释,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因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我们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货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里程碑,由货币发展而形成的钱币文化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世界各国文化史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国家的盛衰、民族的强弱、国民的贫富、人民的生活,无不与货币息息相关。当今,随着我国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人们对钱币文化的研究热情日益高涨。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加大对古钱币文化的研究力度,做好古钱币文化的宣传引导工作,真正做到“古为今用”,继承创新,加快我国古钱币文化的传播,提高我国钱币的国际地位,不仅使人们在收藏中得到愉悦,而且也能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使钱币文化更好地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2.打造钱币精品,走上国际舞台。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古钱币研究取得了新的发展,钱币文化的传播展示了中国钱币的魅力。近些年来,我国不仅发行了流通领域的钱币,也发行与传统文化相关,具有时代意义的钱币。特别是钱币制造的推陈出新,发扬光大,走出国门,促进了国际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世界钱币的一部分。我国现代钱(下转第69页)

“光绪通宝”机制币

■ 李邦经

(湖北省钱币学会)

清光绪末年中国机制铜元开铸之前,国内传统范铸方孔钱因物价腾涌,铜价日昂,各地本就难以为继已久,各省钱局干脆先后停止范铸方孔钱的生产,纷纷筹款,效法广东,引进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较成熟的制币技术与设备,改铸对地方政府有丰厚余利的机制铜元。机制铜元式样新颖、称量标准、色泽光亮、花纹美观,颇受市场欢迎。唯一不便之处是铜元币值以“当十制钱”为主,虽有资料显示机制铜元初创便计划有一文、二文、五文、十文四等面值,但自始至终“当十铜元”铸数占机制铜元总数95%以上。这种不顾及市场运作的做法,直接导致市场找零困难。

创铸“光绪通宝”机制方孔钱最早在广州。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解决制钱缺乏,筹议购办机器,试铸制钱,奏上,议可。四月,电驻英公使刘瑞芬,定购英国喜敦厂机器,择地广州大东门外黄华塘建厂,(次年)七月动工,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竣工,四月十六日开炉鼓铸制钱,中铸方孔,正面顺读(应为“对读”——笔者注)“光绪通宝”,背面上下分列“库平一钱”,左右分列满汉文“广”字,成色铜六铅四,重如其文(约三克),此为大型广东机制币。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两广总督岑春煊以“停制钱,改铸当十铜元,市廛零用不便,飭广东钱局铸造有孔铜币。用紫铜六成,熔白铅四成,每文重三分二厘(约一克)。中穿圆孔,一面镌‘光绪通宝’四字,一面镌满文‘宝广’二字,商民称便。”(《广东造币厂第一次报告书》),此为小型宝广机制钱。

查存世实物,钱体注明满文“宝广”或汉文“广”字的机制方孔钱有如下几种:

1.面文“光绪通宝”四字上下左右列,背穿上“库平”二字横列,穿下“一钱”二字竖列,穿左右满汉文“广”字。钱径2.4厘米,有内廓,方穿,穿径0.6厘米,厚约0.1厘米,重3克(图1)。



图1 满汉文广,库平一钱(正、背面)

2.面文同1,背穿左右仅留满文“宝广”二字,厚度更小,重不足3克(图2)。



图2 满文宝广方孔机制钱英文加字版(正、背面)

3.上式机制方孔钱另有当五、当十两种,面文为“光绪重宝”,背穿上下镌有“当五”、“当十”二字。产量极小,目前难以一见(图3)。



图3 光绪重宝宝广局当十机制钱(正、背面)

4.面、背文同2,直径1.65厘米,中间方痕圆孔,孔径0.4厘米,重约1克(图4)。



图4 宝广方孔,小型(正、背面)

5.面文“宣统通宝”，余同4(图5)。



图5 宣统通宝,宝广方孔(正、背面)

据有关文字资料和存世实物分析,我以为1、2、3在前,是张之洞任上广东钱局所铸(以下称前期),4、5在后,为岑春煊任上该局产品(以下称后期),理由如下:

1.前期产品更接近中国传统制钱形制,表明机制方孔钱是范铸方孔钱到机制铜元之间的过渡产品。

2.前期产品符合后说资料表述,后期产品符合前说资料表述。

3.后期产品急剧减重,是符合动乱清末社会、经济实际的。

4.在机制币制作工艺中,圆孔比方孔的冲压省工省时,更易完成。

继广东首创机制方孔钱一定程度缓和地方市场找零难题之后,我国许多省局照此办理,为本地商民

解决制钱短缺的燃眉之急。先是沿江沿海(福州)宝福局、(武昌)宝武局(图6)、(南京)宝宁局(图7)、(杭州)宝浙局(图8)、(济南)宝东局(图9)、(天津)宝直局(图10),继而吉林(图11)、奉天(图12),以至宝泉(图13)、宝源(图14)京局也紧随而上。成色、形制多依照广东钱局,一般同一局名有多种版别,但因原材料限制,产量都不大,远比不上广东钱局的前期产品。其面背设计也多以广东机制方孔钱为蓝本,钱面楷书“光绪通宝”,背穿左右书满文局名。唯宝福局用宋体书钱面,钱背穿左右满文“宝漳”(图15);宝奉局于钱背穿上横列“官版”二字,穿下横列“四分”二字,记其重(图16);他省小型圆孔机制币,如宝福局“光绪通宝”(图17)、“宣统通宝”(图18)等,都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之后物。

另外,从最早的宝广库平一钱机制方孔钱开始,多数产品既有内廓又有方穿,有些产品虽有廓痕却无方穿,估计是生产过程中撞击穿孔的部件失灵而漏撞之故,有人称之“无穿”或“满穿”(图19-图22),因其少之又少,也有人认为是正式生产前未装撞杆的试铸币,其价更昂,几次拍卖会上起价都在数十万之巨。■



图6 宝武方孔(正、背面)



图9 山东壹文(正、背面)



图7 宝苏方孔(正、背面)



图10 宝津方孔(正、背面)



图8 宝浙方孔(正、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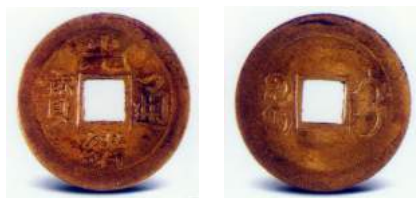


图11 宝吉方孔(正、背面)



图12 光绪通宝奉天机器局当十方孔(正、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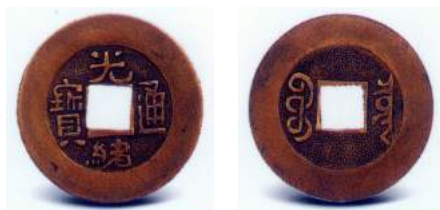


图13 宝泉局阔缘方孔(正、背面)



图14 宝源局满穿方孔(正、背面)



图15 宝漳局方孔(正、背面)



图16 宝奉局官版四分方孔(正、背面)



图17 宝福方孔(正、背面)



图18 宣統通宝宝福方孔(正、背面)



图19 光绪通宝山东一文黄铜样币(正、背面)



图20 光绪通宝山东一文红铜样币(正、背面)



图21 宝川方孔(正、背面)



图22 宝奉局官版四分满穿方孔(正、背面)

论罕见顺治出谱钱

■ 黄定学

(湖北省钱币学会)

2016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佟昱先生新著《新编顺治通宝钱谱》(以下简称“新谱”),是目前有关顺治钱的一部经典著作。在认真研读之后,对照“新谱”,对收藏的千余品顺治版别钱实物进行了一次梳理,共梳理出顺治出谱钱版别430余种。现将这些出谱钱中的罕见版别介绍于后,供顺治版别钱爱好者研究参考。

一、罕见顺治出谱钱及其成因

罕见顺治出谱钱是指未被《新编顺治通宝钱谱》著录的6级以上版别钱。出谱钱分两类:同版的出谱钱和不同版的出谱钱。同版的出谱钱是指形制、材质、钱文、直径大小及铸造工艺、个别特征与钱谱完全相同的版别钱。不同版的出谱钱是指形制、材质、钱文、直径大小及铸造工艺、个别特征的某一方面或全部与钱谱存在一定差异的出谱钱,本文研究的,仅仅是后者。

为什么会存在出谱钱、罕见顺治钱为什么也会出谱?

第一,品相升级与推陈出新的影响。2006年前,顺治钱的一些经典坑口尚未被发现,当时钱谱所能著录的,基本都是一些散坑、传世和零星发现的钱。而“新谱”成书之时,正值顺治钱有了更多的发现,这些钱有确切的发现时间和地点,无论是品种或版别,都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品相也极为精美。从而,为“新谱”的编纂,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来源。本文列举的出谱钱,基本上都是散坑钱(包括传世品),属于非经典坑口,后发现、小直径、孤品版别除外。品相升级的好处是保证了“新谱”的质量,但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了部分版别。仅以顺治无纪局式钱为例,因为品相升级,“旧谱”^①中的版别钱在“新谱”中“被出谱”的就有40种。

第二,版别的不可穷尽性。任何一部钱谱,都不可能穷尽其作为研究对象的版别钱。钱谱,只是钱

币实物在某一时间点上的凝固和静态的反映,而不能反映版别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比如,新版年年都有发现,能被钱谱著录的,则有时间上的阶段性。钱谱成书之后,这些后发现的新版别钱,都被称之为出谱钱。

由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顺治罕见钱的发现概率和存世量持续上升。比如:顺治版别钱中的珍稀钱,最近十年发现的就有:上工3枚,上新3枚,上下一厘东2枚。缶宝版右同1枚,缶宝版右户5枚左右,右同版右延7枚。这类“新谱”成书后发现的罕见版别钱,在本文序号中列6、7、8、14、18,共有5枚,占本文所列罕见出谱钱的25%,排第二位。

另外,中国幅员辽阔,历史和地理条件千差万别,受交通、信息和收藏者视野等条件限制,要穷尽天下的顺治版别钱,目前暂无可能。

第三,对小直径罕见顺治钱的异见。有一种看法认为,有些小直径的罕见顺治钱是用大直径行用钱翻铸出来的,因此,疑似。出于谨慎,“新谱”对许多这类罕见版别钱回避了。这类小直径小样钱在本文第二部分中,列序号1、3、9、10、11,共5枚,占本文所列罕见出谱钱的25%,并列第二位。其实,用大直径的行用钱做母翻铸小直径的行用钱,已为事实所证明。比如:右同版左正延小样是用右同版右延改范铸成,因背右有“延”字被铲去的遗留痕迹。一般认为,右同版右延是右同标准版的改范钱^②,因为采用了右同标准版的面文。所谓改范,就是钱局把右同铲除,粘上一枚特制的“延”字做母钱。为什么是特制,因为右同版右延与右同版左正延的延字写法是不相同的。如果是用右同版右延的母钱改范呢,这可以推演一下,第一步,把粘贴上去的右延取下来,第二步,在背左粘上一个延字。这时请注意,背右留下的是“同”字被铲除的痕迹,而不会是延字的痕迹。只有用右同版右延的行用钱(也可称右同版

左正延的母钱)改范,才能留下延字被铲去的痕迹。从现存实物来看,右同标准版直径在25.2~26.8毫米之间,右同版右延直径在25.5~26.2毫米之间,按黄铜最大线收缩率2.2%计算,26.8毫米和26.2毫米的右同标准版改范后可以分别铸出直径26.2毫米和25.6毫米的右同版右延,与实物基本一致。而且,右同版右延是2012年才发现的新版,至今仅5年,也根本没有造假的足够时间周期。

第四,孤品顺治钱版别尚待认证。如本文第二部分:《稀见顺治出谱钱实例》序号4、17、20缶宝单点异书通、全笔治省点通背开口同同一厘、宝泉满文复式三枚钱。全笔治省点通背开口同同一厘目前已经发现同版,只是“新谱”未及著录。顺治钱版别的认定有两条不成文的规则:行用钱必须有2枚以上同版方可定版;母钱必须有同版子钱才可认定。比如:“新谱”第237页,BQ5.G01宝泉双点角头通在成书时,尚只发现了一品,因此,“新谱”作者采用了“不排除为后铸品”的比较有弹性的说法。直到2017年4月27日又在江西吉安发现一枚同版,这个新版才算认定,确定为试铸样钱。

第五,2006年12月佟昱《顺治通宝钱谱》的出版,进一步提升了顺治钱爱好者区分稀见顺治版别钱的能力。顺治版别钱知识的普及,造就了一支顺治版别钱的爱好者队伍,从而使一些稀见顺治出谱钱版别能更快被发现,否则,稀见钱无人辨识,就会视同普通版别了。通过网络更快被传播,为理论研究者者在最短时间里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

二、稀见顺治出谱钱实例

本文所列稀见顺治出谱钱,按顺治“五式”钱先后顺序排列。

1.名称:长川顺离点宝背二小样

参数:直径27.4毫米,厚1.25毫米,穿5.8x6毫米,重4.7克。

特征:阔缘广郭,长川顺,凤冠通,离点宝,背等横二,传世品,黑漆古包浆,包浆熟润,小样。

等级^③:四级。



2.名称:短川顺背二大样

参数:直径28毫米,厚1.5毫米,穿5.2x4.9毫米,重5.5克。

特征:铸工规整,穿郭方正,阔缘广郭,短川顺,凤冠通,离点宝,背短头二,大样。传世品,黑漆古包浆,器形完整,大样少见。

等级:四级。



3.名称:短川顺背二小样

参数:直径27.4毫米,厚1.2毫米,穿5.2x5.8毫米,重4.5克。

特征:同上,北方砂坑,生坑薄锈,小样,网络图片。

等级:四级。



4.名称:缶宝单点异书通

参数:直径25.8毫米,厚1.3毫米,穿5.2x4.9毫米,重3.6克。

特征:缶宝,单点异书通,除通字外,其余三字与单点异头通写法相同。素背,细郭,生坑,被红、绿、黑、灰、白五色锈,至今仅见,根据锈色判断,应系筒子钱开出,发现于北京。

等级:六级。



5.名称:缶宝单点通长川顺正样^④

参数:直径25.8毫米,厚1.5毫米,穿4.3x4.5毫米,重5克。

特征:缶宝单点通,长川顺。阔缘狭穿细郭,黑漆古包浆,间少量红绿锈,正样,钱谱上只著录了大

样和小样。

等级:五级。



6.名称:尔宝光背版上工

参数:直径25.2毫米,厚1.1毫米,穿4.9x5毫米,重3.5克。

特征:尔宝光背版面文,背上工,日本回流,华夏网拍品,河北一名家原藏,经佟昱先生鉴定,极为少见。传世品,包浆熟旧,流通痕迹正常,保存状态较好。钱谱虽然已有相同直径品著录,但背面边轮阔狭的方位却明显有别。

等级:一级。



7.名称:双点通上宁版背上东

参数:直径25毫米,厚1.1毫米,穿4.6毫米,重3.3克。

特征:轮廓周全,穿郭方正,双点通上宁版,背上肥东,传世品,黑漆古包浆,间少量红绿锈,包浆老旧,钱文清楚,流通痕迹自然。2017年2月发现于福建,存世稀少,至今仅四见,正样。

等级:三级。



8.名称:右同标准版右延

参数:直径25.5毫米,厚1.25毫米,穿5毫米,重3.6克。

特征:右同标准版面文,背特有的右延字,有大、正、小样之别,此品为小样,台湾鸿禧美术馆旧藏,后在华夏网拍出。传世品,少量红绿锈,宽缘,包浆老旧,字郭深峻,保存状态较好。

等级:二级。



9.名称:右同标准版左细字狭延小样

参数:直径25.2毫米,厚1.35毫米,穿4.9毫米,重4.2克。

特征:右同标准版面文,背左细字狭延,有大、正、小样之别,此品为小样,背左细字狭延是右同版左延中存世量略多的一种。

等级:五级。



10.名称:右同标准版左正延小样

参数:直径25毫米,厚1.1毫米,穿5.2x4.9毫米,重3.4克。

特征:右同标准版面文,背左正延,有大、正、小样之别,直径在25~25.7毫米之间,此品为小样,右同版右延改范钱,背右尚有右延被铲除的遗留痕迹,系用右同版右延行用钱改范铸成,传世品,包浆老旧,钱文清晰,铜质金黄,华夏拍品。2016年4月改范痕迹为本文作者发现。此钱的发现说明,有些顺治钱就是用铸工较精的行用钱做母翻铸的,因为直径均较小。早期发现的一品同版,亦有相同右延改范痕迹。

等级:五级。



11.名称:右同标准版左大延小样

参数:直径25毫米,厚1毫米,穿5.2x5.5毫米,重3克。

特征:右同标准版面文,背左大延,有大、正、小样之别,直径在25~26.3毫米之间,此品为小样。传

世品，黑漆古包浆，台湾鸿禧美术馆旧藏。

等级：五级。



12.名称：大字宽宁大样

参数：直径27.1毫米，厚1毫米，穿5毫米，重3.9克。

特征：阔缘广郭，直川顺，右短川，钱文大字，背上省笔宁。传世品，包浆熟旧，铜质细润，钱文清晰，地章平整，流通痕迹自然，大样。钱谱著录最大直径为26.9毫米。

等级：六级。



13.名称：右昂中荆大样

参数：直径27.3毫米，厚1.2毫米，穿4.4x4.6毫米，重4.4克。

特征：铸工较好，穿郭方正，宽顺，肥治，狭通，昂宝，寄郭，背右昂荆，荆头左飘并高出上郭，传世品，黑漆古包浆，大样，“新谱”著录最大直径为26.6毫米，27.3毫米直径者仅见，性质待考。

等级：七级。



14.名称：提水治宝下月背上福

参数：直径25.8毫米，厚1.15毫米，穿6x6.2毫米，重3.8克。

特征：铸工规整，轮郭周正，钱文清晰，铜质细润。固定版别，治字三点水上提，宝下阴月。传世品，广穿细郭，黑漆古包浆，间少量红绿锈，2016年11月发现。宝下阴月者“新谱”未见著录，但网上曾有相同版别出现。

等级：六级。



15.名称：尔宝光背版临一厘

参数：直径25.3毫米，厚1.3毫米，穿4.6x4.8毫米，重3克。

特征：尔宝光背版面文，双点通，阔缘细郭，背临一厘，顺治早期试铸钱，较少见，网络图片。

等级：四级。



16.名称：东一厘版河一厘

参数：直径24.8毫米，厚1.3毫米，穿4.1x4.6毫米，重3.6克。

特征：尖头通版东一厘面文，背河一厘，直厂厘，河字三点水在一条线上，混配版别，少见，至今仅发现5~6枚。

等级：五级。



17.名称：类户一厘版同一厘

参数：直径25.4毫米，厚1.4毫米，穿5.2x5.3毫米，重4克。

特征：类户一厘版面文，省点通，全笔治，背同一厘，开口同，生坑，朱砂锈间少量绿色结晶锈，较少流通，保存完好。同一厘细分版别30余种，直径24.3~26.6毫米，此版在同一厘中略少，目前已见同版，但未及入谱，正样。

等级：五级。



18.名称:宝泉双点角通大样

参数:直径28毫米,厚1.2毫米,穿5.6毫米,重4.9克。

特征:双点角头通,大顺,异书治,狭贝宝,连轮寄郭,背宝泉。铸工规整,穿郭方正,钱文清晰,铜质金黄,传世品,传世包浆,流通痕迹正常,保存状态良好。试铸样钱,未正式流通,至今仅二见。2017年4月发现于江西吉安。

等级:四级。



19.名称:宝泉寄郭双点通大样

参数:直径28毫米,厚1.2毫米,穿5.4x5.6毫米,重4.4克。

特征:双点方头通,异书治,寄郭,背宝泉。铸工精良,穿郭方正,钱文清晰,铜质金黄,传世品,传世包浆,流通痕迹正常,保存状态完好。此版大样至今仅见,钱谱未见著录。

等级:六级。



20.名称:宝泉满文复式

参数:直径27.1毫米,厚1毫米,穿6x6.1毫米,重3克。

特征:宝泉版面文,单点工头通,背满文宝泉复式,传世品,传世包浆,流通痕迹正常,满文宝泉复式钱存世稀少,至今仅见,未见钱谱著录。

等级:六级。



三、罕见顺治出谱钱的价值

罕见顺治出谱钱是顺治版别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钱币专家和理论研究爱好者历来关注的重点,它可为今后的钱币理论研究及科研活动,进一步提供实物支持。

1.出谱钱是顺治版别钱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在已知存世的顺治钱中,能够被钱谱选择著录的,毕竟是有代表性的品种和版别,即“关键的少数”,不可能是版别钱的全部。二是从数量上看,出谱钱存世量应该还是比较多的。从目前可以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出谱钱就有数百枚之多,如果把所有顺治出谱钱征集起来,编辑成一部《续新编顺治通宝钱谱》,其素材也是足够的。三是“新谱”属国家级科研课题,是有关顺治钱版别的国家标准。在成书前,作者对存世的顺治版别钱竭尽全力进行了全方位扫描和搜集,但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经济和交通情况千差万别,边贸也十分发达,通过国际贸易“回流”也很正常,这样,既会有许多新发现,也仍会有较多遗漏。因此,出谱钱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2.出谱钱为进一步开展顺治钱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新谱”是一部有关顺治钱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但是,顺治钱理论研究的任务并不能说全部完成。比如:有关顺治母钱和样钱的研究;混配版的成因及相互关系;对钱现象;改范钱研究;小样、后铸钱成因及科学依据等。而且,“出谱钱”本身就是一篇很大的文章。

3.根据各注册拍卖公司的交易情况,出谱钱在钱币市场上也有较好表现。同版的出谱钱在钱币市场上与谱内品价格基本上相当,新版出谱钱在被发现时价格往往较低,但是,一经名家鉴定或钱币界公认,价格就会直线上涨,这也是顺治出谱钱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

注 释

①“旧谱”指佟昱著《顺治通宝钱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6年12月1版1印。

②顺治改范钱是指借用并通过修模使一种钱成为一种新的钱局钱或版别钱的铸造工艺方法。

③钱币定级,目前国家并无统一标准,各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一枚钱,专题性钱谱定级往往高于综合性钱谱,而初版的钱谱定级往往又高于再版钱谱,要完成定级的统一,尚需时日。

④顺治钱正样。顺治钱大、小样,在佟昱著《顺治通宝钱谱》(中华书局,2006年12月1版1印)第158页中有明确定义,但是,正样没有涉及。本文所说的正样,是指同一版别中一种介于大、小样直径之间直径的钱。

压胜钱与民俗

■ 郭浩悦

(中国人民银行黄冈市中心支行)

压胜钱也叫厌胜钱。“厌胜”的原意是“以诅咒厌伏其人”，即方士们用咒语和象征性的物体帮助他人来诅咒仇人、祈祷鬼神，制服被诅咒者的工具。厌胜一词，最早见于《汉书·王莽传》：“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后汉书·清河孝王庆传》中曰：“因诬言欲作盅道祝诅，以冤为厌胜之术。”厌通“压”，压胜钱就是人们据厌胜法的本义，为避邪祈福而制造的一种似钱币的物品，供人佩带赏玩，驱除邪魅，祈求吉祥。钱币的图案、面文一般都是反映古代民俗的内容，因此，也称之谓民俗钱。

从历史来看，压胜钱最早在战国时就已经出现了。战国时燕国使用的弧背尖首小型刀币背面就已铸有“吉”字。战国齐国发现的六字刀币“齐建(返)邦口大刀(化)”(图1)也被有的学者认为是田单复齐时齐国特别铸造的纪念币，这也算是最早压胜钱的一种了。压胜钱经过各个时期的发展，到明清时，其铸造工艺和研究达到鼎盛时期，内容几乎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图1

压胜钱的内容涵盖礼仪、宗教、时令、丧葬、婚俗

等方面，内容丰富，种类繁多。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压胜钱是反映民俗的一面镜子。具体有以下几种。

一、为吉言、祝福钱

这类钱币的数量最庞大，流传也最为广泛。从宋代时，小孩满月，就有亲朋云集庆贺，馈赠喜钱的习俗。这种叫做“洗儿钱”。“百岁钱”、“长命钱”是孩子周岁时，戴在孩子身上保平安的钱，面文通常为“长命百岁”、“长命富贵”等。背面有吉祥图案。背面是佛教、道教的图案。到明清时，此类压胜钱的形状与原来有很大的差异，成为胸前配挂的各种牌子，质地多为玉、银，上面刻有吉语和吉祥的图案。

陪嫁钱，结婚时女方一般作压箱底用，寓意是为祝福。钱文一般为“和合百年”、“龙凤呈祥”等。结婚时的撒帐钱，为传世品，一般币面文为“天作之合”、“早生贵子”、“金玉满堂”等，其形状与流通钱币有很大的不同。一般都为花形或锁形。

祝寿钱有三种，有的是面文直接为吉语，如“福如东海”、“延年益寿”、“福寿康宁”、“寿慈万寿”等。1936年浙江杭州古荡出土的一枚南宋早期寿慈万寿厌胜钱，为银质小平钱，有内外郭，面文为篆书直读“寿慈万寿”。有的钱币上是长寿吉庆的图案，有祝贺的寓意，像龟、鹤、松柏、寿桃等；还有的一面是吉语，另一面是吉庆图案。《古泉汇》著录了一枚福延寿长云海纹厌胜钱，为铜质，有内外郭，面文为楷书直读“福延寿长”，背有云、海、山及走兽。

仕途吉言压胜钱，面文通常为“加官进禄”、“独占鳌头”、“出入将相”、“状元及第”等(图2)。镇江博物馆藏状元及第龙凤纹压胜钱是一枚典型的科举吉语钱。钱为铜质，有内外郭，直径5.1厘米，面文为楷书直读“状元及第”，背穿右有一龙，穿左有一凤，穿下有水波纹。

求财的民俗，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了。上海

福泉山23号西汉中期墓葬出土的一枚厌胜钱,为青铜质地,圆形,方穿,有内外郭,内郭与外穿相错45度,钱体上有一柱状钮,下有破损缺口,似为一连环的残痕,直径2.4厘米,面文为篆书顺时针旋读“旧入千金”,背文为篆书顺时针旋读“长毋相忘”,字间有乳丁纹。



图2

二、和宗教文化有关

人们对鬼神的崇拜,对佛教、道教的信仰很多体现在钱币上。有的钱体图案为四灵、八卦或传统的十二生肖等纹饰。字样多见“此符压怪”、“阿弥陀佛”等。在民间,这类钱币一般会随身携带,以保佑人们平安、鬼神不侵。还有各种莲花、狮子等与佛教有关的图案,一般都是在佛堂中供奉的,以祈求佛祖保佑平安的供养钱。五台山在修塔时挖出一批“浮化元宝”背佛像的金钱(图3),是宋朝皇室给五台山佛庙的供养钱。



图3

三、丧葬钱

人们认为死后的世界和现实的社会是一样的,就会在墓葬中埋葬钱币慰藉死者,满足死者在阴间的需要。分为买路钱、咽口钱、压棺钱以及坟头钱

等。埋藏的钱币有的直接用流通货币作为陪葬,有的是仿照流通货币的替代品。还有特别的压胜钱上面有八卦、符咒等纹饰。现在北方祭祀用的各种纸钱,就是这种习俗的延续。

四、行乐钱

有游戏钱、棋钱、占卜钱、打马钱、酒令钱等。出土的西汉早期王公贵族间宴饮时所用行酒令之钱,直径39毫米,厚度1.2毫米,红绿锈熟坑,一面汉隶上下对读为阴文“第廿三”另一面光背钱(图4)。



图4

五、时令钱

在中国古代对时节十分重视。中秋有祈月钱,代表花好月圆,幸福团圆;端午时,一般会给孩子身上戴上五毒图案的钱币驱邪;春节时,需要给晚辈压岁钱,吃饺子有口福钱;正月十五挂灯时有挂灯钱。

六、春钱

有两种,一种是上面有春宫图案,一般是作为女孩结婚时娘家的陪嫁压箱底,秘而不宣,流传不是很多。另一种是妇女头上戴的用作头饰的钱币。《闲居录》中载:至大改元,妇女首饰皆以金银作小钱戴之,谓之“春钱”。

压胜钱的许多习俗延续至今。有些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了地域的差异。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祈求平安幸福的诉求是一脉相承。压胜钱上的图纹构成简单,文字直白,但却蕴含深意,收纳概括了人们心中所有的祝福和祈祷,所以才在民间广为流传。■

钞票上的银元图案

■ 朱清华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清朝光绪末年,市面流通的货币十分复杂,流通中以银两、银元、制钱并行,也有清政府发行的宝钞、银票加上外国在华银行发行的客钞,更有铜元的铸造与使用,各种货币间的比价不一,兑换复杂且流通携带交易极为不便。光绪二十年左右起,各省相继设立了官银钱号,以解钱价日贵、商民交困之态,在各官银钱局发行的钞票中有少数图案为银元图案,很有特色,民国期间,也有少量银行发行的钞票上带有银元图案,用银元作为钞票上的主图案,既美观大方又一目了然,更有画龙点睛之妙,起到了“币中币”

的作用,而民国二十四年实现法币政策后带有银元图案的纸币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中,现分述如下,如有遗漏之处,敬请指正。

一、湖北银元局壹大元票

光绪二十年,因制钱甚少,银元易钱困难,张之洞奏请朝廷拟在武昌设立湖北官钱局发行银票,朝廷准奏后,四月张之洞令湖北善后局筹划此事,并拨银5万两,制钱5万串,作为基金,委托日本大藏省印刷局印制银票,此票正面上方有满汉文“光绪元宝”,



图1 湖北银元局壹大元票(正、背面)

其下方为双龙戏珠图案,双龙各怀抱“湖北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元图正背面,银元图案下方直书“凭票取银元壹大元”,右旁为“湖北银元局”,左旁为钞票字与号,下端印“重库平七钱二分”,票背印湖北总督张、湖北巡抚于的示谕,其中“银元局刊发银元票每张壹元,与官钱局所发钱票相辅而行,按照银元市价折合银钱准其完纳丁漕、关税、盐课、厘金各官项……”说明此种银元票只发壹元一种和其用途,票上印有重库平七钱二分和银元图有代表银元壹元之意。票背示谕中印有“欲取用银元者即赴银元局及武汉官钱局一律照发”表明此票能随时兑换银元,票背上的日期“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其印制精美大方,大气磅礴。这也是清廷的第一枚带有银元图案的银票(图1)。

二、广东官银钱局银元票

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巡抚张人骏因广东市面流通筹码短缺而上奏朝廷,开办广东官银钱局,并发行银元票。并制定《开办官银钱局行用银元票章程》,由藩库、运库、关库、厘金局、广东海防善后局合认资本100万作为资本金,同时在上海、香港、汕头开设分局。辛亥革命后,广东军政府将广东银钱局接收,但因时局不稳,虽然军政府与官银钱局作了多种努力,但因银票仍被低价使用,加之发行量较大,军政府与官银钱局面临更沉重的财政危机,连续亏损,后改组为广东地方实业银行。广东官银钱局发行过北洋官报版与日本版二种,北洋官报版因印刷不精而出现假票而改订日本印刷局印制的银元票,又分成“大元票”与“毫子票”二种,均为1、5、10元三种面额纸币行用于市,图案均采用双龙戏珠和“广东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元的正背图案,大元票与毫子票的背文不同,前为“凭票取X大元照市核毫”,后为“凭票取银元X元概作毫子两不贴水”,背面中间为银元票的发行条例与发行年月,下方为每元重库平七钱二分。背文的条例“与现银无异可向官银钱局随时照兑”,也说明是随时兑换银元(图2)。

三、裕宁官银钱局银元票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江南裕宁官银钱局成立,隶属江宁布政司,总局设置于江宁(南京)评事街。先由江宁布政司藩库拨银5万两作为资本,后又金陵官银号库款20万两白银作为追加资本。裕宁官银钱局共发行光绪三十一年版、三十三年版银元票,二版银元票中均带有银元图案。三十



图2 广东官银钱局银元票(正、背面)



图3 裕宁官银钱局银元票(正、背面)

一年1、5、10元银元票背图上有“江南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七二分”银元正背图，银元图案之间有双龙戏珠图，上书“此票奉宪，准纳地丁、钱粮、关税、厘金、盐课等款，一律通用”。四周所盖之各分局之官印，甚是美观大方。该钞正面上方为横飞的双龙抢珠，左右各有一竖龙，中间仍为双龙戏珠，背面除了有双龙抢珠处，还有一枚“江南省造、光绪元宝”，银元票上8条龙加上银元里的一条龙共计九条龙，又称“九龙图”，因印制精美、大方而深受藏家的喜爱，一枚纸币上有九条龙在中国纸币中是绝无仅有的(图3)。

光绪三十三年版银元票，正面加盖英洋(鹰洋)

者背面为端方像，二侧分列大清双龙旗与“通用银元”四字，因图案中有大清双龙旗，又称“双旗版”，正面加盖“龙洋”者其背面为端方像二例分列江南省造，乙巳年(光绪三十一年)龙洋的正、反面故又称“银元版”。三十三年版银元票因背图为时任两江总督端方头像加上有“双旗版”，“龙洋版”的变化而为其特色。

四、安徽裕皖官钱局银元票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两江总督及安徽巡抚上奏，开办安徽裕皖官钱局，同年二月二十四日清廷复文：

“经部议准，钦奉准许开业”。官钱局初由省政府招商入股，官督商办后改为官办。同年十月开业，由牙厘局和筹议公所各拨银5万两，合为10万两。官钱局设于省城安庆商务局内，辛亥革命期间，安徽发生兵变，乱兵哄抢纵火官钱局，致使该局倒闭。民国初改组为安徽中华银行。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裕皖官钱局委托上海商务印书馆印造直式银元伍圆(图4)及横式银元壹圆(图5)共计40万元，两票正面均“安徽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元两面图案，左侧直书“光緒三十



图4 安徽裕皖官钱局直式银元伍圆票(正、背面)



图5 安徽裕皖官钱局横式银元壹圆票(正、背面)

三年冬月吉日”，右侧为字号，手书编写，两侧边框分列“此票准完纳丁漕、关税、盐课、厘金”，“如有私刻假票者照私铸例治罪”，背面为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由安徽巡抚领衔之示谕。壹圆与伍圆券正面均有多种地名加盖，这说明了流通范围与使用区域，也有加盖龙洋或鹰洋，这二种加盖是等值的。

五、四川濬川源官银行银元票

濬川源官银行创办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资本总额50万两，官股30万两，商股20万两，总行设成都，先后在北京、上海、汉口、重庆等地设立分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商股一律退还，纯归官办。辛亥革命时，蜀军政府提款52万两，以至无法维持而停业。民国二年，二次革命爆发，濬川源又被各军提款七十余万两而致周转不灵，改组成官商办后经营情况再次好转。民国五年，蔡锷在云南起义，讨伐袁世凯，战争期间行款再被提用而从此营业寥落，一蹶不振。民国六年底又复业，民国四年印制“四川濬川源官银行兑换券”以收回蜀军政府发出的军用票，该票只见有民国四年1元一种，横式，上有“四川濬川源官银行”，左右为民国四年袁世凯嘉禾银元正背图，票正面四角为四颗圆形图章，左上角为“巡按司印”、左下角为“银行总理”，右上角为“将军之印”，右下角为“财政厅印”，背图为银元兑换券发行条例。濬川源官银行是四川清代早期银行之一，它有两个特点，一是称官银行的仅此一家，二是民国四年袁像银元其实并无实物存在，纸币上四年袁像仅代表纪年之用。濬川源官银行经历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云南起义，在每一次变革中濬川源官银行均损失巨大，目前仅见民国四年“四川濬川源银行兑换券”一种(图6)。

六、广西银行发行的乌龙票

宣统二年(1910年)广西巡抚张鸣岐将原“广西官银钱号”改组成“广西银行”，停发银两票而发银元票，这是广西近代历史上第一家以“银行”称谓的金融机构，广西银行的总行设在桂林，另有南宁、梧州设有分行。

广西银行1910年(宣统二年)向日本订印壹元、伍元二种，其中壹元券为一百万张、伍元券二十万张，总金额二百万元，因此票正面中间印有两条黑龙所以俗称“乌龙票”。壹元面额乌龙票正面中间印有一枚广西省造，宣统元宝银圆图案，而伍元面额乌龙票的正面中间则印有五枚广西省造、宣统元宝银圆图案，银元图案下方分别印有“壹圆银票”或“伍元银

票”说明该银元票可以随时兑换等额银元，此票背面为盖上“广西银行”官印的告示。其中“一切官款并民间买卖等事均照票面数目出入，一律不得折扣，如欲兑换现银均可随时向本省总分各行兑换”，乌龙票发行的第二年就发生了辛亥革命，清宣统二年成立的“广西银行”运行时间仅一年多，也只有发行“乌龙票”一个品种，二个面额。“乌龙票”存世极罕见(图7)。



图6 四川濬川源官银行银元票(正、背面)



图7 广西银行发行的乌龙票

七、中南银行兑换券

中南银行属于民国期间的商业银行，中南银行于民国十年(1921年)7月15日正式成立，总行设于上海，银行性质为股份制，该行发起人为南洋华商黄

奕住。黄奕住任董事长、胡笔江为总经理。中南银行开办时就以侨资银行身份向财政部呈请独立的纸币发行权,北洋政府因其系归国侨胞在华成立的第一家银行,而特许了其发行纸币的请求:“查新设银行发行纸币前经禁止有案,本难照准。惟念该侨商等久羁国外,不忘祖国,筹集巨资创办中南银行,于流通金融及发展实业前途,均有补益,姑予格外通融,暂准发行,将来政府订有统一纸币条例颁布后,该行仍应遵守,以重币政”。

中南银行开业后,因其信誉良好,深受市民依

赖。业务发展迅速,在天津、南京、汉口、厦门、香港等地设立分行。发行的纸币面额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5种,民国24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将纸币发行权收归中、中、交、农四大银行,中南银行停止了纸币发行业务。

中南银行民国十六年英国华德路版一元券、竖版,其正背面为民国三年袁像银元的正反图案,因其券上印有代表满、汉、蒙、回、藏五个民族的妇女头像而闻名钞界,这便是大名鼎鼎的“五女图”,寓意为“五族共和”(图8)。



图8 中南银行兑换券(正、背面)

(上接第54页)币的制造,在传承历史和创新发展上有了新的飞跃,其制作更为精致、美观,内涵更加深远、深厚,钱币精品不断涌现,如具有中国特色的生肖金、银纪念币,品种多,成系列;已发行10多年的熊猫纪念币可爱、有趣,等等,都受到了钱币收藏爱好者的追崇和喜爱,人们的收藏意识日益增强,钱币收藏队伍更加壮大。而随着钱币收藏的持续升温,钱币文化也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3.稳定货币政策,服务国民经济。我国古代钱币记录和见证了古代历史的变迁和制度的变革,钱币的铸造,印制和发行通常是国家行为。形态各异的钱币,不仅是充当经济运行的媒介和载体,而且记录着政治生活的诸多信息。有人说,千百年来,钱币作为历代帝王改朝换代的标志,形成一个不间断的系列;作为军阀、政客掌握权柄的象征,又刻录下种种荣耀和卑劣;作为揭竿而起的起义民众的武器,则

留下血与火铸就的铭记。由此可见,古钱币的历史发展,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挖掘钱币在经济社会中频繁更替的深层历史原因,对我们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服务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适度的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必定会给国民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因此,弘扬古钱币文化,也是为当今现实的货币金融政策服务的重要参照。

[参考文献]

- [1]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2] 汤可可.中国钱币文化[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 [3] 王永生.钱币文化: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N].金融时报,2014-03-07.
- [4] 欣士敏.钱币文化与艺术[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 [5] 刘建斌.古钱币收藏与鉴赏[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 [6]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历代货币》编辑组.中国历代货币[M].新华出版社,1988.

漫话铝合金分币

■ 李邦经

(湖北省钱币学会)

人民币中的分币始于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开始正式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中。这套人民币设计试制于1953年,除主币一元、五元另有1956年版外,主辅各币十一种面、背下端均有“一九五三年”字样。其中分币三种,即壹分,贰分,伍分,币面主图分别为汽车、飞机和轮船。

1957年12月1日开始,又发行始铸于1955年的等值铝镁合金分币三种,皆圆形丝齿,面有国名,国徽居中;背设麦穗及币值,下书制作年号(壹分币枚重0.67克,径18毫米,贰分币枚重1.08克,径21毫米,伍分币枚重1.6克,径24毫米)。这套硬分币色泽光亮,构图简洁,大小轻重适度,在流通中大受欢迎,逐渐替代了纸分币。

近四十年之后,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及人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物价随之上浮,人民币中的分币失去作用,逐渐退出流通。适逢收藏热渐涨,现在竟成为钱币收集研究中一道易入门,难突破的新课题。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注意铝合金分币,时至如今,大多数家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硬分币。有些人误以为一概十分珍贵,有的甚至秘不示人,存有“留给儿孙结婚的时候换彩电”之愿,这是错误的。记得当初,我怀揣几十元纸币,走街串巷,找小门店、小商贩换硬分币,忘不了店主那疑惑的眼和冷冷的对答:“你要这干什么?!”开始实话实说:“我是钱币学会的……用于课题研究……”那么回答一定是“没有!”我很是郁闷,明明知道他们对“阿堵物”有点烦,找零有限而收进不绝,且银行多因人手少,事不大却十分麻烦,不予兑换,我找上门来收取,本应是喜出望外的事,为什么不换?很快我悟过来了,坏就坏在“研究”一语上,既然有人研究,姑且先囤积些时再说。况且已经有人传言“硬分币中含银”,白花花的银子为什么要白给你?从此,我再不敢言“研究”,还

扮出很烦的样子说出换分币的原因:——“我老婆是炸油条的,每天得很多分币找零”(当年油条每根八分)。店主这才兴高采烈地全数搬出给我,还免费赠送一纸箱或塑料盆、桶,让我搬走。回到家,经洗涤、晾干、分类清理、笔笔记录,大多数按币值分开,每百枚一筒卷紧,送到附近银行兑换纸币。那些年轻的银行员工很信任我,从不复查,签名留下电话号码便付款走人。然后又走街串巷,做那些于人于己都有益的事,竟乐此不疲。

硬分币连续、大批量发行近四十年间,银行累计推出以百亿计,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城乡每一个角落,能供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周转的硬分币,其基数之大,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实际上退出流通后,银行至今无回收规定,民间留存数极大。只是近四十年间,制造及投放素无定例,有的年号三种面值币全发,有时只发行一种或两种,有时一种也不发,投放也是根据当时各地市场流通需求批拨,多寡悬殊,分布不均。另外,由于我国分币币材硬度不及铜或铜镍合金,较易磨损,且初铸之时,铝合金配比不当,投放市场不久就变色难看(如1955年伍分币)那些磨损情况较严重的硬分币大都也是发行年代较早的,已陆续退出流通,回炉归锭,因此早期币收集难度较大,更难找到品相上好的。晚期硬分币铸量剧减,有些发行后尚未进入流通领域便实际上失去了流通职能。1991年以后,银行仍逐年发行三种不同面值的硬分币,同当年流通的新版金属币(壹元,钢芯镀镍,背牡丹图;五角,铜锌合金,背梅花图;壹角,铝镁合金,背菊花图)一并,由银行装帧发行,其量仅三十万套,那就专供收藏纪念了。进入新世纪后,壹分币仍在发行,其量甚小,只在大城市中心银行用于外币兑换业务中找零。武汉钱币市场地摊上有见,索价甚高。

下面根据我取自流通领域中硬分币的清理,列

表注明逐年发行情况,并借用十级分类标准为各币定级(见表1)。表1中注圆圈者表示该年号该面值硬分币已发行,截至1991年,壹分币计26种,贰分币25种,伍分币18种,共计69种,面值1.66元。圆圈后数字表示该币级别,一级最高,存世极少,十级最低,数量特多。需要强调的是,定级是一个严肃而精细的工作,必须有大量实物为基础,否则难以为据。我定级的原则有二:一是统计对象取自流通领域,不取自银行金库或钱币市场,二是品相在较好以上,(见敝作《钱币品相评级标准》六七级以上者),中下品不宜套用。另外,考虑到1988年以后各币并非全数投入流通,钱币市场整筒未开封(甚至未开箱)的分币甚多,因此定级略低。

表1 硬分币发行,定级一览表

年份	壹分	贰分	伍分
1955	●二		●三
1956	●三	●六	●五
1957	●二		●四
1958	●三		
1959	●四	●三	
1960		●五	
1961	●四	●五	
1962		●五	
1963	●七	●四	
1964	●七	●七	
1971	●九		
1972	●五		
1973	●八		
1974	●六	●六	●五
1975	●八	●八	
1976	●四	●九	●五
1977	●九	●八	
1978	●九	●八	
1979	●四	●九	●一
1980	●十	●一	●一
1981	●一	●九	●一
1982	●十	●十	●十
1983	●十	●十	●十
1984	●十	●六	●十
1985	●六	●十	●九
1986	●十	●四	●十
1987	●九	●十	●十
1988		●八	●四
1989		●七	●五
1990		●八	●四
1991	●五	●四	●五

一级币五枚,存世极稀,流通领域不可能出现,钱币市场上也不易一见,只见于国内、外拍卖目录,当年由人民银行精制,同八十年代新版金属币(俗称“长城币”)一起装帧对外国人作纪念品发行,为数更少,有些只是象征性发行。如1986年版套装币仅发660套,其间硬分币套币,(发行于1979、1980、1981年,俗称“五大天王”者),也只在几万至数万盒之间。当时地摊上赝品就多,极易识别。首先精制币双面抛光,几可鉴人,另外假币均系真币改刻,年号字样极不规范。其中1981年壹分、伍分多由1984年壹分、伍分改刻,这一迷惑性稍大,作伪者铲去“4”字第一笔即成,但年号四字间距不匀,稍加注意,不难辨识。另外,赝品多以单枚出现,至今不见银行装帧之多枚套装赝品。

有人认为也发行过1962年壹分币,1978年伍分币,但我在数万元硬币中未曾一得,在各地钱币市场上也未曾一见。1993年10月由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司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货币图录》第96页所示,有1957年贰分币发行,我也从未一见。同好若有发见,应慎辨真伪,若系真币,应列为特级,起码应与“五大天王”比肩,换彩电之愿就不难实现了。

至于合面,合背等所谓错版币,纯系好事者戏作,人为之迹,一眼可辨。当代铸钱工艺的精密及检验制度的严格是不可能产生上述错版的。有人利用现代精密机床,以高超车刨技术将某币(多取钱面较大的伍分币)外缘内某面挖铣一毫米左右,再取另一币车刨去另一面及外缘留一毫米左右,然后将后者镶嵌于前者内,工艺精细者几不见合缝,但掷地必出哑声,好奇者当慎之。

收集整理铝合金分币之为技,小技也。不过在铝合金分币发行即将六十年之际,回顾我的硬分币研究经历,或可看见一个脚踏实地的钱癖乐在其中的辛苦和探索研究的认真态度。同时因为历来央行批拨不均,各地同好同我一样或有所困惑,乐将我的研究公布于众,让人民币中币值最小,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硬分币之我见捧与同好共享。■

传承红色精神 感受党性教育

——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有感

■ 李群华

2017年9月11-15日,我随省钱币学会一行27人赴贵州省遵义市接受理想信念教育,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

在遵义会议会址,我们先后参观了遵义会议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室,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办公室兼住室。这次参观,自己受到了一次难忘的革命传统教育洗礼,通过身临其境的体验,深刻感受到革命事业的艰辛与伟大,仿佛看到了我们党为了初心一路走来,所经受的各种严峻考验。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彻底摆脱了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影响,从此,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而后的实践证明,中国革命只有走自己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而不能墨守教条和照搬外国的经验;要取得革命胜利,还必须把党建设好,保持党的集中与统一;始终坚定革命信念,发扬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使全党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永葆活力与青春,才能长期胜任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然需要学习借鉴和发扬战争年代的经验,一切工作都要明确坐标,明确站位,做到接地气,求实效。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的最根本的经验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比如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是对全国的,是大方向、大框框。在落实过程中,就必须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实际,制定具体的工作措施,而不能简单的照抄照搬。我们要做好工作还必须坚持不断探索,勇于创新。遵义会议的决策过程本身就是对党长期实践经验的

总结和探索过程。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金融如何适应经济的发展,我们做金融工作的就是要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大胆探索和创新。如金融服务,我们有必要通过大力发展惠民金融,办好农村金融服务站,为老百姓存钱、取钱、转账、购物提供便利。在履职过程中,我们也要发扬遵义会议精神,要抓住重点,解决突出矛盾。如金融行业的精准扶贫工作就是要突出支持农村产业发展这个重点,只要农村产业都充分地发展起来了,老百姓不愁不富,贫困村贫困户不愁脱不了贫。

通过这次革命传统教育,我们重新认识了革命历史,切身感受革命老区日新月异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新气象,广阔农村的建设热潮,人民群众阳光四射的精神面貌让人深受感染,也更全面地认识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再次点燃了我们的爱党爱国热情。

这次参观,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高尚的情操,认真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今后我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们坚忍不拔、公而忘私、顽强拼搏、勇往直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自觉加强党性锻炼,牢记“两个务必”,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八不准”的承诺,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一名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共产党人,做清正廉洁的好干部。在学习上,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克服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在工作中,要立足本地实际,根据新形势新特点,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把本职工作做好,做实,做出成效。■

遵义行

■ 刘双庆

(天门钱币学会)

走进红色遵义城,
小楼会议心中明。
重新确立领导者,
错误路线得纠正。

一渡赤水向西进,
兵分三路进滇省。
改变被动为主动,
红军力量得休整。

二渡赤水黔北行,
摆脱敌人的逼进。
深入薄弱作战区,
遵义大捷巧夺胜。

三渡赤水再西进,
重入川南迷敌人。
红军作战不怕险,
打退国民土匪兵。

四渡赤水之字形,
又让国军摸不清。
以少胜多成精典,
跳出包围向前行。

回首再望遵义城,
万里长征留美名。
中国革命新起点,
永远激励后来人。